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黄如论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徐启源	高 翔	
理 事	张苏飞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赵麟斌	张苏飞	林 山	
	陈章汉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武夏红		

《闽都文化》总第 47 期 2016 年第 6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版单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张苏飞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康 芬	何财铭	方 薇	
装帧设计	杨 雪			
封面摄影	应 宁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 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子邮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都文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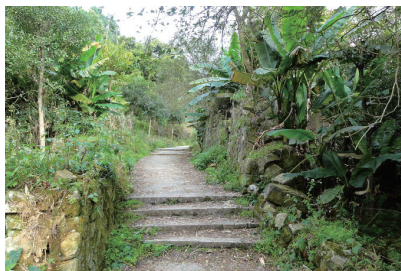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刷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闽道咏叹调

P26



风露香尘渡口老

P31

闽中断桥洪山桥



闽都记忆——古道沧桑

- 4 李海涛 闽道咏叹调
- 9 文 净 驿道，通向肩挑马驮的岁月
- 18 莫 洁 山里担夫
- 21 杨济亮 驿道上的古渡

世味流年

- 26 于 丹 风露香尘渡口老

榕垣旧事

- 31 三米深 闽中断桥洪山桥
- 39 邹挺超 郑宗伟 逝去的“黄金水道”

在线读城

- 46 郭大路 动车线上双城记
- 52 鹿 野 漂泊的车站
- 56 欣 桐 掌舵“海峡号”

Contents

P66



半个世纪的情结

双塔视野

- 60 夏 雪 移山填海鹰厦路
- 66 唐 颐 半个世纪的情结

闽都论坛

- 69 汪征鲁 陈 功 “侯官新学”访谈录

艺术档案

- 76 小 麦 古巷漆语
——2016 福州国际漆艺双年展回顾

古文今读

- 82 陈侣白 青山老树无穷意
——太老师何振岱诗词名篇赏析

轶事考辨

- 86 卢 和 寿香社十才女之师何振岱其人
- 92 林如求 林云铭与《红楼梦》

- 封二 陈明光 秋 日 （漆画）
- 封三 郑崇尧 简 （漆器）

P76



古巷漆语
——2016 福州国际漆艺双年展回顾

P86

寿香社十才女之师何振岱其人



闽道咏叹调

李海涛

《山海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或许，此处文字表述的正是古代闽地的对外交通状况。其实，这一状况，长期未能得到改变。自西汉以降直至民国，中央政府和福建地方当局的政务往来，大多还是通过海路。汉时东冶港是一处重要海港，当时交趾（越南）七郡上交朝廷的贡品，便是由东冶港转运去的。三国时，孙吴政权在福州设典船校尉，负责建造海船并管理海事。公元910年，后梁太祖朱温封王审知为闽王，派翁承赞为册封副使。翁承赞从汉口坐海船到福州。他有一首《汉水登舟先寄闽王》的诗：“汉皋庭畔起西风，半挂征帆直向东……”完成使命后回去，也是从福州坐海船到广陵（江苏省江都市）。

然而海上风涛，变化莫测，海难时常发生，让人思之惴惴。连江筱埕镇上有一座大王宫，供奉晋代的两位朝廷官员，据说就是死于当地的一

次海难。可是陆路呢，更被视为危途。因为福建北有仙霞岭、西有武夷山、南有博平岭，峰峦耸立，蜿蜒边境，形成与邻省的隔绝状态；中有鹫峰山、戴云山两山脉，从东北至西南贯穿腹地，沟壑纵横；东面沿海还有峻峭的太姥山脉。民间素有“蜀道难，闽道更难”的慨叹。

北宋熙宁年间曾任福州知州的文学家曾巩在他的《道山亭记》中这样描绘闽道之难行：道路如同绳索一般弯曲狭小，而且遍布碎石，“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蹶也。”即使是当地百姓，踮起脚步才能前行，不是本地人，很少不摔跤的。诗人陆游因得罪秦桧被黜，于公元1158年到宁德任主簿，一年后，改任福州决曹掾。从宁德到福州，如今乘坐动车，只要半个小时，可是当年陆游需要徒步翻过飞鸾岭、北峰等多座大山，在路上整整走了4天。由于山路多石，以致鞋底都磨穿了。

这是900多年前宋代的道路情形，到了300年前的清代，交通状况又是怎样的呢？福州地处闽江下游，除东南方向可以利用海港对外交通外，民众若与内陆或浙赣粤三省来往，就必须登山涉水，艰辛备尝。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史学家蓝鼎元对当时福州与邻省的交通路线，作了这样细致的描述：“自浙入闽，以仙霞关为孔道，由浦城泛舟下建宁（今建瓯）过延平抵福州水口，皆崇山狭流，乱石布水面，急滩险绝，篙师失手，铁船亦碎。自浙东海岸温州入闽，由

福宁、宁德、罗源、连江至省城，皆羊肠鸟道，盘纤陡峻，日行高岭云雾中，登天入渊，上下循环，古称蜀道无以过也。自江西入闽，一由河口逾崇安，过武夷山，下泛建阳，会于建宁。一由五虎杉关，逾光泽，下邵武，过顺昌，会于延平。一由瑞金，逾汀

州，泛清流，下九龙滩，如高屋建瓴，从山巅跌船下幽谷，奇险甲天下。其欲避九龙滩，则走将乐，与建、邵二溪相须，皆会延平。由汀州陆路至漳州，必经上杭、永定，岭高径危，与福宁道上相仿佛，可由漳州、同安、泉州、兴化抵省城。自广东入闽，由分水关过诏安、漳浦，从漳、泉、兴化一路直达省城，虽不

通河棹，又有坡岭弗利轮辕，然闽地坦夷，仅此途千里而已。广东又有小路，由三河、大埔逾石上，入上杭，水浅舟小，满载不过三四人，鞠躬桎足，行者苦之。然经连城，逾小陶，顺流下延平迺达省城，仕宦商旅皆由焉。”

道路甚至改变了战争的结局。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迅速，吴佩孚、孙传芳相继溃败。何应钦率北伐军一部向福州挺进。情势危殆，北洋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周荫人急电在漳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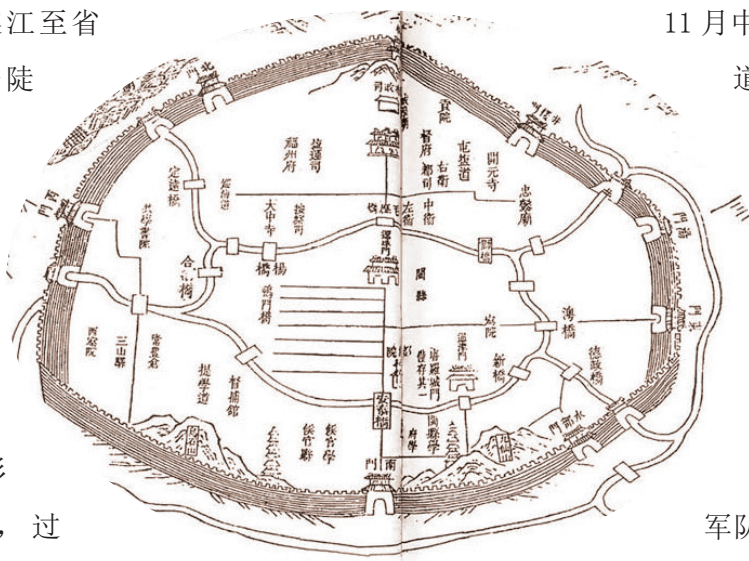
第一军军长张毅率全军立即回防福州。

11月中旬，张部开拔，由于道路不畅，直到半个月后，才抵达乌龙江南岸。然而，北军刚刚渡过一个旅，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江上突然驶来两艘炮艇，朝南北两岸北洋军队猛烈炮击，接着又有

两架水上飞机前来助阵，用机枪向江面扫射。原来驻守福州

的北洋海军就在两天前起义，投入北伐军阵营。友军转眼成敌军，张毅只好放弃渡江，改变行军路线，最后陷入北伐军包围，以致全军覆没。要是道路通畅，早到两天，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山峦、河流，是闽道中绕不去的话题。在闽剧和民间说唱词中，更少不了对山川道路绘形绘



明洪武四年（1371）福州府城图



清代福州山川城池形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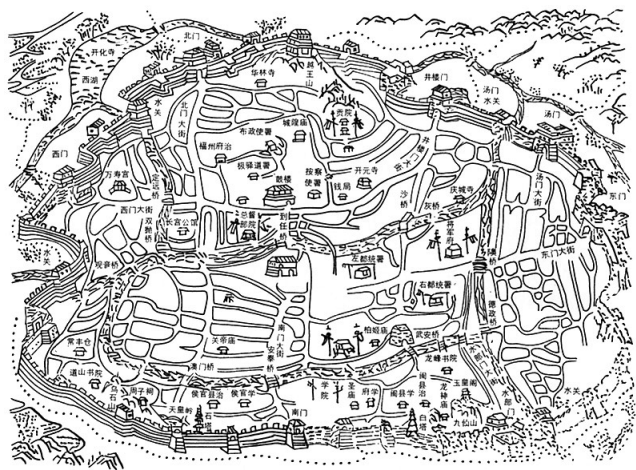
声的描述。

福州评话中有一段“里京路引”，生动地讲述了古代福州士人赴京赶考必经的线路：

“乌龙过江三角埕，城门、黄山乡下路。后瑄直拔白湖亭，下渡红墙十锦庙。梅坞过岭仓前桥，中洲、大桥设税馆，中亭街鱼货两边排……吉祥山下铸铜锣，茶亭粉店多热闹。福德桥边祖庙前，六柱、洗马、九仙铺，斗中街一派做头梳……安泰榜眼坊石座，南街七巷双门前……到任桥过总督口，鼓楼顶挂时辰牌。府前街过渡鸡口，定远桥、皇帝殿、西门街。西峰里直出西关外，眼看就是坂头桥。西门半街卖果子，柴巷行过接官亭。打铁桥过将军山，凤凰池过祭酒岭。

举目看见张经墓，再行三里洪山桥。妈祖庙前忙下水，王店、淮安在面前。桐口、甘蔗、竹岐所，叶洋、白沙、大目溪。梅埔十里闽清口，走过瓜园日西斜。大箬、小箬相连里，起站五里安仁溪。转弯牛头、水口站，再进峨洋、古田溪。又过谷口将军庙，跳过双溪到尤溪。九里行过白沙铺，再行三里岳溪桥。经过葫芦山一座，举目看见七里亭。七里过去延平铺，延平过去鸭蛋滩。塔头对面莲花石，梅岭下头老鼠滩。太平桥过是洪口，建宁五日到浦城……”

不仅仅是士子赴京赶考，不少官员上任或致仕，走的也是这条路线。水路从福州洪山桥直到浦城鱼梁驿，最快也要12天，而后便是崎岖的200里仙霞古道。作为水陆中转站，地处鱼梁山下的鱼梁驿旅店毗连、商号密集，曾经繁闹一时。鱼梁驿、仙霞岭，也因此留下大量文人咏叹



清光绪六年(1880)福州府城图

闽道的诗篇。比如清代袁枚的《过仙霞岭》：“乍上仙霞岭，遥山渐莽苍。梯田高下种，环水往来忙。峡束人如小，云封路觉长。舆夫先敛足，取势作低昂。乱竹扶人上，蒙茸但见烟。千盘难度鸟，万岭欲藏天。古树拿云健，重门铸铁坚。分明两戒外，别自一山川。”“千盘难度鸟，万岭欲藏天”恰是闽道艰险难行的写照。

但即便是这样一条曲折迂回的山道，还是1000多年前黄巢农民起义军开凿出来的。黄巢为进占福州，率部从浙江衢州开山路700里至建州。这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成就了一条出入闽地的陆上通道。

道路，道路，开辟四通八达的通衢大道，成了几千年来闽人的梦想。

身处海外的福建乡亲，对家乡的道路尤为关切。1920年，在海外华侨的推动下，闽南泉州和漳州间，各出现一条公路，这是福建最早的公路。虽然里程很短，且互不贯联，但产生影响甚远。漳州始兴汽车公司、泉州泉安汽车公司等民营汽车公司也相继成立。而政府路政机构呢？直到福建结束北洋军阀统治，组建第一届省政府时，于1927年8月间划归在建设厅系统下，成立了省公路局，下属漳龙、莆仙、延建和泉永四个分局，才开始公路建设。福州则成立福峡、福马两个工程处，直属省公路局，分线施工西洪（西门至洪山桥，是福延公路的首段）、福马（福州至马尾）、福峡（福州至峡兜）、福湾（福州至湾边）4条公路。虽然这4条公路里程都很短，

却连接四处码头，是福州出城和出省的重要通道。但就是这几条总里程还不到100公里的公路，竟用了六七个头才修建完成。

因为这一时期，福建政局持续动荡，各地多处在驻军、民军的割据之下，公路建设也四分五裂，形成无政府状态。由于工程没有统一的计划，不仅施工因陋就简，而且修路如遇到山岭河流，必须开山架桥，或由于资金不到位，往往就被搁置下来。如福州到莆田公路，中间隔着一座相思岭，就拖延了好多年。通车时沿线还有许多桥梁没有架设。水浅时，在河底行车，浪花四溅；水涨时则断绝交通，让人望路兴叹。

1934年至1935年的两年间，是福建修建公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工程进度比之前快了。比如由浦城经建阳、建瓯至南平的全程230公里的公路，只花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这其中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原因。1933年底，十九路军在福建组织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为对付“闽变”，要调遣军队由闽北迅速推进福州，派军委会南昌行营军路处处长陈体诚随军抢修浦南公路。筹款派工，都得到军事当局的大力支持，所以工程进展很快。接着，为着军事需要，陈体诚又主持修建了南平经永安、连城至长汀的公路。当时称这两条公路为“军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全力以赴。

与此同时，省建设厅成立汽车管理处，福建开始出现有官僚资本参与的公营汽车。

但不久抗战爆发。福建沿海一带公路，全部

遭到破坏。日军占领福州后，为防止日军沿公路向内地进犯，守军将福州通往建瓯和泉州的公路切断，桥涵被炸毁，路基被掘成壕沟。福州和内地的公路往来交通全部中断。这是国难日也是福建公路的路难日。至抗战胜利时，福建公路已是满目疮痍。加之管理不善，每逢雨季，公路常遭水患，有时几个月无法恢复交通。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关于公路的打油诗：“一程二三里，陷车四五次，沟渠六七行，八九十人推。”

为了修复福厦公路，有关部门报请上海的救济总署拨出美援约值20万美金的物质，包括筑路机车、压路机、碎石机、搅拌机等60多台，由登陆艇运至乌龙江畔。但修复工程进度既慢，质量又差，最后处于半停顿状态。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公路建设才得到飞速发展。

至于福州城区的道路呢，民国之前，福州街道都是狭窄的石板路，最大的南街也只要一丈多宽，交通工具仍然保持着中世纪的马和轿，但骑马的人毕竟不多，能坐得起轿子的人就更少了，一般老百姓就只能靠两条腿走路。由万寿桥至城里，中间会经过一个凉亭，轿夫们常在凉亭里休息，由此带动该处休闲经济，后来这里竟茶馆林立，茶亭也由此得名。福州市民习惯称鼓楼为城里，因此早期的福州城区不大。随着城区向南扩展，尤其是台江和仓山的繁荣，呈长条扁担状的市区格局对道路的需求便显得格外迫切。

1914年，许世英任福建巡按使时即倡建从水部门、王庄、南公园到台江万寿桥的马路，这

也是福州市区第一条马路。全线桥梁有14座，桥的坡度都比较陡。后来成立的汽车公司招揽乘客的广告词中就有这样一句话：“请尝十四桥风味。”接着又筑了一条从南门沿茶亭、洋头口转经国货路到南公园的马路，把它与从水部到大桥的线路连接起来。有了道路，汽车公司也应运而生。1920年，由官商合办的延福泉汽车公司成立。第一个动作就是向上海购买旧客车8辆，经修整后，其中4辆行驶于南门至大桥之间。这是福州有公共汽车之始。当时的马路既窄且弯，到处坑坑洼洼，坐在汽车里，颇觉颠簸。路面多系沙土，晴天车子驶过尘土飞扬，雨天则泥泞不堪。

到1928年，开辟吉祥山时，修建了鼓楼通往南门的马路，并向南直伸到南台，过万寿桥至仓前山，这也就是今天八一七路的前身。

1930年，延福泉汽车公司因资金缺乏，车辆得不到补充，一度停业。一些商人另组建复兴汽车公司，承办福州市区公共汽车业务，添购新车12辆连同旧车共24辆在城区行驶。抗战期间，因汽油和配件困难，行驶车辆缩减为每天6辆，并改用木炭为动力。1941年，日寇占领福州，复兴公司不愿与日本人合作，将一部分车辆毁坏，一部分退往内地，经理郑劈山因此被日寇杀害。自此之后，福州公共汽车绝迹于市。抗战胜利后，直到1946年3月才部分恢复运营。

翻阅福州交通史，那旧日的一页页，印满了先人艰辛而又坚忍的脚步，显得那么沉重，却又耐人寻味，掩卷既久，仍忍不住发一声叹息。

驿道，通向肩挑马驮的岁月

文 净

—

凭江临海的福州，也是一座假山依泉的城市。最高峻的山，当属鼓岭与北峰。北峰的密林间有条公路，在新店与桂湖的隧道没有贯通之前，那是省城经宦溪通往温州的必经要道。乘车在上面行驶的人也许不会想到，离此不远的密林间还有一条经宦溪通往温州的路，以现代人的眼光看，那只是一条小路，但在古代却是不折不扣的通行大道。

宽约6尺的古道，路面用山石与溪卵石铺就。福州至宦溪的路段，人称大北岭驿道，铺的多是溪卵石。在当年，这要算是“性价比”最高的铺路石了。无须开采切割，搬来便可铺砌。饱经冲刷浸泡，质地格外刚硬，耐得起千万人的脚板踏踩。不断拍打的脚板，频频下落的汗滴，又

把溪石来回打磨，来回浸润，让它们随着岁月的增长，泛起重重古铜色的光泽。这段古道以它那带着沧桑感的坚硬，默默地抵御风雨的侵蚀、草木的掩埋与时光的遗忘。

宋代嘉祐年间，距今900多年。这段驿道，是当时的怀安县令樊纪牵头募建的。那时的福州府辖闽县、侯官、怀安三县，大北岭属怀安县地盘。

2002年2月，闽侯县博物馆人员在荆溪镇发现了一段北宋的出省驿道，当时的修路记碑显示，这一段道路也是樊纪发起修建的。

那是一个对路的需求空前迫切的年代。山重水叠的福建，经过不断的开拓与发展，到宋代已成为制糖、陶瓷、纸张、丝绸的重要产地，跻身全国三大印刷业中心之列，茶叶、食盐等特色产品陆续销往省外。“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

垂帘。”便是当年诗人笔下的福州城景象。日渐繁荣的福州，需要有更多更宽的对外通道。面对“闽道难于蜀道”的陆上交通状况，一个有作为的官员，自然会把修桥铺路摆上重要议题。

始于新店镇象峰村的状元岭古道，虽然几乎都是上坡路，但那路大多并不陡急，缓缓地升着，缓缓地弯着，沉稳而执着地向高处延伸。在城里人的眼里，北峰是横亘在福州北面的一堵高而陡的山体，没想到在上面蜿蜒的古驿道，会修得这样不疾不徐，从容和缓。我猜想，主持筑路的樊县令要么是这方面的行家，要么是他所召集的道路勘测人才素质不凡，善于巧借山势开山筑路。筑路者对行路者的体恤关切之心，就蕴含在那缓缓上升的台阶之中。临近坡顶的那一段，路

势陡了起来，前面就是通往宦溪的山口，路只有从下方高高地昂起，才能从两峰相夹之处穿过。这是登状元岭最吃力的一段，对荷担负重的人更具挑战性。然而，路的两边有泉水相伴，一侧是山涧，一侧是水沟，即使是晴天，沟里也流着山上淌下来的清水，清越如鸣琴。泉水漫起湿湿的水汽，给路人减去些许热意与躁气。如想稍稍停步歇肩，洗把脸，解个渴，弯腰就有清泉。爬到山口，凉凉的山风就迎面而来。高墙般耸立的北峰，难得有这么一个山口，风自然喜欢从这里穿过。山口的两侧现在已辟为宦溪镇的居民健身公园，一溜长廊，引得许多登山者在那里沐风纳凉。推想在当年这里必有供人歇息的路亭，坐下来让山风擦去汗水，再回望一眼山下的福州城，



三山觉路亭



阶亭

之后带着对故土的深深眷恋，迈向远方他乡。

有两座古路亭还在，从山底往上约三四里，一亭，再往上约二三公里，又一亭，虽经过今人修缮，依然古韵弥漫。说是亭，但没有飞檐翘角，而是山石垒墙，泥瓦覆顶，前后两道门，让驿道从亭中穿过。除了正墙居中位置供奉神位佛龕，靠墙的其他地方，都是供人歇息的座位，或以石砌，上铺木板，或依墙摆放几条木椅，一座路亭，可供三四十人同时贴墙而坐。中间的空地用以摆放货物，随行的骡马也可在此停歇。从路亭的格局，可以推知驿道当年人来马往的情况，筑路人对来往行人的体恤与关爱之意，也蕴含在那里的一石一木之中。

留心脚下的道路，你会发现那些光滑的卵石上，刻着形状各异的防滑纹，有的两三痕，有的只是一痕，有的横竖相穿，有的斜线交叉。要在硬而滑的溪卵石上刻纹，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既需要力气，更需要耐心。猜想那些在路上刻纹的人，必是对行路的艰难有切身的体验。匆匆赶路的人，尤其是那些挑着担子的人，脚上多穿着麻丝草鞋，一旦被汗水湿透，再重重地踩到本已光滑且微微凸起的石面上，很容易打滑摔伤。若逢上雨天，路面更滑。脚下的这些防滑纹，为路人解除了不慎滑倒之忧。那些防滑纹刻得恰到好处，都落在下坡最可能落脚的位置。一代又一代的无数只脚板，就从那些刻纹上走过，路不打滑了，步也沉隐了许多。艰辛的路，沉重的路，也因此散发出缕缕人间的温情。



二

大北岭驿终于今福州晋安区宦溪镇，然而那只是当年福温路的一段短短的开头。在宦溪小歇之后，过板桥，越汤岭，穿降虎寨，入连江县境，过潘渡、陀市、朱公、丹阳，接罗源县祥楼，后经应德、白塔、县城、起步，翻三层岭、历圣殿、叠石、界首，接宁德白鹤岭。

进入宁德后，经福安、霞浦、福鼎诸县地界，越闽浙省界达温州。这是一条历史悠远的出省古道，公元前110年的汉武帝元封元年，其基本线路就已经形成。

也是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进攻闽越，余善在闽西北筑城抵抗。无奈汉军攻势劲猛，东越王连失六城，节节败退。史载，当时他们从失守的城池经建瓯、古田、闽侯到达位于今福州冶山路的冶城。这是福州连接省外的另一条古道，后来拓修成驿道，人称福瓯路。从现

有的史料推测，这条线路的形成可能比福温路还早。从福州到建瓯后，经浦城过仙霞关，可抵浙江江山县；经崇安过分水关，可抵江西上饶县。

如今的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内，还有一段长约三四里的古驿道，那是福温古驿道保存最好的一段。路面基本无损，砌石咬合坚实，时而能见到几片纹细色美的石头，如彩云镶嵌其间。从新店赤桥村到寿山乡的那段驿道，因与大北岭驿道



小北岭福温古道

一样盘北峰而上，人称小北岭。从寿山乡往前，福温路在下寮分路一支，经汶洋、日溪，越白虎岭，过梓山村，进入罗源县境，与福瓯路连接，那是两条路的一次亲密握手。在海路尚未畅达的情况下，从福州往北入京城，所走的不外是这两条路。

福建古称“东南山国”，山重水叠，岭高路险，汉代前是当地土著居民生活的“蛮荒之地”，虽然地处东海之滨，但碍于海上风急浪高，航海设施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陆路是主要的交通方式。当年汉武帝攻闽越，兵分四路，三路皆从陆上挺进。唐末黄巢起义军入闽，沿仙霞岭开山伐道700里。明代的航海技术已大有进步，但朱元璋部队进军福建，仍分水陆两路。明嘉靖年间，戚继光率军抗击倭寇，也是经福温古道抵达福州的。在连江县山区的降虎寨，戚继光部队曾与据守寨中的倭寇发生过一场交战。

汇建溪、沙溪、富屯溪之水形成的闽江，是古代福州连接闽北、闽西的重要水上通道。据史载，在唐代之前，福州与闽北重镇南平（古称延平）之间的交通，全靠闽江水路。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闽江水口以上险滩无数，船破人溺的事故时有发生。唐元和二年（807），福建观察使陆庶感念水上行船之苦，从西门起沿江“铲峰湮谷，停舟续流，跨木引绳”，也就是通过开山填谷、搭建浮桥与修筑梁桥的办法，辟出一条长约400里的陆上通道，人称福延路。福延路是继福瓯路之后的又一条连接闽北的古道。

从福州沿海岸线南下，过乌龙江，翻常思岭，经福清县境进入莆田，当年也有一条驿道，人称福莆路。这是福州唯一的南向出省古驿道。从莆田经泉州、漳州，翻过诏安分水关，便抵达广东地界。黄巢的起义军从福建转战广东，走的便是这条古道。

四条驿道，两条往北，一西一南，把闽都与相邻的浙、赣、粤连接起来，与更远的外部世界连接起来。

与那些散落在乡间野地的小路相比，石头铺砌的驿道，便是当年的通行大道。它的建成，无疑大大改善了闽都的交通条件，但与平原阔地的驿道相比，闽路依然被人视为畏途。“其路在闽

者，陆出则阨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宋代文学家曾巩的《道山亭记》，以这样的笔墨描述闽之水陆道路。《道山亭记》是曾巩为前任太守程师孟所修的道山亭所作的散文，全文仅700多字，写闽道之状的文字占300多字，可见他对闽地行路之难，颇有切身体会。

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北岭与小北岭驿道，似乎并没有曾巩所述的那般难行，也许是因为那是福



小北岭古道



“晋京第一关”题刻

州出城后的起始路段，勘测与修筑所花的工夫要多一些。

三

大北岭驿道的入口处，横卧着一块山石，上镌五字：“状元岭驿道”。与此相呼应，小北岭驿道离起点的不远的地方，也竖着一块石碑，上刻三字：“状元路”。据说，这两条驿道都是当年福州入京应试者的必经之路。从唐宋至明清，朝代更迭，建都之址也屡经变迁。不同年代的入京应试者，根据京都所在的不同，或走大北岭，或走小北岭，两条路自然都留下状元们的足迹。

两条北向的古道的起始路段都以“状元”冠名，许是为了彰显古道的荣耀。仅两宋时期，从这两条古道走过的福州人，就有 10 位文状元，11 位武状元，进士更高达 2247 名。

今天的大北岭之顶，有座刚建不久的文昌阁。推想在当年，这里便是供奉文昌帝君的殿宇。刚刚踏上入京应试之路的书生，难免要到这里烧一炷香。马上就要揖别家乡，山高水长，前路迢迢，功名场上，风云莫测，点根香给自己鼓鼓劲，许个愿盼神灵多庇护。

在福温与福瓯古道经过的一些村镇，至今还能路边看到数间残破的老屋，窗户呈长方型横于墙体，据说那便是当年的店铺，窗柜合用，供路人购些吃食用品。行客来往较多的集镇，多设用以接待差役官员的驿站，民间的客栈、饭店、

售货店也多集于此。赴京应试的书生，荣耀返乡的状元，自然也会从这里经过，有时难免还要停下来喝口茶、吃餐饭甚至过个夜。不过，接待最多的客人，还是为那些为养家糊口辛勤奔波的差役、贩夫、挑工。

“福州南至莆田，北抵永嘉，西达延平，由南以往凡五驿十铺，由北以往经十一驿，由西往驿四铺十三。”这是史书记载的宋代驿铺设立状况。福建境内群山叠嶂，这里的驿道，无法像平原那样通行车辆，无论是传递公文，报告军务，还是转运军需，递送粮物，多靠人力，马骑运送因路况与经费的制约，只在传递紧急公文时使用。宋代福州的陆上邮驿，步递为基本组织形式，规定日行 200 里。用来传递紧急文书的马递，规定日行 350 里，由于饲养驿马的诸多不便，马递难以为继，后来兵士传递紧急文书，往往向百姓强借马匹。公元 1083 年，福州地方官郑居简负责军器征运，开始设置急递铺，采取“急脚递”的方式，昼夜兼程、接力传递军需物资与军务文书，最初规定日行 400 里，后又提高到 500 里。然而这还不是最快的，清初康熙帝派兵征剿“闽逆”耿精忠，其《平定三逆方略》载：“邮传之速，其有稗于军机者大矣！”为快速奏报军机，传递者须昼夜兼程行千余里。福建民间向有“闽道更比蜀道难”之说，以这样的速度疾走于高山峻岭之间，纵然是精壮汉子，也必是汗挥如雨，气喘如牛。有人因累极困极，虚脱于途，也有人因天暗路滑，跌倒于路。

以温泉驰名的连江县贵安村，当年设立的驿所名曰“温泉驿”，来往的夫役、学子、商贾人等都喜欢在这里歇脚、用餐与补充马料，自然也捎带泡个温泉澡。当年的驿道如今已大多被乱草覆没，但一方清康熙年间的碑记，至今还在野地里竖立着。从上面的记述可知，明代之后，设立在贵安的驿道不知何故被撤去，接待来往官员的任务，竟被转嫁到光临里的民众头上。当时的连江县令王仁灏获悉此事，“廉其情，饬示禁革，夙弊顿除”，故民间勒石以志其德。驿道的开辟与修建，固然给沿途民众带来诸多便利，但在那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地方官吏的借机摊派与敲诈，也令他们苦不堪言。

福温古道边，一座只剩数段残墙的老村里，还留着一座当年打糍粑用的石臼。用糯米制作的糍粑，结实绵韧，食之特别耐饥，是挑夫们最喜携带的干粮。唐代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陷入萧条，从福建沿海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中亚与欧洲的新通道。无数瓷器、丝绸、茶叶，或水路，或陆路，或水陆交替送至福州，散向各地。而福州、莆田、泉州、漳州等地的特产如糖、纸、橘子、荔枝，也有不少是从福州经北向古驿道挑向闽北及省外各地的。山路弯弯，峻岭叠叠，有时赤日炎炎，有时冷风嗖嗖。挑夫们头戴竹笠，脚穿草鞋，沉沉的货担压得扁担频频颤动。装干粮的蒲包、烟包与水烟筒，总是被挂在他们的扁担一头。似乎没有人去记述挑夫们一代又一代的艰难行踪，他们只是默默地以汗水

为墨，把自己的喜乐悲辛，点点滴滴地写入脚下的石板上、泥土里。

“北岭一铺透岭跂，十个诸娘九平跂。种田挑担伊都做，人人经过将伊夸。”这是当年福温古道上流传的一首路歌。长路漫漫，行者常唱路歌苦中作乐。这一首路歌，据说是罗源县叠石村的一名姓张的村妇最先编唱的。她的丈夫往浙江平阳贩运药材去福州，赚了钱后，一头沉入烟花巷，久不思归。住在宁德娘家的妻子张氏久等心急，便沿着官道一路向南寻夫去。显然，这是一位心思细密的女人，她把沿途的地名与当地的风情牢记于心，之后编成易记易唱的路引歌。长达百句的路引歌，也把今天的我们引向当年。那时的驿道，仅宁德的白鹤岭，就建有三座路亭。道观、佛寺、驿站、路亭、山寨，在弯曲起伏的驿道上时隐时现。溪桥畔，蔽日遮天的老树供人歇凉。路旁，有人卖米粥，有人卖汤丸，寺庙里的和尚也摆摊卖茶水。从潘渡摆渡过溪，船公不向乘客收一分钱。到了北岭，她看到那里的“诸娘”也就是女人大多不缠脚，田里活山上活都干得顶呱呱。由此我们知道，即使在封建礼教束缚甚紧的年代，驿道边的村寨里还有很多女人不畏世俗的眼光，放开脚板矫健地行走在宽厚的大地上。

罗源张氏编唱的路引歌，韵律并不抑郁，甚至还带着几分轻快，难以想象这是一位心怀忧伤的女人编唱出来的。不知她翻山越岭寻夫的一片真情，是否让陷入迷途的丈夫回心转意？不管怎

样，张氏的路引歌，引得无数行人传唱。用受伤的心，编唱轻快的调子，不只是罗源张氏，在古驿道上来来往往的苦力，大都如此。他们用一首又一首路歌，支撑疲乏的躯体，冲淡对莫测前路的忧伤。

四

岁月的变迁让无数古道消于无形，遗留至今的只是一些零星的路段。福延路起始的一段，因圈入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得以保存，但白鹤亭至寿山乡政府的那段陡坡，因破损不堪，只得用新的条石铺砌，福温路接近宦溪乡政府的一段下坡路也是如此。细心的人会发现，当年的路面大多没有被撬去，新路几乎是覆盖在老路上面的。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新路的一侧，不时会露出几块当年的铺路石。对已经残破的古道，或许这是一种巧妙的珍藏方式。把条石覆盖在上，让它免受风雨的直接侵蚀，又不把它遮得了无痕迹，于是，那些时而露出的老路旧石，就会向过往的人们频频传递历史的回声。



驿道的修砌时间史有记载，但在此之前，是谁从这里踏出第一道路痕？很久很久以前，在这里穿梭奔跃的只是当地土著，他们的路不会伸得很远。是谁把他们踏出的一段段互不连接的路痕，连缀成一条通向外部世界的路径？太多太多的历史无法还原，但我猜想，历史上有名的“衣冠南渡”，一定有很多中原

的士族与百姓，从不同的方向奔向入闽的古道。带着痛别家山的忧愤，被驱赶的屈辱，他们的步履匆促又蹒跚。然而，苦难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他们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八闽大地寻找重新生根发芽的地盘。因为他们的到来，中原的汉文化与当地文化获得进一步融合，为福建的发展注入新的精神动力。

那时候，福建尚未向海外敞开它的胸怀，弯曲起伏的古道，也承载着文化交流与文明传递的使命。

南宋大诗人陆游，当年便是沿着福温古驿道来到福州的。那时是秋天，陆游经过北岭，留下了“北岭空思擘晚红”的诗句。从宁德县主簿调任福州决曹，低微的官职显然无法让他施展宏大

的政治抱负，但他的满腹经纶与旷世诗才，必定会影响福州的文化走向。

从古道走来的文化名人，还有名列唐宋八大散文家的曾巩。他到福州为官的时间比陆游早，他写下的《道山亭记》，成为福州人代代传诵的名篇。

公元1192年，53岁的辛弃疾从他在江西上饶的隐居地赴榕任职，应该是沿着福瓯古道走来的。“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大词人笔下的佳句，让福州西湖魅力恒久。

仙霞关，分水关，闽浙两省交界的两个古道关隘，分别连接福延路、福瓯路与福温路三条古道。福建名人蔡襄、刘克庄、黄公度、林则徐，省外名人陆游、徐霞客，都曾在那里留下诗文。出生莆邑的蔡襄、刘克庄、黄公度，当年是沿着福莆古道经福州出省的，或走大北岭，或走小北岭，或走西线路。蔡襄的“看山一路到渔梁，客邸寒深月似霜”、刘克庄的“春泥滑滑雨丝丝，一路阴寒少霁时”，都把路之所见写入诗中。刘克庄的“水入陂渠喧似瀑，云从山岫上如炊”，想必是当年驿道上习见的景色。习见的景色竟被写得如此清新脱俗，方见得大家手段。唐宋时期的诸多名诗佳句，是诗人行走驿道时脱口吟诵的。福州的几条出省古驿道，同样也润泽了文人骚客的笔墨。

从市区登大北岭驿道不远，路横一亭，石拱门上刻着四个大字：三山觉路。“三山”即福州的乌山、于山、屏山，此处代指福州。“觉路”

应是佛家语，慧能大师的“佛教在世間，不离世間覺”即寓此意。漫漫驿道为何也称“觉路”？当与驿道修建年代的历史背景有关。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中原一带，此后由北向南穿山越岭进入闽地。到两宋时期，无论是寺院还是僧尼的数量，福建均为全国之冠。“潮田种稻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福州的佛寺之多、佛事之盛，从诗人的描述里可见一斑。

弘法传道的僧人，大多也是沿着古道逶迤而来。

来自河南的神晏法师，成为鼓山的开山祖师，居鼓山30多年。

从浙江走来的慧棱法师，受闽王王审知之请住福州怡山长庆寺，为长庆寺第四代中兴住持。

从河北走来的樵隐法师，三次承旨主持福州雪峰寺，前后达28年。

三山觉路，也是一条宗教文化的传递与交流之路。

达官贵人，诗人墨客，将士兵卒，商贩挑夫，僧人道士……太多太多的脚印，堆叠在古道之上，太多太多的故事，凝聚于古道之上。拥有宽宽海路的福州，它的历史却与山路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因此，当我们看到那些被珍藏的古道，哪怕只是一小段，也会从心头生出敬意。永不要忘记古道给予我们的恩泽，古道也必会赋予我们在新的征程上前行的智慧与力量。

山里担夫

莫 洁

大山里没有开通公路之前，村民们吃的盐巴、穿的布料，女孩的红头绳、橡皮筋等大小日常生活用品，全部是用肩膀从山外头担回来的。因此，大山里就有了以担为生的担夫了。

当时，社会乱、土匪多，担夫们不得不结伴而行，以防止遭受抢劫，久而久之，就形成一支自律性强且注重“沿角”的队伍了，山里人称之为“担外头”。盐是山里人必担之货，至今，山里人常以“你担外头哩”来骂人穷酸相，即“你穷得连盐巴也吃不上了”。

“担外头”的路途遥远，道路崎岖，一些人烟稀少处，干脆就没有路，许多路是靠担夫们闯出来的，正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出门在外，生计一肩挑，一家人的希望扛在单薄的肩膀上，不得有丝毫闪失。担夫们风餐露宿，旅途异常艰苦。大热时易中暑，天凉了又感冒，食不当患痢疾，劳过了神还会吐血；眼看这些“鬼门关”都闯过了，若遇上土匪，免不了了一场恶战，败了还得连本赔上。许多壮汉在这悲壮的行程中倒下了，但是，就有更多的青年汉

子顶上，如此周而复始，就是为了生活。

为此，习武健身、防身成了山里人闲暇生活的重要部分。其中，“扁担拳”“罗汉腿”“柱杖十八法”等拳法是山里人的绝活，村中老幼妇孺皆有“两下子”，武艺高超者倍受尊敬，能参与“担外头”的年轻人更显风光，易被姑娘们的绣球抛中。

扁担、竹篓和柱杖成了担的整套工具，看似简陋，细微处与普通的家伙却有差别。扁担是用大麻竹制成的，宽而扁，其弧线与肩膀吻合，不勒伤肩膀；两端用文火加工后，兀自翘起成钩，能稳稳地钩住竹篓不掉；前端套有柱绳，若要小歇，不必放下担子，只要将柱杖的柱钩对准柱绳，往地下一顿，让柱杖顶住扁担，尔后一手扶担一手扶杖，挪出身体即可歇息了。扁担兼有防身的功用，它横着拿是棍，侧握为刀，是担夫们惯用的贴身武器。担夫们的柱杖多由铁木、红木、楠木等坚硬的木棍特制。扁担“头”呈“蛇头”形能驱邪；凹陷处如槽可稳当地撑住担；“脚”上箍着一个厚铁圈，圈上8寸处有柱钩，

其功用一是拄担，二是撬肩，三是充当武器使用。“似棍比棍短，似杆比杆粗”是柱杖既不像棍又不像鞭杆的独特之处。“南拳北腿，山里人的杖”指的就是这柱杖。儿时，常举起柱杖往石头上狠狠一顿，便会“咣当”一声巨响，觉得很自豪呢！竹篓比普通的要大些、矮些，这样，所装货物就不易因担时的挤压而变形了。

担的队伍一般由十多人组成，或多些，人数是成双的。其一是应着好事成双图吉利的风俗，二是两两而行好照应：若途中有一人受伤或患病，另一人则会主动多担些货，遇上两人都出事时只好由“头人”安排。小村庄凑不上一支“担外头”队伍，只好与大村庄结伴而行，各项事宜皆服从他们“头人”的决定。

“头人”是由村中声望高、体格壮、武艺好、善于外交并谙熟生意之道的人担任，所定出发日期、地点、担出和担回货物等皆由“头人”说了算。

一切准备就绪，即将起程时，“头人”便会吆喝一声：“开路的，出发！”于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担外头”队伍就踏上了连接大山与海的“丝绸之路”了。队伍行进时，“头人”并非走在头一个，而是最后一个，以防止队员掉队和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也称作“断后”。而走在头一个的称作“开路”，是由队中体格壮、能担善跑且敢与时间赛跑的人担任。遇着担新鲜黄瓜鱼赶过节时，开路的更是健步如飞，随后的只好咬紧牙关苦苦追赶，一天能跑上百里路呢！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些吃在山里的人，也嗅到了海里的鲜味。逢年过节弄一两道尝尝，节才算个节，才过得有滋有味。海与河的交界处产出的新鲜黄瓜鱼，肉嫩味美又不长刺，是最受山里人青睐的一味，这便有了“赶鲜瓜”。

屏南藏在崇山密林中，是福州十邑同乡中又贫又难的小兄弟，至民国之前，皆属于福州管辖。为了能吃上新鲜的黄瓜鱼，屏南担夫们不得不前往属于福宁府管辖的宁德莒洲担黄瓜鱼。由于目的地是人家的领地，跋涉于茫茫大山中的担夫们无疑又多了几道险情。从莒洲往屏南旧县治双溪的直线距离不到30公里，但峰险壑深路隘，盘山古驿道就有六七十公里。线路是莒洲（古羸洲）—檳榜下一吴峰（茗园）—前墩—寿山—一七房—双溪。据山里的老人回忆说，天方露出鱼肚白，担夫们就担着一担黄瓜鱼从莒洲出发，天，也在“嘿哟，嘿哟”的小调声中渐渐亮堂了。担夫们一路飞奔，村村接力，到达双溪时，活蹦乱跳的黄瓜鱼还赶得上节日午餐下酒呢！“年三天，节三顿，立夏、冬至仅一餐”是山里人亘古不变的节，这节的味道因有了“鲜黄瓜”而更浓了。

山里人说：“城里的月亮特别大！”这城指的是大大的福州城，福州城不仅月亮大，而且货多、质优、价廉。为此，省城虽远却不可不去。从省城福州往双溪的直线距离仅100公里许，古驿道170多公里。线路是福州—寿山—万洋—川边—双渡口—鹤塘—墩头—金造桥—棠口—双溪。由于路途遥远，往返一趟经常得十多天，担

夫们不得不在沿途村庄找东家落户，所担货物的差价，恰好是脚力钱。“反正闲着只是扯皮”，能赚点血汗脚力钱，对山里人来说已经相当知足了。

当“担的担子沉——哟！嘿哟，嘿哟！”的小调从村外飘来时，孩子们就欢呼雀跃地循声奔去，那沉甸甸的担子里是童年的梦想和希望；随着歌声的传递，孩子们渐渐地能看到一支整齐、威武而雄壮的“担外头”队伍了，队中条条汉子都是孩子们心中的勇士，他们个个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地唱着雄浑而又夹着浓浓方言腔的小调，迈着矫健的步伐，担着同肩的担，拄着同方向的柱杖，甚至在停下来小歇时，小解也是站立于担子的同一侧。据说雄浑的小调能给人以力量，方向性的统一则便于行人通行，而一支训练有素、威风凛凛的队伍则能使土匪畏惧，这些不成文的规矩是由无数次担的经验积累而形成的。

盼呀盼，眼看孩子们就要与担的队伍相遇时，一部分孩子突然转身就往回跑，给大人报信去了，另一部分则悄悄地站在路边，给担的队伍让路，并满怀崇敬的心情，用无比羡慕的双眼送着队伍进村，之后又叽叽喳喳，兴高采烈地在后面跟着喊着。不一会儿，队伍进村了，早有大嫂大婶以及缠脚奶奶等，端着茶点迎接亲人了，村中的新闻一下子多了起来，沉静的乡村充满了笑声。

如今，大山里村村通公路，仍然健在的山里担夫已经不多了，“担外头”成了上辈人美好的回忆，成了足以吸引孩子们刨根问底的故事了。

驿道上的古渡

杨济亮

渡口是古代交通驿道上的节点，古代福州有南驿道、北驿道、西驿道，其中西向和南向驿道都要过江。南驿道由南门过大桥（万寿桥）到峡北，或由阳岐渡江，经大田驿接常思铺通广东省。现存遗址仅盖山镇阳岐午桥。西驿道从城内出北门，穿越小北岭到古田水口，或由西门出发，经侯官芋原驿至水口，通浙江衢州府，此系晋京之路。现尚存小北岭驿道，石路面宽2米左右，多用条石铺就，部分已破坏，保存完整的有正心堂至岭头，上寮至摄头。该石路系宋崇宁初建造。

一、西驿道上的古渡

乌龙江江面宽广，水流平缓。江边有一并不起眼的千年古渡，称芋原驿古渡，是宋代古城怀安县的历史见证。怀安县治初设在芋原江北30里的荆溪镇桐口村，宋咸平二年（999），福州转运使丁谓奏移怀安县治于城西北25里的南台岛北

端怀安村，改“闽越亭”为县衙署。在福州南台岛的西北端，其地有岳山，故又称“石岳”。石岳故有驿站，称“石岳驿”。因此，乌龙江的第一个水段称“岳江”。作为北上南下的中转站，古渡起着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大儒朱熹曾两次驻足于此，留诗赞曰：“停驂石岳馆，解缆清流滨。中流棹歌发，天风水生鳞。”并在芋原渡附近的驿站留墨榜书“芋原”二字。唐代后期，吐蕃兴起，占领了河西走廊，切断了东西方的陆上交流。陆上丝绸之路几乎阻塞，许多贸易由此转到了水路，福州、扬州等港口便承担起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任。怀安窑附近的渡口，也逐渐成为其中的交通枢纽之一。当时，闽江上游大量的物产顺流而下，停泊在怀安渡口，有的转运到福州城里，有的从这里再转运到海外。

乌龙江古代分段称呼，从石岳江开始往下就是洪塘江。这里有个洪塘古渡，从唐末就流传有《月光光》古歌谣：“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不得过，娘子撑船来接郎。问

郎长，问郎短，问郎何时返。”这个渡口风景秀丽，留下许多文人墨客的诗歌。洪塘渡口自古以来也是渔民的谋生场所，江面是他们长期劳作的平台。新中国成立后，洪塘渡口十分繁华，洪塘街早市排满了船民卖鱼虾、蚬子等水产的摊位。渡口运输工具也几度更新，从古时的小雀船发展到大型木船，由原来的人工摆渡、竹篙撑船逐步演变成机械化运输。1991年建成洪塘大桥，洪塘渡口随之销声匿迹。

怀安跨乌龙江对岸便是现在的上街侯官村。

唐武德六年（623），“今闽县地复设侯官县，侯官县城迁至侯官乡（今闽侯县上街镇侯官村）”。直到贞元八年（792），侯官县城才奉旨迁入福州城内（今鼓楼区道山路），初名“侯官坊”。唐代在侯官设县长达170年之久。在这170年当中，侯官古渡作为连接福州与其西部诸县的水路要道，渐渐发展起来，成为一片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之地。当时的侯官热闹非凡，是福州西部的水陆交通和集市贸易中心，商旅往来络绎不绝，被里人和来往商旅称为“侯官市”，凡西行轮船都



芋原古渡

要在此（侯官渡）靠泊运载旅客，装卸货物。明代曹学佺《侯官市》诗中写道：“解缆已更市，榜歌犹未残。镇村垂桔庙，拍水漂麻竿。日泻帆光淡，江澄塔影寒。驿楼经再宿，亦觉别情难。”说明当时侯官市处于西驿道之上。侯官古渡的重要性延续到了民国，即使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路网交通的不便，侯官古渡也还是上街地区的门户，是很多人前往省城的起点和中转码头。

二、南驿道上的古渡

《三山志》记载：“城内直上南台，有江广三里，扬澜浩渺，涉者病之。”奔腾而下的闽江潮水夹带着上游大量的泥沙，在大庙山南麓冲积成两个大沙痕，可供人行走，或供来往船只停泊、装卸货物。因其处于闽江北岸的最前沿，成为天然的码头。涨潮时，人们走上痕，称“上航”；退潮时，人们走下痕，称“下航”。“杭”通“航”，故又称上杭、下杭。从北宋元祐年间开始，两个大沙痕逐渐淤积，大庙山南麓、西麓逐渐从水域中拓出，形成地势平坦的闽江冲积平原。同时，大庙山周边地区也在闽江泥沙冲积下从水域拓为洲地，出现南部之楞岩洲（一称楞严洲，今中亭街一带）和苍霞洲、西南部之帮洲、西部之义洲，与同时成为陆地的上杭、下杭连成一片。“沙痕”变陆地后，因这里靠近省垣，且水运交通便捷，闽江上游的船只便停泊于此，起卸货物、囤仓住宿，而成为水运的埠岸（码头）。

于是街市、商行、邸店、囤仓、货栈、酒楼、学塾、庙坛等相继出现，逐渐发展成为货物的集散中心。

台江上杭街的东段背靠着惠泽山向东延伸的彩气山，在其南麓的山路，同江岸一大片“沙痕”连成一体而发展起来。上杭街西段背靠惠泽山，面向白龙江，在成洲地后，有民众逐渐入居，成街市的雏形时，民众称之“龙江铺”。上杭街从明代开始成为绸缎、布疋、苏广、棉纱、纸张、药业、颜料、钱庄、手工业与各地会馆的集中地。

宋元祐（1088-1093）以前，南台岛居民凡要到对岸苍霞洲，都在龙潭角呼渡，该渡口与下游渡口相对应，故称上渡，现街道名称由此而来。自清康熙二十二年（1533）解除海禁以来，逐步形成福州主要的木材集散地。闽江上游大批木材以排筏运输方式先集中于这一带的水坞中，然后经粗加工再销往省内外及国外。

仓山下渡古称“江南铺”，因为地理位置处于闽江下游，是一个渡人的码头，区别于做货运码头的上渡。早在唐朝时下藤地区已有居民，南宋以后移民增多，至元代已村落连片，共有清安、清泰等10个境，是仓山最早居民区。由于开发早，这里还是仓山古代文化的发源地。元朝时在清安、清泰境内建有仓山最早的书院——藤山书院。从宋至清代这里出了近百位文武举人，占仓山举人总数十分之九以上。东北部港头一带河浦交错，水上贮运便利。民国初期，一些民族

资本家陆续来此兴办工业，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带已有造纸、火柴、锯木、制茶等厂场20多家，工人有2000多人，是福州最大的工业加工区。

下渡再往南走，就到了宋代始设的白湖铺，其附近的郭宅七星桥始建于宋天圣十年（1032）。

《榕城考古略》载：“白湖铺，上接江南铺，下通龙卧铺，有亭曰白湖亭。”白湖亭大约建于明代，后倾圮，成为地名沿用至今。古时，七星桥沿岸曾是客货集散地，有“七星桥横白湖渡”之说。清郑祖庚撰《闽县乡土志》载：“白湖亭有亭无湖，其湖久湮。西南郭宅桥头，七里进省，渡船泊此。”七里指的是旧属闽县的永庆里、积善里、方岳里、还珠里、清廉里、灵岫里、西集里，即今天闽侯的尚干、青口、祥谦一带。书中还提到：“郭宅旧有厘局，凡货由白湖水陆往七里者，皆于此厘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七星桥头商旅繁忙，百舸争流，千帆竞渡。

白湖渡向南最重要的渡口就是西峡渡了。位于城门镇峡北村的乌龙江渡口，是福州通向闽南的重要水路，直到1971年，乌龙江大桥建成后，这里才归于沉寂。“峡江”为“乌龙江”的最后一个水段，《榕城考古略》说：（峡兜江）“上纳延、建、邵、汀之水，下受福、兴、泉、漳潮汐，阔十余里，其深叵测，中有石如砥柱，名浮樵石。下有潭，龙潜其中，岁旱祷雨辄应。江南北各有亭待渡，官募大小舟十数，往来如织，俗谓乌龙江。”

此渡以渡峡江为目的，所以称“峡江渡”。宋代诗人郑侠有诗云“秋风西峡风徘徊……天堑波涯亦壮哉”，可见峡江渡的艰险。北宋宣和六年（1124），俞提刑向以西峡水面五里私商往来之道，命本邑治道，由玉泉院、埔尾、鼓山入新路，经弥陀山、西方院、真隐峡江北岸亭渡枕峰、白鹿寺，逾岭抵福清界，行者便之。明代孙昌裔有《雨中渡峡江》诗：“一苇凌云渡，风生万里烟。山形雄障海，水势远浮天。急雨蛟龙斗，盘涡鸥鹭旋。有情难自遣，愁见此茫然。”明林亦之有《渡峡江》诗曰：“漫言闽海三千岛，休论延津二百滩。怎及乌龙江咫尺，行人未渡胆先寒。”

峡江渡是福州南驿道的重要渡口。但明万历四十年（1612）为避峡江之险恶，曾设“阳岐渡”，从仓前铺折入侯官白鹭铺；由阳岐渡江达闽县蒙山、萧家道诸铺，至大田驿。于是峡江停渡。万历四十一年（1613），因往来阳岐不便，“复自南台起二十里，至吴山建一公馆，于鸡母屿置一浮桥，又由鸡母屿渡江，抵萧家道登岸，又建一公馆。其阳岐铺舍仍存兼行。”清范俊《渡乌龙江》诗：“虎斗龙争事已休，苍茫日夜大江流。半肩踟蹰嗟垂橐，一剑伶俜又蒯缞。渡口人归山雨暮，潮头风起海门秋。投笔何处堪终老，欲向渔翁乞钓舟。”清林枫《夜渡乌龙江》诗：“群山东走水南来，逆浪排空激怒雷。峡势遥拖龙脊落，海潮横击虎门回。断云落月孤帆外，渔火村灯绿树堆。自笑浮踪成不系，篷窗岸帻独衔杯。”这些诗歌在描写峡江艰险和风光的同时，也表达

了诗人各自的情怀和心境。

阳岐渡的渡口在湾边角，古称“杨崎渡”。清郑式金有《湾边角归舟遇雨》诗：“乘风排浪片帆飞，十里江流俄瞬归。两岸林山皆不见，雷鸣云暗雨沾衣。”描写了乌龙江湾边角雨季乘舟往返江岸的景色。清叶大庄有《湾边村》诗曰：“约看寒色赴江皋，苇雪瓢残系短舸。颇怪步来风景异，水痕竟与竹檐高。”湾边古渡口，历史上是福州最繁忙的渡口之一，是南台岛通往闽侯南屿、江口一带的必经之地。2008年，随着湾边大桥的通车，湾边渡口的摆渡船才渐渐消失。

南驿道继续往南，就到了峡江南岸的方山古渡。《三山寺》（卷5·地理类·驿铺）明确记载：从福州往莆田“凡五驿十铺。旧由方山渡，宣和六年，乃出西峡”。说明在北宋宣和六年（1124）之前，福州往南行走的都是方山渡。

在方山之西有瓜山渡，应为古之大章渡位

置。《闽都记》说：“有三峦直下分派如瓜，故称。”临乌龙江。宋潘炳、元郑潜居此。潘炳，字谦之，与兄植皆从朱子游。其学以实为本，不干仕进，学者称瓜山先生。郑潜，字彦船，明洪武中举明经，官参政，与方孝儒友善，坐其死党。致仕，寓居瓜山，创义学，又创义渡，称“瓜山渡”，或称“郑公义渡”。明徐燠《舟次瓜山》诗：“郑公渡口石桥斜，山色重重碧似瓜。遥望炊烟青不断，蓼花深处见人家。”宋时，福建制置使王积翁和福州太守王刚红变节，端宗被逼走南下，水路者由濂浦撤退；陆路者由秀王赵与泽部3万余众，从阳岐渡江至瓜山，不幸被元兵追来，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瓜山民众含泪收葬，并举行普度法会，超度阵亡将士。当年为“戊子”年，以后每逢“戊子”，必做“普度”。“六十年一普度”，成为瓜山俗例。方山渡之南还有尚干渡和大义渡。



龙潭角

风露香尘渡口老

于 丹

东汉史学家袁康《越绝书》笔下的古代闽地：人如仙，依水居，船为车，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传说虽有夸张但美丽。事实是，福州曾多次扩城，每次均开挖新护城河，重重叠叠。唐之后逐渐连成河道水网，与闽江沟通，再与海潮共起落，造成全国独一无二的奇观：潮汐福州。城在水中，水在城里，涛之起时，旋涡飞卷，缭绕如带，江潮一吞一吐，整座小城就随着大海的进退而一呼一吸。端的是：东海之滨，一片无边蔚蓝之上，城如佳人玉肌横翠，吐气若兰，怎一个媚字了得？

有人说古福州如丽江，也是主街傍河，小巷临渠，道路按水道曲直而延伸，房屋随地势高低而组合。临街铺面开在绿叶之间，向溪花窗位于柳梢之上。但是丽江却不曾有与大海共呼吸的旖旎。

与海相连的阔达带来的不仅是诗，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大船闽江行，小轮内河走，人

们以舟代步，方便闲适。故史载古福州“海舶千艘浪，潮田可倾秋”“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至元代，来访的马可·波罗还写道：一条大河宽一里，穿行此城，有印度船舶，常载不少贵重货物而来。水，真真是福州的财运。因此，除去闽江东的魁岐、马尾洪门闽安和南面的螺洲等著名港区不计，福州市区内的大港小渡数量全国无双，堪称百渡之城。

百渡之城水做，如贾宝玉说美人是水做的一般。鸟过无痕水过有迹。福州地名多有“洋”“渡”“洲”“浦”“鹭”“讯”字，全是水痕。由于民国以来的持续填河断泽，福州水网原有的防御外敌、蓄洪排涝、运输货物、市民出行四大功能渐渐退隐，人们也就弃舟从车。正应了沧桑巨变一说。今天，福州水网唯余蓄洪排涝作用。但是渡口还在，虽芦荻茂盛但尚未荒成古垒。因此，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古城，当大力推荐“福州渡口一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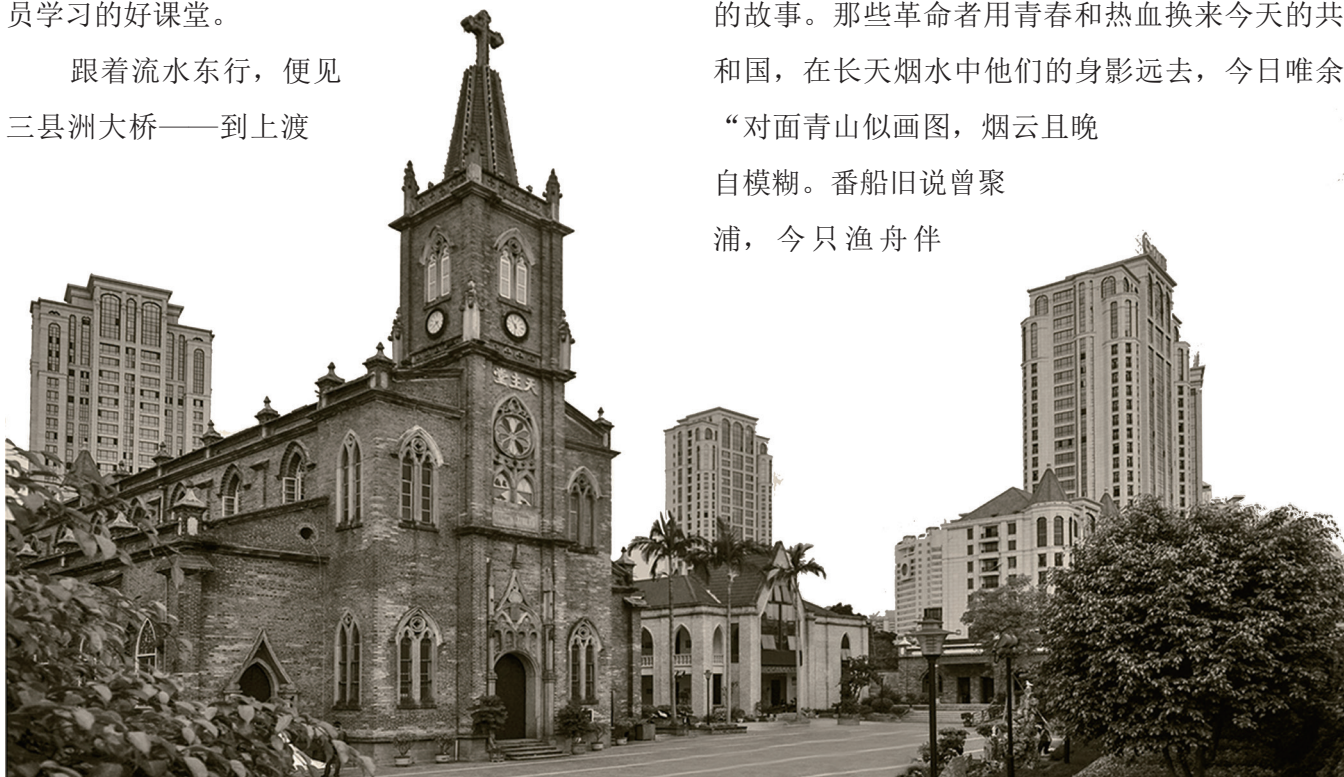
且从闽江入福州的西段开始。从洪山桥西望可见沙滩上石堤如剑，即是淮安古渡口遗址，上游物产毛竹、木材、药材等均从此进入福州。往昔的繁华热闹早已消失在历史云烟中，唯余百岁老榕守着苍茫湍急的江面，听不倦的涛声吟哦朱熹的“晚发怀安”诗句“只有远山青，野色一以暝……”

从此东望，不远处即是1985年建的新洪山桥，而乾隆时代老洪山桥的旧桥墩和桥头石碑依然在旁伫立。石碑上记载着建桥用料价钱和人工费用，明细到一角一分钱。一溜读来，当令今人汗颜。因此，每有游客指点说，此码头应是今天所有交通官员学习的好课堂。

跟着流水东行，便见
三县洲大桥——到上渡

或福建师大的必经之桥。但对于三县洲名字的来历，今人却语焉不详。原来，桥下的江心公园是江水冲刷出的沉积沙洲，周边地界曾分属闽县、侯官和怀安三县，故得名。未修桥之前，日暮争渡酒旗相望，也是一个折柳送别的好去处。

南岸烟台山下的江面现名“泛船浦”——原名“番船浦”，顾名思义洋人从海外经此入城——清咸丰十一年（1861），闽海关便建立于此。17个国家的领事馆皆从烟台山上俯瞰江面。曾有一张18世纪的福州旧照片，记录的洋人等船的情景十分有趣。众多的外籍房产和办公地成了最好的掩护，因此，中共福建省委地下机关曾有两年便设在此地，演绎着比今天电视剧更加惊险生动的故事。那些革命者用青春和热血换来今天的共和国，在长天烟水中他们的身影远去，今日唯余
“对面青山似画图，烟云且晚
自模糊。番船旧说曾聚
浦，今只渔舟伴



苇芦”。

仓山的北岸便是台江，岸上江面均为昔日福州商贸活动的中心。今天的台江百货即是往昔第一码头的旧址，而后向东依次排开码头10个，可见当年的船运之盛。但很少有人知道，中洲岛曾是国外轮船的修理和建造基地，在东南亚享有盛名。

当年，第一到第十码头大货船来来往往，客运货运交集，那繁忙堪比今天的港岛与九龙之间的水道。洋人、富贾、妓女、掮客穿梭云集，又像旧日的上海滩。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台江码头依然货轮满仓，客轮络绎不绝。如果司马光到此，恐怕也要吟哦“万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风酒并垆”。

曾几何时，轮渡渡江也是市民的平常功课。台江与仓山之间轮渡每人只要两分钱，肩挑背扛的乡亲闲适渡江，也免得在万寿桥上步行，鼻尖磨蹭，汗流浹背难过。

台江的苍霞洲和仓山龙潭角南北渡口，堪称文青一对。此处水面开阔，但不至于苍茫无际。白昼绿荫杂芳变幻映日，夜来江涛虫鸣幽逸对月。文学史上独一无二大翻译家林纾的故居便在此地。

南台十景之一的苍霞晚照，曾是著名的香艳之地，艳霞月色波影中笙歌不歇。歌妓按照福州习俗裸足待客，给客人斟酒时单足挺立，在摇晃的游船内动人别致。不少歌女仰慕林纾，以为能将《茶花女》翻译出回肠荡气的书生一定多情。

不承想她们均被婉拒。相反，林纾抱着对底层女性深切的同情，将其人其事一一展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实在太有理由期待着他的旧居兼学堂“苍霞精舍”开放的一天。

从诞生到9岁，近代大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在苍霞洲边度过了童年。今天，严复公园内芳树无人花自落，严复雕像临江而立，“天演亭”上的楹联——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或风或雨或涛或浪，声声呼唤着思索。可谓“苍霞无所



天演亭

有，聊寄一江春”。

对岸的龙潭角，背山临江。表面温柔一湾碧泓，实则水深凶险，旋涡处处。在此搭渡船要分外小心。后来曾辟为公共游泳场，是少有的风光旖旎之游泳地。大概出于安全考虑吧，不久游泳场也关闭了。冷清了几年后，有风雅老板在龙潭角公园开了渡船餐馆，但不久也闭门大吉。究其缘由，大概旧文青一辈老去，小鲜肉们虽然犀利，却不解真风月吧？今年一回到福州，就有新老文青相告：龙潭角公园又开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江南还有上渡、下渡、洋洽、白鹭岭和湾边等渡口，似一颗颗珍珠，遗落在年复一年的莺飞草长中，有心的行人或许有邂逅的奇遇。

八一七中路工商联旧址内有一古榕，旁插一竹篙，为古渡口遗物。不妨伫立片刻，是否能感觉到水道上的隐秘往事？比如，很久很久以前，福州中共地下党给游击队送枪送药，或热血青年在江湾开会谈理想？如迷宫般的水网连接闽江，既是最好的掩护，也是给闽北游击队运输武器医药的通道。曾有一部电影《地下航线》，描述的便是地下组织给闽北的游击队送枪支药品和给养的故事。提到此事，我想，我们真不应该让渡口这般寂寞老去。无论春秋如何更迭，青春应当留痕，有家国情怀的青春尤其值得赞美。

闽方言里码头和渡口统称“道头”。台江一区就曾有道头 25 个组成“台江讯”，后正名为台江码头，其实是许多渡口总称。台江码头举足



外国传教士拍摄的民国时期的洪山桥

轻重的地位，关乎国家利益。人工河道“直读新港”在 1484 年（明朝期间）建成，台湾和海外琉球国、菲律宾、越南、印度的船便可由此直达福州市内。商人使者们留居之宾馆名曰“柔远驿”，今天的新港街福州开关二厂便是旧址。虽然已经不复万商云集华夷杂处的辉煌，但意指航道笔直贸易诚信的“直读”二字，依然是不息的警醒。

从水部（今福新路）到台江讯共有 14 座桥跨越 14 条内河，凡桥处皆渡口。万寿桥河口渡旁的是第 12 桥。以号码给桥命名，可以看出当年市政管理的规范化，也风雅。令人想起“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闲美澄和来。

从台江到鼓楼一路水巷无数小渡口，水波荡漾，浓荫夹岸。只是行人步履多匆匆，无人停留片刻，默哀逝去的芳华——岁月的残忍纤毫毕

现。最旖旎处在安泰桥：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当年无处不是舟楫桥楼红纱笼青榕，酒市歌台波光荡画船。拾级几步台阶，便可濯水戏浪。时至今日，暗雨昏黄中只须凭栏片刻，便能感受到另一个时空在晃悠，灯影下隐隐约约似有美人纤腰微步上下画船。

这感觉太真实了，以至于总有人想垫高河底，引流恢复河道。结果很不理想。逝者如逝夫，与其恢复内河以前的水位，倒不如修复几个有代表性的渡口，使今人有所抚摩有所思古有所寄托。

从《诗经》始，渡口在中华文化中从不缺席。渡口总有新诗，渡口总有离别。此渡口到彼渡口，往往就是一段或全部的人生。所以渡口总有仪式，或刻骨或神圣，或牵手或分别，或遗忘或原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渡口，用以珍藏心底最隐秘的时光。

所以，渡口不止是地理概念，也是心的丈量。即使被摒弃的渡口，在春日秋风里也总有微尘雾气扬起，那是渡口的灵魂。

站在渡口边，我们，曾经仰仗渡口而生存的福州人，如此这般地，就成为瞬间的哲学家。



洪山桥西岸古榕

闽中断桥洪山桥

三米深 / 文 图

洪山桥下盈盈水
不为离人洗泪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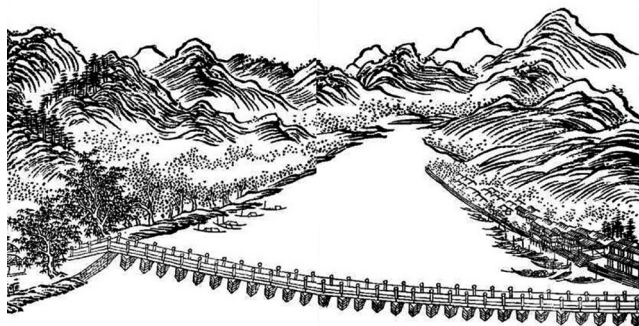
——（清）张学举《洪山桥诗》

从“洪桥夜泊”说起

朋友从杭州旅行归来，一脸失望地说：“还人间天堂呢，且不说那武松和苏小小的墓是真是假，雷峰塔没倒，断桥竟然也没有断……”看来朋友这趟杭州是白去了。我用手机打开“百度百科”跟他解释，“断桥残雪”是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因冬雪时远观桥面似断非断、若隐若现于湖面而得名。可是朋友并不买账，他说：“这些十景八景的名目，都是你们这帮文人无中生有的把戏罢了。”

我告诉朋友：“要看断桥，何必千里迢迢跑到浙江去呢？我们福州就有一座，而且真的断

了。杭州有西湖，我们福州也有，并且这座断桥还位居福州西湖八景之列，名曰‘洪桥夜泊’。”朋友说：“等等，怎么这么耳熟？‘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人家张继写的是《枫桥夜泊》，这个‘洪桥夜泊’听起来怎么有点山寨？你说的这洪桥不会是洪山桥吧？”



民国《西湖志》中的“洪桥夜泊”图

正是。我从书架上取下民国四年（1915）何振岱编修的《西湖志》。其中卷五搜罗了福州西湖古今的名胜。何振岱在明朝诗人徐熌品题的西湖八景外，还列出了当时西湖的新八景，最后一景便是“洪桥夜泊”。据书中记载：“洪山桥，距城西十里，跨洪江上，扼流卧波，亘若长虹。盖与台江之万寿桥，同为近郭之长桥。海道开后，台江千艘云集，人烟繁稠；洪山桥江天寂寥，转见幽胜。维舟渡口，送客桥边，惟见波光空青，沙渚回互；酒楼数楹，风帘映水。却望妙峰诸山，暝烟合后，微月生初，远火忽红，遮林已隐；飞星曳影，掠波有声，诚夜泊之佳趣也。若夫雨夕江干，短篷滴滴，灯凉无焰，醉浅易醒，弥增诗境之幽清，有非画图所能尽矣。”后面还收录了李开叶、林饮、林音、张际亮等四位诗人写的同题《夜泊洪山桥诗》。100多年前，连战的祖父连雅堂造访福州时，也曾写过一首《洪山桥夜泊》：“扁舟荡荡水迢迢，双桨风轻趁晚潮。绝好洪山桥畔月，照人清梦可怜宵。”这般夜景实在美得令人心动。

说到钟声，福州西湖八景中也有一景，名叫“西禅晓钟”，大约是仿杭州西湖的“南屏晚钟”而来。西禅寺位于怡山，距离洪山桥不远，始建于南朝，是福州著名的禅林。月落乌啼之时，夜泊洪山桥的旅客，同样可以在江枫渔火之中，听见西禅寺悠扬的晨钟，忽远忽近，将沉睡的记忆唤醒。

洪山桥的前世今生

洪山桥位于福州城西的洪江之上。闽江从福州穿城而过，遇南台岛一分为二，以南为乌龙江，江阔水缓，以北为白龙江，江狭流急。洪江即白龙江的一节水段。“五虎阶前听法去，双虹水面渡人来。”闽江上桥梁众多，唯万寿桥与洪山桥古而有之。新中国成立后，万寿桥被拆除，改建成了解放大桥，洪山桥却保存了下来。1985年，在旧桥上游约百米处新建了一座公路桥，为了便于通航，拆除了旧桥的桥面。为了保护河床，古桥墩躲过了被炸毁的命运。2005年“龙王”台风，汹涌的洪水冲垮了8座桥墩。今天我们经过洪山桥，依然能清楚地看到这座断成几截的古桥，残存的16座桥墩裹挟着一种饱经沧桑之美。江水缓缓流过，断桥孤立江中，桥面荒草丛生，水鸟纷飞其上。新旧两座洪山桥，一边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一边是斜阳芳草，萧条寂寞，无



民国时期的洪山桥（来源：东洋文库《亚东印画辑》）

声诉说着一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

洪山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浮桥是洪山桥的前身。每逢赶集，老百姓在闽江潮涨潮落之间、水流平缓之时将若干小船于江面并排摆开，在小船之间搭上木板。后来官府将小船固定于江面，以渡行旅。据说，南宋理学家朱熹曾十多次来到福州，都是在怀安古渡上岸，然后走过浮桥，进城会友讲学。

洪山桥本名“洪三桥”。由于南台岛北端的怀安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水路优势，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置怀安县，成为闽江上下游货物的集散地。为方便两岸往来，怀安的九里洪江上，曾先后建起了三座桥。洪一桥又名灵

光桥，建于北宋咸平三年（1000），位于怀安桃源境和荆溪小桥村之间，长约350米，于明万历年间被洪水冲垮。洪二桥又名万安桥，建于南宋绍兴七年（1137），西起怀安郑伯丁村，东至原厝村万安山麓，此处江面狭窄，桥长仅60米，明成化年间同样毁于水患。洪山桥是洪江上的第三座桥，初建时间不详。《闽都记》记载：“万安江口，旧有石桥，门狭，溢水迅急，善崩。”说的便是最初的洪三桥，位于西禅寺渡口与洪塘阵坂村之间，明成化十一年（1475）重建时，桥长419.8米，桥孔36门，其中7个桥墩受激流正面冲击，屡坏屡修。

福建巡抚庞尚鹏认为洪三桥屡建屡毁的原因



古桥墩和拴马碑

在于选址不当，于万历八年（1580）在洪三桥原址上游一公里处重建石墩木梁的新桥，东接高山麓，西与洪塘之山相连，以为“同山遥接，地骨相连，桥乃可久”。据说当时地方官员还打算上奏朝廷请求拨款重建洪一桥和洪二桥，谁知皇帝疑惑不解，御批：“九里何用三桥？”天子金口玉言，地方官员只得从命，于是洪江上只剩下了一座桥。同时为了讨个吉利，避免“接二连三”地毁桥，“洪三桥”被更名为“洪山桥”，希望能够风雨不动安如山。

但是移位和更名并没有使洪山桥摆脱多灾多难的命运。由于江流湍急，木面易燃，洪山桥几度毁于水火。万历三十六年（1608），仅30年后，再次被洪水冲垮。由于洪山桥是进出福州西大门的要道，所以每次桥毁之后官民都齐心协力修复，清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及民国年间屡有修建。其中乾隆三十七年（1772）闽浙总督钟音主持的重建工程最为浩大，将填有碎石的旧桥墩全部改用硕大条石叠砌，铁楔加固，两头做成分水尖，桥面改用石梁，加盖石板，两旁设石护栏，桥长394.5米，宽3.8米，高8.6米，有桥墩26座，桥孔27门，两端还建有阿育王塔、桥头亭、天后宫、雷神殿等，工期长达4年，堪称豪华稳固。我们现在看到的桥墩就是当时的遗存。

关于洪山桥“善崩”的原因，“民以为病”，却找不到科学的解释，于是民间流传着一个“母鸡啄蜈蚣”的传说。据老人家说，洪山古桥形似一条巨大的蜈蚣，江对岸有一座山活像只鸡姆

（母鸡），嘴巴正对着洪山桥。母鸡饿了，就把大桥当成蜈蚣来吃，啄着啄着桥就被啄断了。老百姓为此建造了一座鸡姆寺，将母鸡请到庙里，好吃好喝地供奉起来。母鸡吃饱喝足了，就放弃了去啄蜈蚣的念头。此后洪山桥似乎真的稳固了不少，不那么容易断了。

洪山桥畔的情史

说起断桥，我们首先会想到民间传说《白蛇传》。白娘子与许仙在断桥相遇，借伞定情，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又在断桥重逢，言归于好。这个故事被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进了《警世通言》中。巧合的是，在冯梦龙的另一部著作《情史》里，也收录了一个发生在福州断桥洪山桥畔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姑娘姓张，父母双亡，家住洪山桥西，所以自号“红桥”。

张红桥是远近闻名的文艺女青年，才貌双全，大户人家上门提亲，她都回绝，因为她希望嫁给一个像李白那样有才之人。于是吸引来了一批以“闽中十才子”为代表的诗人，纷纷寄去情诗，但都石沉大海。永泰诗人王偁最为风流，索性在张家隔壁租了房子，站在窗前就可以窥见张红桥的闺房。他的情诗以香艳著称：“象牙筠篔碧纱笼，绰约佳人睡正浓。半抹晓烟笼芍药，一泓秋水浸芙蓉。神游蓬岛三千界，梦绕巫山十二峰。谁把棋声惊觉后，起来香汗湿酥胸。”张红桥



冯梦龙《情史》

读后，吓得不敢出门。

此时，福清诗人林鸿正好辞官回乡，前来造访故友，碰巧看见张红桥在月下焚香，一见倾心。他吸取了王偁的教训，写了首纯情的诗，托房东老妇转交给张红桥：“桂殿焚香酒半醒，露华如水点银屏。含情欲诉心中事，羞见牵牛织女星。”没想到触动了芳心，很快得到了回复：“梨花寂寂斗婵娟，银汉斜临绣户前。自爱焚香消永夜，从来无事诉青天。”林鸿喜出望外，请老妇做媒，一个月后就搬进张家，同床共枕。他们朝云暮雨，一唱一和，林鸿的诗常常以“红桥”二字结尾，而张红桥诗歌的最末字必是“鸿”字。有一次林鸿被王偁叫去应酬，月上中天，张红桥还站在桥头静静守候。“露湿暗香珠翠冷，赤阑桥上待归鸿。”令林鸿非常感动。

一年后，林鸿赴南京任职。张红桥独坐小楼，每天痴痴地望着窗外的洪山桥，希望林鸿骑

着高头大马来接她。她与林鸿虽有夫妻之实，却无夫妻名分，担心林鸿留恋外面的繁华与春色，始乱终弃。张红桥望穿秋水，总算盼来了林鸿寄来的诗词，但是满纸相思却无一句承诺。她陷入深深的迷惘，终于积郁成疾。待林鸿从南京赶回，张红桥却已阴阳相隔了。林鸿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张红桥留下的半阕《蝶恋花》和七首绝句，字字痴情，句句幽怨。读到“衾寒翡翠怯秋风，郎在天南妾在东。相见千回都是梦，楼头长日妒双鸿”“一南一北似飘蓬，妾意君心恨不同”时，林鸿已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此后林鸿便终生不娶，每次经过洪山桥，看着江水依依，都会痛彻心扉。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仔细想来，张红桥与钱塘名妓苏小小的经历颇有些相似。苏小小年幼时父母谢世，住在杭州西泠桥畔，喜欢与文人雅士来往。有一天苏小小外出游玩，行至断桥，遇见了官宦子弟阮郁。两人情投意合，私定终身。阮郁的父亲听说儿子成天与妓女混在一块，用计将阮郁骗回了南京，强迫他娶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子。苏小小日夜企盼着阮郎归来，可阮郎却再无音讯。苏小小因为相思缠身染上了风寒，年方十九便香消玉殒。

现代著名作家、诗人郁达夫曾用“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诗句来描述年少轻狂的自己，如果用来形容林鸿和阮郁当时的处境，也是再贴切不过的。只是当生命在等待中飘然而逝，纵然悲伤和悔恨也无可挽回。当曲终人

散，一切都为时已晚。好在传世的诗词记录了爱的始终，好在爱还是比恨多一点。

郁达夫与洪山桥

1936年2月8日，郁达夫来到福州的第五天，在南后街的书店里买了部《闽中十才子诗钞》。《明史》记载：“闽中善诗者，称十才子，鸿为之冠。”不知郁达夫是否从林鸿的诗行中读到了他与张红桥之间的爱与恨，但是他或许不曾想到，有朝一日经过洪山桥，会和林鸿一样，发出

“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

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被誉为“杭州第一美人”。1927年1月，32岁的郁达夫在朋友家中偶遇19岁的王映霞，一见钟情，次年结为夫妻。他们郎才女貌，被视为神仙眷侣。正所谓“七年之痒”，七年后，他们原本美满的生活被一座房子毁了。1935年，郁达夫在杭州场官弄购地盖了座“风雨茅庐”，欠了一屁股债，仅靠稿费和版税根本无力偿还。为了还债，郁达夫应邀来到福州，任省政府参议。郁达夫本对官职毫无兴趣，可是这份工作可以给他带来每月300元的收入，还可



王映霞来福州时在光禄坊的住处

以顺便游览一番，激发创作的欲望。

郁达夫到福州后，两人过上了两地分居的生活。福州也确实给他带来了不少灵感，他文思泉涌，写了许多文章。他在作品中毫不吝啬地赞美福州女子：“她们的美的水准，比苏杭的女子要高好几倍……眼睛个个

是灵敏深黑的，鼻梁个个是细长高突的，皮肤个个是柔嫩雪白的……”（《饮食男女在福州》）让远在杭州的王映霞放心不下。在《闽游

滴沥之六》中，郁达夫还提到了洪山桥与万寿桥畔的妓院和风尘女子：“福州二桥的著名，一半当然是为了它们桥身的长，与往来交通的重要与频繁，可是一半，也在这种行旅之人所缺少不得的白面女姣娘。”王映霞担心郁达夫在福州抵挡不住诱惑，于1937年3月来到福州。

王映霞在福州住了3个月。郁达夫带着她游玩了几处名胜，品尝了许多美食。郁达夫钟爱闽江上的风景，他曾在《闽游滴沥之二》中将其比作中国的莱茵河，“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所以他常和王



光禄坊内郁达夫、王映霞蜡像

映霞雇一只小舟，溯闽江而上，然后在洪山桥上岸，去义心楼用餐。洪山桥畔的义心楼，以品赏形同比目鱼的贴沙鱼著名。郁达夫看着王映霞吃得津津有味样子，不由想起卢照邻的诗句：“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5月，王映霞以生活不适为由返回杭州，之后不时传来有关她出轨的谣言。郁达夫长期漂泊在外，王映霞难免空虚寂寞，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便趁虚而入。抗战爆发后，王映霞避难丽水，与许绍棣传出同居的绯闻。1938年3月，郁达夫奔赴武汉抗日，发现

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记录了王映霞失身的经过。两个人的争吵不断升级，感情也在冲突中慢慢消耗殆尽。

1938年秋，郁达夫再次应邀回

到福州抗日。旧地重游，恍如隔世。他在《毁家诗纪》原注中写道：“船到洪山桥下，系与映霞同游之地，如义心楼之贴沙，为映霞爱吃的鲜鱼。年余不到，风景依然，而身世却大变了。”半壁河山沦陷，妻子红杏出墙，可谓国破家亡。郁达

夫惆怅不已，写了首《舟泊洪山桥，是两年前与姬共游赏处》：“千里行程暂息机，江山依旧境全非。身同华表归来鹤，门掩桃花谢后扉。老病乐天腰渐减，高秋樊素貌应肥。多情不解朱翁子，骄俗何劳五牡騑。”郁达夫想极力说服自己原谅妻子的所为，希望可以破镜重圆，但是覆水难收，他们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

福州有幸，留下了郁达夫的身影和文字；洪山桥有幸，见证了郁达夫最后的幸福时光。但遗憾的是，福州之行竟成了他的“毁家之始”。我有时设想，如果郁达夫不曾来到福州，他就不会后院起火，也许他们的婚姻就不会破裂，郁达夫也不会投荒南下，客死他乡。但是人生没有如果，我们无法预见未来，只能为无常的人世叹

息。洪山桥还在，可是过桥的人已经淡淡远去，只留下一串废弃的桥墩，断断续续地向彼岸蜿蜒而去。江水冲击着船形的桥墩，形成一道道激流，有的桥墩倒下了，有些故事在岁月的流淌中已经难辨真假。黄昏来临的时候，落日衔着远山，夕光把古桥染得通红，我们仿佛穿越了时光，看见朱熹踩着浮桥从对岸款款而来，看见张红桥倚着栏杆等待着不归的林郎，看见郁达夫和王映霞从桥洞中穿过，等待夜泊的小船正缓缓地靠岸。我忽然明白，断桥之美在于其“断”，如同维纳斯的“断”臂。我想百年之后，那些故事的主人公心中已无遗憾，因为有了遗憾，才构成生命的完整，因为他们要走过的路，要经过的桥，都是命中注定。



逝去的“黄金水道”

邹挺超 郑宗伟

1959年，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以闽江航运为背景的影片《地下航线》。影片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闽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号”司机、共产党员林森官等一批革命先辈，利用闽江航道，开辟了福州与闽北革命游击区的“地下航线”，为配合大军南下福建做出积极贡献的故事。

影片中讲述的“地下航线”，自古以来就是福州与闽江上游联络的交通命脉，凭借这条命脉，多山的闽北与面海的福州，得以跨越复杂地形的障碍，实现山区的大米与海边的食盐相互调剂，保障着两地百姓的日常生活。

到了近代，轮船的出现，又让闽江水运成为闽东、闽北解决“闽道难”，实现交通近代化的突破口。影片中提及的闽江轮船有限公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但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越来越便捷的时代，闽江水运似乎在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



老电影经典珍藏《地下航线》

从木帆船说起

提到闽江航运，必须从木帆船说起。福建先民很早就伐木造舟，木船和木帆船作为传统民间水路运输的工具，在近代福建也活跃于闽江航道上。

当时，福州上游最大的帆船是一种不搭载旅客的盐船，叫作“鸬尾”，又叫“课差”，载重500担（约合25000公斤）左右，往来于福州至南平、洋口、沙县，在闽江丰水期可以从南平到建瓯。这种船一般能装运每包300斤的食盐150包，除了食盐外，从福州上行时还捎带一些杂货，以及面粉、洋油、冰糖、咸鱼等，而从南平下行时，则装载米粮、茶叶、纸张以及各种山区土货。

由于闽北各县产粮而缺盐，福州沿海则产盐而缺粮，因此，这些盐船实际上起着省内物资调剂的作用。早在14世纪末，便有一些商人在闽江南岸的天宁山北麓开设盐仓码头，这一带此后几百年间一直是福州乃至闽西北的食盐航运中心，今日福州的“仓前山”便得名于这一带的旧称

“盐仓前”。

在闽江航道上活跃的还有一种“鼠船”，有“大鼠”（载重200~300担）和“小鼠”（载重100~150担）之分，兼载客、货，“大鼠”一般通行到建阳、拿口、下茂等地，而“小鼠”则通行至建阳、水吉、将乐、邵武、永安等地。

此外还有载重30~60担的“雀船”，可通至松溪、崇安、光泽、泰宁、建宁、清流等地，并能深入尤溪、古田溪、梅溪、大漳溪。

由于福州的粮食长期不能自给，在当时，主要依靠闽北运来的大米，这种米粮称作“溪米”。建宁、泰宁的不少商贩都在富屯溪支流金溪上游制作“雀船”，就地买来大米，装载半船，到洋口再补购大米装满，运到福州，连船带米一起卖掉，省去逆水行船的麻烦。



在帆船不能通行的溪流上，还有各种小木船和木排、竹排。对于产自闽北山区的木材，木排几乎是唯一的运输方式，木材砍伐后沿山间辘道滑入溪河，集中后再用竹钉、硬木及竹篾捆扎成排，每排头各有一名排夫操纵，驾筏顺江而下至福州，装上海轮出口。在闽清、闽侯等地甚至有人直接将柴片放入溪流，通过闽江漂至福州，再捞起出售。

1853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波及江西、广州，产自武夷的红茶无法经由江西运往广州，清政府不得不开放福州港茶禁，从此，武夷茶通过便利的闽江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福州，著名的福州茶港应运而生。

在此之前，由于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广州茶商垄断着福建茶叶贸易，闽江水运的便利

性无从发挥。这一点让精明的英国商人无可奈何。当时的英商看到茶船从武夷山星村驶到福州仅仅4天，即便航运不便利的时候也只要8~10天，比绕道江西再南下广州节省大量运输成本。在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谈判时，英国人坚持要让福州加入通商口岸，就是看中了闽江航运在武夷茶输出方面的便利性。

福州港茶禁开放后，数量庞大的茶叶从闽北各地装袋封箱，雇工挑上溪船，顺流而下抵福州，再装上海轮，行销海内外。闽江水运成为支撑福州茶市的黄金水道。

随着福州港的兴盛，在闽江下游，负责由马尾转运海上货物到福州台江的驳船越来越多。由于晚清至民国时期，福州设有海关，需要验关的货物也交由驳船接运，这种驳船叫“洋驳”，载重



500 ~ 1000 担，主要在报关行承接业务。不需要验关的散货则由“煤驳”转运，另外还有各种载重 70 ~ 100 担的“小驳”。在当时，闽江南岸的福州仓前山由于是海关所在地，商船如织，一派繁华景象。

轮船时代，从生命线到黄金水道

1866 年，左宗棠奏请在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局，3 年之后，闽江下游马尾、川石之间开始出现国产兵轮的身影，紧接着，福州与马尾之间开始有海军差船往返。

闽江航运的轮船时代便从此时开始。

由于闽江上游航道地形复杂，轮船运输首先在相对平易的下游兴起。

1875 年，一位精明的连江商人林长松首先瞄上了闽江内河轮船航运的商机，他买下了一艘轮船，取名“宝远”，开始在福州和连江琯头间搞起了客运。

紧接着来的是英国人。一位名叫哈蛮的英国商人买了两艘小轮船，一艘是他独资，另一艘则是与华商合资，开始在福州洪山桥和水口之间的平水航线上承揽客运、货运业务。1880 年，这两艘轮船被福州地方当局扣留、没收，直到 1884 年才交给英国领事 3000 多元发还哈蛮结案。

尽管平水航线发展得不顺利，但是下游的轮船运输从这时起却明显多了起来。就在 1880 年，筹办中的英商福州冰厂买下了一艘小轮船，

在福州台江和马尾之间承揽客、货运输。同时，一位辜姓商人也买下了一艘小轮船，在福州承揽客运，由于生意很好，第二年他就又添置了一艘小轮船。1881 年，上海轮船招商局在福州设立的办事处也有一艘小轮船在闽江下游往来，而在马尾，有人在旧式木船上加装买来的轮机，开始在闽江上行驶。

甲午战争之后，内河轮船运输逐渐开禁，沟通闽江上下游的福州、水口间的平水航路再度兴起。1895 年，福州陈姓绅商置办一艘水轮船在平水航线开始运营，第二年，他又加购一艘轮船，投入这条航线进行客运。

这一时期，福州到长乐也已经有 5 艘商办小轮船在运营。发展到 1901 年，根据当时外国人写的《闽海关十年报》，闽江上已经有 15 艘本地人经营的交通汽艇在运营，“乘客很多，业务很兴旺”。

1903 年，福州绅商张元奇、刘鸿寿合资买下一艘轮船，取名“江甲”，在闽江下游营业。不久之后，又先后添置了“江乙”“江丙”“江丁”“江巳”等 4 艘轮船，分别运营福州至长乐等地的航线，成为闽江内河颇具规模的一家轮运企业。

1907 年，两人又买下两艘小轮船，运营平水航线，不过，由于英国商人在短短时间内连续投入 3 艘轮船到这一航线，削价竞争很快开始。这时，由于张元奇要出省做官，刘鸿寿见无利可图，便将平水航线的两艘轮船卖给同乡，接着又将其他 5 艘轮船全部拍卖。就这样，拥有 7 艘小



闽江上的舢舨，摄于1915～1920年



福船船尾装饰

轮船，称雄一时的闽江民族资本轮运企业结束了辉煌。

晚清至近代，福建内河航运基本集中在闽江流域。由于闽南地势较为平坦，华侨投资长途客车较多，以漳厦旅程为例，轮船只能到漳州石码，石码到漳州龙溪的20公里路程只能靠汽车。与此相比，福州与闽江上游之间的旅程，却以山地为主，山区建设公路不仅困难，而且建好后旅客通行也不易，至于货物，水路无疑比山路成本更低，因此，闽江流域迅速成为内河航运的“黄金水道”。

向上游进发

虽然闽江下游轮运发展较早，然而，水口至南平的一段水路，却因航道浅滩太多，小轮船无法通行，因此，上游轮运在民国初年始没人敢

于涉足。

1922年，英商祥泰木行为了探查闽北山区木材状况，在一艘木帆船上加装一部柴油机，命名为“祥泰”号，沿闽江上行到了南平，随后又驶入沙县、永安，沿着富屯溪、金溪深入顺昌、将乐，并沿建溪到达建瓯。

受到“祥泰”号的启发，“鸪尾”船主江礼品开始打起了上游航程的主意。他常年在闽江上游航线行船，对各处浅滩十分熟悉，便仿造“祥泰”号的做法，在福州定制了相似的船体，命名为“安宁”号，1926年试航南平成功。此后，他便在福州与南平之间营运，由于获利颇丰，他很快又添置轮船，并开辟了建溪航线，可以在闽江丰水期直抵建瓯。

1927年，美商同昌洋行的“飞鹰”号轮船驶入富屯溪，到达顺昌附近的洋口。不久后，“飞鹰”轮由几位“鸪尾”船主买下，开始经营福州

到洋口的航运。1928年，沙县航商潘伊铭也开通了沙县航线。上游的航运业开始全面展开。

由于轮船航行比帆船安全可靠而且耗时更短，受到客商和旅客的欢迎，帆船业主很快感到了威胁。1927年，他们成立了“福建溪河江船民总工会筹备处”，掀起风潮，在福州组织纠察队，破坏轮船运输，上游轮运一度陷于瘫痪。当时的福建省政府出动沿江沿溪各地警察弹压，在风潮暂息后，又由省水上公安局召集双方开会，在1928年达成协议，汽船永远不得载运米、盐，以保障帆船船主的利益。此后，又裁定上游纸张，下游的洋粉、洋糖、洋油等一概由帆船运输。帆船业本想一并垄断茶叶运输，因为茶商的抗议不得不作罢。

帆船运输成本比之汽船无疑更高，然而，由于国民党设在福建省的党部的支持，经营米、盐、纸张的商人不得不承受这一成本压力，这一仲裁规定此后又屡屡重申，在当时人看来，不仅造成了奸商抬高米价、盐价的机会，更打击了原本就处于艰难经营中的纸业。直到1937年，才由福建省政府函请国民党省党部暂停。

由于福建地形的特殊性，轮船行驶仅限于干流河段，在闽江支流、内溪等水道狭窄的地方，轮船根本无法驶入，完全是木帆船的天下。而这一仲裁规定又为帆船的生存提供了空间。因此，直到1934年，福建省政府建设厅船舶管理所编制的资料中还记载，当时全省共有木帆船88种，28670艘，在这些木帆船数量中，以闽江水系木

帆船居多。

尽管如此，上游轮船航运业还是迅速发展起来，许多“鸠尾”船主都意识到了转业的必要，因此纷纷涌进轮船航运业。而上游以柴油机为主的轮船也倒逼着下游轮船业的变革，此后，福州至闽江上游的轮船几乎全改用柴油机，蒸汽机基本绝迹。

有趣的是，在近代，闽江下游航运所使用的轮船反而比上游要小，这并不是因为下游不能通行大船，实际上，与上游相比，下游江阔水平又少险滩，完全可以通行大船。这是因为，在上游与福州之间往来的轮船以载货为主，为了大量运出山区土货，排水量接近航道容纳的极限；而下游则货运量有限，客运较多，如果船只过大要等客满，启程需时较长，因此，航速高的小轮船更受青睐。

从无序到有序

民营航运业的蓬勃发展，让官方很是眼红，这一点在1934年信奉统制经济的陈仪入主闽政后表现得尤其明显。

1935年，福建省政府建设厅设立“闽江运输处”，实施专项治理，对所有轮船进行检验甄别，淘汰船体、船机较劣者，调配剩余者，实行统一管理。1936年，建设厅又责令闽江上下游轮船按航线分别组成各分线公司。迫于官方压力，上游各轮船主被迫以轮船入股，成立了11家轮运公

司。

1938年，官方又强迫上游7家公司组成“闽江上游延建洋沙四线轮船联合办事处”，第二年，在此基础上又成立“闽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1940年，闽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在福州正式成立，并逐渐统一了上游各航线的轮运业。

抗战时期，闽江下游轮船损失惨重，然而，1944年成立的“闽江轮汽船管制委员会”，在督促中下游各航商组织公司时，却在入股方式设计上无视船只损失者的利益。官方这种粗暴的做法，招致了航商的抵制。尽管如此，官方还是强行推动，在1944年又成立了福州平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和闽江下游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与闽江轮船公司并称“闽轮三公司”。

三公司的成立，将闽江上中下游所有民营轮船都收归官营，实现了对航运利益的垄断。不过，客观地说，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福建地形多山地丘陵和河谷盆地，复杂的地形阻碍了省内与省外乃至省内各地的客、货联系。在近代，许多人都意识到水陆交通近代化对于福建发展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在闽南，众多侨商投入大量资金建设长途汽车公路，而在闽江流域，则是轮船对旧式帆船的逐步取代。

然而，在轮船航运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众多无序发展的现象。截至1934年止，闽江水系共有轮船183艘，营运航线达到27条。由于缺乏统筹规划，不仅供过于求，轮船主之间的倾轧及轮、木船主争讼屡有发生，危及航运正常进

行，而且，在狭窄的上游河段，众多轮船与木帆船并航，安全也是个问题。

这一点在1945年闽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编印的《闽轮五年》中也有所追溯。

在官方的种种统制措施背后，当然有官方垄断航运利益的需要，《闽轮五年》中所提到的实行统一管理、促进航运业合作，也并非全是虚言。对于转变闽江轮船航运业无序发展来说，也不能不说三公司的成立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抗日战争时期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福州与上游之间的往来更频繁，成立闽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对闽江上游轮船运输进行一定的整合，统一经营，对于保障福州与闽北之间人员往来、物资疏散的水上运输线也是必需。

抗战结束后，内战随即爆发，由于物价暴涨，轮用油价上涨好几倍，航运成本高至难以维持营业，三公司只能勉力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三公司合并为福建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仍为私营。

随着公路建设的进步，闽江航道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荣光，2002年客运基本停航。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越来越便捷的时代，“闽道难”的情况已经不再，闽江水运自然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

交通功能的淡化，或许并不是闽江航道荣光的终结。随着旅游业、游艇业的繁荣，它的荣光，或许将用另一种方式来呈现……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福建省档案馆）

动车线上双城记

郭大路

动车线上 2200 年

从福州出发，经福鼎出省，往浙江温岭车站，穿过台州、宁波，便到绍兴北站：G56 通往南京的这一截路线，2200 年前，人们已经走过。

——在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中，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汉武帝派四路大军攻打闽越国，其中有一路便是“出若邪、白沙”，若邪在绍兴东南部，白沙在与温岭只隔一水的乐清县东。这样的记载说明，今天的动车线路，当年或已是通途。

动车两头的城市，当时并不叫南京与福州。更早的时候，它们都有过“冶城”与“冶山”。东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 495），吴王夫差，对，就是被西施一骗到底的那位，在现今的南京市朝天宫后山设立冶城，铸造兵器。那一处被称为“冶山”，后面有过“铸剑池”遗址。

取代夫差上位的，是越王勾践。公元前 472

年，勾践令范蠡在今南京中华门外长干里筑起“越城”，这是南京城市历史的开端。

100 多年后，勾践的六世孙无疆被楚威王熊商打败，越王族南奔，其中的一支大约也“出若邪、白沙”，来到福建，七传至无诸，便自立为闽越王。是的，无诸为福州人所铭记的第一件事，便是在今日的福州城内、冶山之麓建都。这位无诸，是把秦淮河边的“冶城记忆”，放在福州“复制粘贴”了一遍？冶城，可算是福州建城之始。到公元前 110 年余善被灭，闽越国存世 92 年。

赶跑勾践子孙的楚威王，于公元 333 年置金陵邑，给了南京第一个城市名称，兴灭之间，他也成了闽越立国的间接推动者。

或许是巧合，我到达南京的第一天，随意走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长干门。南京现今的长干门是 2008 年的新建筑，全用大石，砌高至 20 多米，朴素大气，全没有今人的浮华。新长干门 1 公里外，就是长干里故地，临着沉静宽阔的秦淮

河。

在500年前，来到南京的明代福州学者谢肇淛，也和我一样，说他对南京是似曾相识。他说，建业（即南京）之似闽中有三：

“城中之山，半截郭外，一也；大江数重，环绕如带，二也；四面诸山，环拱会城，三也。”

清代闽侯人李彦章写了一首诗：“一笑江湖梦里游，石城胜地暂停留。客中风月收罗尽，差喜金陵似福州。”

孙吴与福州的旧事

孙权的哥哥叫孙策，孙策是个很有才的大帅哥，娶的是“二乔”里的“大乔”，老百姓也都喜欢他。本来他大权在握，吴国怎么都该是孙策的，没孙权什么事儿，但孙策……他不该做错了一件事，那就是派人去攻打福州。

打福州是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的事，当时咱们这儿不叫福州，叫东冶。那时孙策才二十一二岁，先派韩晏攻打东冶（即福州），后来叫贺齐拿下了侯官。从此闽江下游归了孙氏。这一仗胜了之后，大概是公元200年，孙策打猎时被杀手伏击伤重而死，只活了26岁。

孙策死前，把大权交给弟弟孙权。孙权在江东积极扩张势力，公元211年，移治南京（那时叫秣陵），建起了著名的石头城。公元229年，孙权手上立了吴国，迁都秣陵（现南京），改名建业。这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被定为国都。大业

是建立起来了，但孙权给大哥孙策的儿子和孙子的待遇和封爵，都是很差的。

孙权接着立了吴国，传位到孙皓不过50年。公元280年，西晋王濬伐吴，大军攻下石头城，孙皓自缚双手出来投降，做了亡国之君。诗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里“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写的就是孙吴最后的倒霉样子。所以结论是：福州城是不能打的——就算打赢，福气也没有了。

三国给福州留下的，是公元260年，孙家在咱们这儿设建安郡，置“典船校尉”，“典”在这里是动词，是掌管、主持的意思，说的是吴国把有罪的官吏贬谪到这儿，造船。地点是哪儿呢？宋代的《三山志》说得很清楚：“开元寺东直巷，吴时都尉营，号船场。”

那时吴国在福州造的海船，“大者长二十余丈……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万斛，大概相当于500吨。造这么大的船，当然是要在很大的港湾才行，所以你请展开历史的想象：既然是“船场”，1800年前，现在福州市中心的开元寺那儿，还是大片水域呢。

安泰河“荔枝换绛桃”与秦淮河的桃叶渡

有人说“福州三坊七巷的安泰河与南京的秦淮河也似曾相识，安泰河畔榕荫伴水，古巷错落，烟雨空蒙与南京的十里秦淮六朝金粉多么相似”，她特别提起福州闽剧《荔枝换绛桃》：五代

闽国时期，居住在吉庇巷南侧的书生艾敬郎，与家住桂枝里河沿的姑娘冷霜蝉一见钟情，女子投荔枝给书生，书生在绛桃上题了“身无彩凤双飞翼”的诗句投给女子，女子又题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诗句还给书生。眼看良缘将成，不料闽王征选宫女，将女子抢进宫去。最后，这对恋人一同跳进柴塔烈火之中，化成鸳鸯，双双飞去。联想到秦淮河边的《桃花扇》，真是“差喜金陵似福州”。

既有相似，也有差别：安泰河边是榕荫，秦淮河畔是柳荫。秦淮河的柳树，“无情最是台城柳”，见了那么多岁月沧桑，还没心没肺长得特别大条，那些老柳树，一个人抱不过来（台城，即六朝宫城，在如今的总统府一带）。另外，河道的宽度也是有区别的，长干门那一带的秦淮

河，该有百八十米宽。最宽处据说有130米。而安泰河，连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和弱女子，稍一用力，都可以把荔枝或绛桃扔到对岸去——所以，这安泰河，顶多是缩微版的秦淮河。

有趣的是，这两条河上都有利涉桥。福州的利涉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安泰桥；而南京人建利涉桥，却是因为秦淮河桃叶渡口很凶险。“风波了无常”的渡口为什么要叫桃叶渡呢？这与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还有关系呢。

话说王献之有个爱妾，名唤桃叶。桃叶时常在秦淮河上往来，每次摆渡看着风浪都很害怕，王献之就为她写了一首《桃叶歌》：“桃仙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桃叶每次坐船，唱着王献之给她写的歌，想着王献之在渡口等她的身影，心里就不害怕了。大概



秦淮河桃叶渡

是因为《桃叶歌》，浪漫的南京人一直没有在那儿建桥，到清顺治三年（1646），一个叫金云甫的实在人，才出资建了一座木桥。这座桥改了好几次，到几十年前被拆除，现在这地方，就只剩了个桥名。

说到这儿，想起了两个城市的河与庙。南京的夫子庙，就在城南的秦淮河畔；咱们福州的孔庙，也是在旧城南边，离安泰河不远。孔庙管道德文章，秦淮河边偏偏就安着六朝金粉声色情欲。南京人看着斯文，其实很嬉皮笑脸，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混不吝的“多大的事儿”。福州人就比较胆小，孔庙附近要么是一本正经的“圣庙路”，要么就是功名利禄的“朱紫坊”，安泰河虽然“百货随船潮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可顶多关起门来玩儿，过的是家常小日子。

南朝时的范缜，在福州干了什么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是六朝时南京的佛教之盛。南京出生的萧衍，在公元502年于建康（南京）即位，年号天监。人称梁武帝的他，做了南朝梁48年皇帝。

有趣的是，《福州大事记》这一年重要记录是：天监元年（502），《神灭论》作者范缜接任晋安太守。

范缜本来跟萧衍很要好的，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在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算是好哥们儿，而且，萧衍起兵时，做过宜都太守的范缜还“迎投衍军”，挺帮忙。他俩后来的矛盾出在信仰上：梁武帝是佛教的死忠粉，范缜偏偏不信神，还写了著名的《神灭论》，与一大帮佛教徒进行论战。



安泰桥

论战输赢这事不好说，但范缜坚决不认输是肯定的，梁武帝就让他去福州当了晋安太守，南京的佛教徒们终于耳根清净了。

范缜在福州4年，史书上只说他“为官清廉”，挺安静。但回到建康（南京）以后，梁武帝却颁布了《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光禄寺大僧正法云写了《与王公朝贵书》，发动佛学界写了七八十篇论文，在理论上对《神灭论》发起围攻，而范缜呢，他虽然一个人在战斗，却不但充实改写了《神灭论》，而且来者不拒，《弘明集》说他“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取得了学术胜利。这场胜利，跟范缜的福州生活该不无关系，那4年，估计他在学术上下了不少功夫。不然的话，何以应战？

其实，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辩论之后，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并没有取缔《神灭论》，而让范缜继续位居国子博士，直至65岁去世。这种学术自由的风气，就算在今天，也是极其难得的。



福州郑和高大上，南京郑和清瘦小

南京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决策地和启航地，郑和受命出使西洋后，就将大部分海船特别是大型宝船交南京龙江造船厂建造。郑和于明宣德八年（1433）第七次下西洋返回途中，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享年62岁。明宣宗特赐葬在南京南郊牛首山南麓，此墓实为“衣冠冢”。福州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补给地和开洋地。

郑和（1371-1433），原名马三宝，回族人，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太监。郑和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家。郑和在航海、外交、军事、建筑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智慧与才识。他是太监，却是宋元明清几个朝代少有的精神上没有被阉割的中国名人。1405年7月11日，中国明朝皇帝朱棣派遣郑和率领船队



从江苏太仓出发，出使西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国家，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在南京生活、任职近30年，一生与南京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南京有不少有关郑和的遗存，南京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决策地和启航地，1985年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全国筹委会决定在该园东南角新建郑和纪念馆，同时将此公园改名为郑和公园。郑和公园占地2.24公顷，内建有郑和全身雕像、双锚亭、朱雀楼和刻有《明史·郑和传》的石碑，园内还有郑和下西洋带回的珍贵植物五谷树和西府海棠。

福州长乐市区的郑和公园里的郑和史迹陈列

馆，在郑和出洋的闽江口南岸的郑和广场、郑和航海馆、“宣德化柔远人”群雕和世界上最高大的大理石郑和塑像等，都是长乐人民为了纪念郑和而建立的。

跟福州郑和的“高大上”相比，南京的郑和有多可怜啊！整个塑像大概真人大小，身材倒像南京男人，清瘦。那公园呢，说是公园，倒像大点儿的社区花园。郑和的身边，尽是些爷爷奶奶坐着打麻将聊天，妈妈、保姆推着婴儿车或者看着孩子在充气游乐堡上跳着玩儿，那氛围真是家常！

看来，倒是福州人更看重郑和。



漂泊的车站

鹿野

—

很多年前，我拖着拉杆箱，挤上了从成都开往福州的火车，那时我并不知道将要去的城市究竟长什么样，也并不知道那里会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火车是个浪漫又世俗的所在，从车窗外尽可以像观众一般置身事外地观看匆匆掠过的真实风景，又可以置身其中，在每个站台停靠的间隙捡拾片段记忆。从成都到福州道路漫长，无尽的黑暗隧道，“轰隆，轰隆”，像被切割的昼与夜，我睁着双眼，努力想看清我所经过的一切，甚至

有种不愿到站的慵懒——就这样安稳地坐在车厢里，看一辈子风景，不去想着如何面对到站后的改变和惊慌失措。

不愿到站，但火车终归要停。

40多个小时的明明暗暗，终于换来了车厢中的骚动。在凌晨4点的车厢中，一车的旅客都被叫醒，过道的灯亮起来了，大家开始翻上翻下整理行李，将熟睡中的孩子叫醒，甚至有人已经拖着行李站到了过道口，等着车门打开的刹那冲出去。

仿佛是为了给大家一个缓冲的时间段，“哐哧哐哧”的铁轨摩擦声一点一点放慢，渐渐停止



了——终于要结束这一路的摇晃与颠簸，天也开始由黑而灰，亮了起来。

福州，就这么进入我的记忆。

二

第一眼见到的福州城实在叫人失望啊，北郊那些低矮的灰砖小楼，胡乱牵扯在一起的高压电线，狭小凌乱的火车站台，似乎都在告诉我，这不是你想象中的海滨城市啊。

那是2004年。一晃十几年了。

刚来福州的半年里，我流连于市区各大招聘市场。仍然记得在温泉路的会展中心招聘市场里瞎转悠的场景。买一张5元钱的门票，进去后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推销自己，但这样的招聘市场所能提供的职位无非是推销员、服务员、房产经理一类，明知道有的简历递出去也是枉然，但仍然不停地复印简历，不停地接受买家的挑拣。以至于后来有了稳定的工作，稍有厌倦之时，便会想着曾经的迷惘，再去招聘市场转一圈，就会打消炒老板的念头。

由于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曾经独

自闲逛到火车北站的广场上呆坐半天。买一份报纸，看着上面的招聘专栏，和一群陌生的旅人如同丧家狗一般挤坐在火车站广场前的花台上。那一刻心情却出奇地平静。看着和我一样飘零的众人，觉得这就是人生。又觉得自己是个灵魂出窍的旁观者，看电影似的看着众人与我呆坐无语。

“剧中人总会有他的命运。时间会安排好一切。”仿佛听到有一个声音对那时候的自己说。

确实，在时间的安排下，我看着自己勇敢地敲开一家报社主编办公室的大门，诚实而恳切地向她推销自己。时间看着我在苦苦等待之后得偿所愿，获得了这份工作，并告别以往莫名的恐慌不安，在这份职业上坚守着，一晃12年。

三

12年间，无数次来往于福州和成都之间，如果有回放，总能看见一个个子小小的女生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走进车站。就像几米的漫画，那个赶火车的女孩从形只影单慢慢变成二人行、三人行，而她身后的火车站也在不停地生长、变化，变得更高大，更宽敞，也更加现代化。



常常被人问起，你为什么来福州呢？是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福州呢？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缘分还真是奇妙呢。我常常想起刚来福州的那几年，跟朋友流连在南后街、上下杭的日子。大概没有哪个城市像福州这样，繁华与破败那么紧密地相依并存。刚刚看过“东百”专柜里面贵得咋舌的洋装、口红，转角拐进南后街那些低矮的小门面，就能买到时尚又便宜的地摊货；而就在离繁华的中亭街几米远的上下杭街区，你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老依姆穿着背心、裤衩坐在棚屋门口晒太阳——这就是福州的节奏，快与慢如此泰然自得地并行着，谁也不去打搅谁。直到近几年，福州城市建设才开始飞速发展，南后街、上下杭陆续换了新颜，但存在于城市深层的气质和节奏却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轻易改变的。

这十几年里，有无数离开的理由，我竟仍旧雷打不动。或许正是这座城市某些角落尚存的慢悠悠的气质还吸引着我，庇护着我，不必被推搡被裹挟着，步履踉跄地往前赶。天长日久，你便像是一棵小小的榕树，盘根错节地扎进了这土壤，想离也离不开了。

四

2014年7月，成都到福州的动车开通，44个小时的旅程，一下子缩短了一半多。福州与成都，从“榕”城到“蓉”城，真正可以做到朝发夕至。对于像我一样两地漂泊的游子来说，故乡

和福州之间的距离大大地缩小了，可以更加自由地来往于两地之间，少了以往远行的踌躇与计算。

暑假带着孩子一起回了外婆家，归来时我们照样选择动车——跟穿云透雾的空中飞行相比，我总觉得列车沿着一寸一寸土地开过的路程才是真实可感的，这才能叫旅程。一路上，隔着窗户看那些崇山峻岭，那些不规则的河流，那些裸露的山梁，以及广袤的田野，每一帧匆匆掠过的画面都似曾相识，都是这些年两地间来来去去的见证。

与最早的火车北站遥相呼应，新建的火车南站位于福州城的最南端，专供动车停靠。以前特别害怕在车站候车时人潮汹涌的时刻，扛着大包的，提着大箱的，都不住地往前挤，生怕自己成为被落下的那一个，裹挟其间，个人变得特别无助和卑微。而这一次，当列车平稳地滑进车站，列车员通知到站的时候，内心再也没有了当初刚来福州时的惶恐不安。牵着儿子一下站台，望见灯箱上的“福州站”几个字，竟有强烈的亲切和安稳涌上心头。

我常常想，如果在古代，这分距南北两端的火车站便是重兵把守的城门。或许在如今现代化的都市开放包容之下，再也没有了进出的限制，但车站大门正前方高悬的几个大字还保留着一个城市区别于另一个城市的一种仪式感。

频繁来去的旅程，已经让我熟悉了进城的暗语，城楼上的士兵似乎也熟识我了，他们宽容地打开这道门，我便算是真正地进入了这座城市。

回望身边拥挤的人潮里，又有多少和我一样曾经张皇不定的过客，如今都变成了归人？

五

十几年的漂泊如今有了落点，在这个城市密密麻麻的高楼里，终有一扇窗户灯光为我点亮。

站在居所的阳台上一眼可以望见一截废弃的铁轨。那是曾经的福州火车东站。虽然未曾感受过车站运力繁忙的时候，但对于远离故乡的人来说，铁轨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仿佛顺着铁路延伸出去，另一头便可到达故乡。于是常在周末午后不由自主地散步到东站的铁轨上，看那些曾经雄纠纠气昂昂地来往于祖国大江南北的火车头。这些锈蚀的火车头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沧桑，有些落寞地守在那一截铁轨之上。如果是人，他们会不会也有说不完的“想当年”？要知道，这里曾经是东南地区最为重要的火车头交换基地，也是全国一等货运站，最为繁忙的货运铁

轨。

年轻的恋人们喜欢来这里散步，他们相牵相扶着，两脚交替踩在铁轨上，如果此时有落日，如果此时把双臂打开摆出要飞的样子，那画面倒也是充满了偶像剧的感觉。可是不免总让人想到海子——这铁路啊，既是制造甜蜜的地方，也是让人伤心的地方。

如今，路上再也听不到呼啸而来的列车。它和人类一样孤寂。除了偶尔来此寻找沧桑感的摄影文青，在他们的影像中，福州东站已然成为最佳摄影基地。

空旷的铁路、疯长的狗尾草、已经停滞的火车头和废弃的铁轨总让人忍不住凝目遐思。而不远处即是子弹头般滑过的高速动车和三环高架桥上飞驰的车流，这一切都是这个城市的昨天和今天，或许也是你我的昨天和今天。过去的时光并没有消失，在越发快速发展的城市道路上，总有人偶尔停下来，回望，总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另一种风情。



掌舵“海峡号”

欣桐

福建平潭“海峡号”高速客滚船于2011年11月30日首航台湾台中，大陆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平潭岛至台湾的海上航线正式开通，到如今，已航行了5个年头。

“航海”一词，从古至今都充满着浪漫主义和冒险色彩。

无数次穿越印度洋、大西洋，历经好望角、比斯开湾的惊涛骇浪，再到终身难忘的“海峡号”首航台中……彭于平人生最精彩的一页写于波澜壮阔的大海之上。

无论如何都难以把这个一派斯文的典型上海男子与茫茫汪洋之上迎风搏浪的远洋船船长身份联系起来。2014年初冬，在平潭澳前码头的“海峡号”船舱与彭于平交谈之际，很多微妙的细节都让我感到，他热爱航海这个事业，对大海的归属感已深入骨髓。那天，他穿着那身出海的工作

装，白色的衣裤，白色的大檐帽，透露出一个航海人的英气刚毅。每周六周天去台湾，对曾经跑过远洋的船长来说，平潭到台中、台北的航线，并不算太难。但谈到刚接到“海峡号”从国外开回福州的经历，彭于平禁不住感慨。万事开头难，“海峡号”作为我国第一艘高速客滚船，要经过大西洋，穿过太平洋回到国内，也是一个创新和挑战。

“海峡号”船身为全铝合金材质，船身轻，船速快，吃水浅，受风面积大，这对于开惯了钢质货轮的彭于平而言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

2011年2月14日，恰逢西方的情人节，拥有20多年航海经验的彭于平受命担任“海峡号”接船组组长，到美国接“海峡号”回家，这是一次长途旅行，整整行驶了1个月。当时驾船的是经验丰富的加拿大籍船员，彭于平一上船就认真地向他们讨教每个细节，逐渐熟悉驾驶。



“海峡号”首航船长彭于平



“海峡号”内景

2011年3月11日接船途中，日本宫城县东北部9级地震引起海啸。“海峡号”行经海啸影响区域时，船舶长时间面临4~6米高的大浪，两国船员通力合作，保证了船舶的安全。“海上不可预测因素太多，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让我对驾驶更有信心。”彭于平说。

闽江系浮筒后，彭于平在公司的领导下与船员们一起投入了船舶转籍工作。由于“海峡号”是中国第一艘高速客滚轮船，转籍工作多数无处参照，要从头搜集整理。那段时间与成箱资料同样多的，还有彭于平掉落的头发。

“以前开远洋货轮时，有成就感、责任感，唯独没有荣誉感。开‘海峡号’不一样，有荣誉感。因为它不仅是运载工具，更是连接两岸人民的纽带。这是继‘两马’‘两金’航行后又一直航台湾的航线，意义十分重大。”

作为船长，彭于平每周都要驾驶“海峡号”

多次往返于平潭和台中之间，每趟两个半小时。这两个半小时对船员们来说，是高度紧张的时段。因为“海峡号”的速度比一般货轮的速度快3~4倍，航行时采取措施、采取避让的动作也要快3~4倍。彭于平虽有着20多年的航海经历，但他说，驾驶这艘目前世界上航速最快的高速客滚船，行驶在服务于海峡两岸民众的航线上，让他觉得压力不小。

筹备、接船、改籍、试航、正式上线……彭于平对“海峡号”倾注了大量心血。现如今，“海峡号”早已成为彭于平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工作中时刻想着它，回家休假还要时刻关心它。

每天运载两岸旅客往返于平潭与台湾之间，下午返程进港时，看旅客们在夕阳的余晖中陆续离开，结束了一天工作的船员们都会有一种满足感。

对于彭于平而言，“海峡号”首航台中的情景，他至今仍历历在目——2011年11月30日，平潭澳前码头，锣鼓喧天，气氛热烈，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深情地说，“三通”之后，最重要的是心通。“海峡号”直航是两岸“三通”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大事，是架在台湾海峡上的一座“同心桥”。

对彭于平而言，这是一次荣誉之行，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这是平潭岛与台湾的“破冰”之

旅。彭于平说：“正是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航行，让我心里油然而升起一种自豪感，一定要把‘海峡号’平安驶向对岸，再平安驶回。”

首航台中正好是平潭东北季风刮得最猛烈的季节。那天，从台中返程时，风力是10~11级，经过台湾海峡这一段海域，突然风高浪急，巨大的海浪打在舷窗前，“海峡号”铝合金穿体结构的船身，在巨浪中晃动得很厉害，船舱里的旅客晕船也很厉害，大家心里十分紧张。但彭于平心里



有底，这艘船从美国开回来，太平洋的风浪比台湾海峡的风浪大多了，是经过实践考验的。

当“海峡号”平安驶入离平潭海域不远的牛山岛，全船旅客欢呼起来，甚至还有旅客流下了激动的眼泪。经过首航这一段特别的经历，爱钻研的彭于平开始琢磨，在台湾海峡航行，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持乘船的舒适度。

经过多次航行，彭于平发现，“海峡号”正常的航行速度是每小时35~40节，在遇到大浪时，如果把航行速度控制在每小时25节，偏20°左右顶风航行，船身会平稳许多，如果横风90°时，船就会摇晃得厉害。以前跑远洋货船时遇到大风的经验，被他运用到“海峡号”上来了。风浪大就适当降点速，海况好点时就立刻提速，根据不同海况采用不同的航行方法，这样风浪对船体的冲击力也减少了许多，船身也会平稳些，旅客舒适度也会增加。为提高安全性、舒适性，彭于平不断总结经验。根据台湾海峡不同区段海况采用不同的航行方法，就是由他率先总结的。

对于安全航行，作为船长的彭于平，自“海峡号”首航台中港的那天起，不管当天是否开航，他都坚持每天巡查一遍船舱内的大小设施。

“我每天有个习惯，一定要到大仓走走看看。大仓主要是用于装货，货物一旦移动，船舶的安全很难保证。检查完大仓我就心定了。”除了检查像大仓这样可以一目了然的地方，每当经过有救生消防器材及设备的地方时，彭于平就会职业性地

扫视空气浓度和液位是否达标。

现在“海峡号”周一、周二、周四、周五跑台中线，周三和周六跑台北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8个月才回家休假一次。这就是彭于平和船员们的生活。

2013年的除夕夜，“海峡号”靠泊后，彭于平晚上与同事们就在平潭澳前码头的宿舍里过年，厨房多加了几个菜。看到不远处玉楼村的村民燃放烟花，那一刻真的很想念家人，但对于长年在海上漂泊的人来说，节假日只是一个形式，在哪里过都一样。

航海二十几年里，他错过了结婚纪念日，错过了孝敬老人的机会，错过了女儿的成长期，但是他不后悔。假如让他重新选择一次职业，他依然会选择当船员。“船员是一份很有挑战性的职业，让你有更多机会去经历，是一份老了以后有很多故事可说的职业。”

现在“海峡号”已经安全航行1000个航次了。2014年11月，习总书记到平潭视察，还到“海峡号”上与乘客和船员们亲切交谈，特别叮嘱“一定要注意航行安全”，还与乘坐“海峡号”的台湾旅行团乘客交谈，询问“是否经常乘船往返台湾”。当时航班行至台北港，虽然那天不是彭于平当班，但听到同事们说起与习总书记近距离的接触，他还是好激动。船长的年龄限制是65岁，想想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船长，坐在驾驶台上掌舵，这是多么帅气和浪漫的事情。

移山填海鹰厦路

夏 雪

—

“筹造铁路，以图自强”，这是福建人尤其是闽籍华侨的夙愿。1905年，福建成立商办福建全省铁路有限公司，推举当时赋闲在家的陈宝琛当总理。陈宝琛以“集股投资，修筑闽路，振兴实业，繁荣家乡”为号召，到南洋各地向华侨募股170多万，于1907年动工修建了一条长28公里、从嵩屿到江东桥的漳厦铁路。不久，陈宝琛被朝廷召进宫去当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辞去总理职务，漳厦铁路只修一段便半途而废了。修成的这一段是“前不过海，后不过江”的盲肠路，从厦门到漳州，两头都要坐船搭车，其速度之慢犹如老牛暮归。民谣唱：“农民上火车，草笠被风吹，下车拾草笠，火车犹可追。”但是连这样一段铁路，到了抗日战争爆发时，也被国民党当局以修筑防空洞为名，将路轨全部拆毁，器材被盗一

空，从而结束了它悲惨的历史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人民修建铁路的梦想才真正成为现实。1951年，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张鼎丞给华东局、党中央写信，要求中央尽快考虑修建鹰潭至南平的铁路，解决福建出省通道问题。信中说：

关于鹰潭至南平之铁路，中央曾拟建筑，后因朝鲜战争发生，计划中止。现拟请争取时间，提前建筑，正式列入1952年计划，并即进行筹备，谨将建议理由，分述如下：

一、福建自解放两年以来，在中央暨华东局正确领导下，各项工作虽得以开展，终以交通不便，海口被封锁，深感困难多端；在经济上，尤为明显，如全省物价始终与省外悬殊，大批土特产如木材、海产、茶、糖、烟、蔗、笋干、果类等，不能大量输

出，所需工业品不能由省外充分调剂，至于潜藏在地下之多种矿产资源，更不可开发。故建筑福建之铁路线，实为今后全省经济建设之先决问题，尤其是铁路所经之处，数百里均为盛产木材之区，如能兴建铁路运出，对解决全国木材供应问题上，实有特殊意义。

二、就军事而言，当更重要。在巩固国防意义上，如铁路干线不完成，终为我们军事上的最大弱点，故建筑福建铁路，在军事上无论现在或将来，均为迫切要求。

三、鹰潭至南平之路线，国民党曾进行过勘测设计，全部资料，现存上海铁路局，

据了解技术上已无困难。经过复勘之后，即可施工。

1952年初，“一五”计划开始酝酿，周总理邀请傅作义、陈嘉庚等20余名在京政协委员座谈，通报了“一五”期间主要建设项目的设想，并谈到要先修一条从南昌到厦门的铁路。陈嘉庚欣喜万分，回闽后立即向福建省委、省政府报告这一喜讯。随后，他亲赴闽西、闽南实地考察调查。6月22日，他打电报给毛主席，表达自己的感奋之情，并建议昌厦铁路应由龙岩经过，以利闽西矿产资源的开发。毛主席又批请周总理研究答复。

不久，铁道部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



很快拟定了3个方案：一是“西线方案”，即从南昌经樟树、赣州、瑞金、龙岩至厦门；二是“中线方案”，即从南昌经南城、石城、瑞金、龙岩至厦门；三是“东线方案”，即从鹰潭经资溪、邵武、南平、永安、漳州至厦门。3个方案中，铁道部最后选择“东线方案”为推荐方案，其理由是，除了军事意义和政治影响外，东线里程比中线短62公里，比西线短144公里，工程费用较省。“东线方案”吸引人口最多，货运量较大，并与浙赣线接轨便利；从货源流向上看，选择“东线方案”更合理，东可筑通往福州铁路，联络东南著名海港马尾、三都澳，南可沟通中、闽南经济，北可开发闽北森林资源。

昌厦铁路开始由铁道部中南设计分局（第四设计院）负责勘测选线。1953年7月，草测设计工作完成，提交铁道部和福建省委、省政府审定。因为当时修建铁路的目的是“以国防为主，结合经济发展”，所以一致选择“东线方案”，正



福建青年志愿筑路队队徽

式定名为鹰厦铁路。1954年2月，铁道部决定鹰厦铁路的勘测设计工作改由铁道部西南设计局（第二设计院）担任。修建任务由王震将军率领的铁道兵部队承担。

二

关于福建铁路的修建，当时主管工交工作的副省长梁灵光说：“陈嘉庚先生和王震将军，对修建福建铁路所作的贡献，令人敬佩！”

1955年2月，鹰厦铁路开始动工修建。铁道兵部队12个师由副司令员郭维成、刘克带领，进驻鹰厦主要路段，兵部设在南平黄金山下，代号为“八零部”。

为了配合铁路大军抢建鹰厦线，福建省决定成立支前委员会，梁灵光负责这项工作。福建省把抢建鹰厦铁路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仅保证供应部队的粮食、猪肉、蔬菜、黄豆等，还动员10万民工全力支援。后来的事实证明，福建民工的确是鹰厦铁路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吃苦耐劳，心灵手巧，大部分土石方工程都是民工们完成的，而且在劳动中还创造了“秋千取土法”“竹轨送土”“土槽溜石法”等，对提前工期起了重要的作用。

福建多山，素有“东南山国”之称。闽西北山地属武夷山脉北，是全省地形最高峻的地区。鹰厦线所经过的邵武、顺昌、南平三明、永安、漳平、华安等县都是花岗岩丘陵地带，必须深挖

高填，架桥凿洞。按设计，要开掘隧道 47 条，总长 14 公里；修建桥梁 159 座，总长 8 公里多；浇筑涵洞 1658 个，总长 33 公里。整个工程中，最艰巨的一段，是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大禾山、小禾山 3 条隧道，总长度 3 公里。小禾山隧道长达 1460 米，是全线最长的一条隧道，这在当时国内也不多见。

担负这一段隧道工程的是英雄的铁五师。它原是“一野”的一支老部队，参加过攻克太原、解放西安、进军西南等重大战役，功勋赫赫。但是，这回遇到了极其顽固的敌人——坚似铁、硬无比的武夷岩山，合金梅花钻头钻得直冒火星，就是不见进去，打炮眼非常难。上级规定的掘进进度是日进 2.4 米，可是开头一段时间实际日进度不到 1 米。尖刀连连长尹尚龙原来是三五九旅的一名炮手，几天几夜不肯离开工地，终于琢磨出一种连环破法，日进度一下子上升到 5.6 米，铁牛关隧道日进度达到 10.8 米。结果武夷山工程段提前 2 个月完成了隧道工程。

鹰厦铁路工程进入了十分紧张的阶段：北面，大禾山隧道已经全部打通，铺轨列车穿过了武夷山；南面，九龙江两岸，线路、桥梁相继崛起，从海上把机车和钢轨运来，与北面呼应，同时铺轨。这时的攻关焦点集中在了福建中部的戴云山区。要提前一年（即在 1956 年年内）抢通全线，如果光靠人工来推平这座山岭，上去再多的人也来不及。唯一的希望是进行大爆破。

铁道兵兵部爆破工程师朱忠节和苏联专家

一起设计了几种爆破方案，试图一下或分几次搬掉一座山头，但是下不了决心：部队过去搞过的爆破，所用的炸药不过几公斤、几十公斤，装一吨炸药就了不起了。如今一下投入几百吨炸药，不仅铁道兵没有试过，就是全国也很少见。能行吗？有把握吗？

“为什么不行，现在是新中国嘛！”王震来了。将军和几位兵部长一块来到爆破指挥所视察，看了现场后做出决断：“我看不必害怕，科学实验嘛，总要担一点风险，问题是你们自己要有信心。设计上、技术上有没有把握？”

“有，”朱忠节答道，“设计经过反复论证，有可靠数据，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那你们还犹豫什么呢？”

“担心炸药不够啊！如果设计的大爆破都要爆，起码要 3000 吨炸药……”

“哈哈！炸药我负责。”将军大笑，“我有的是不花钱的炸药，要多少，有多少！”

“是吗？”朱工程师将信将疑。

还是刘克副司令员解开了疑团：“南方某军工厂有一批国民党留下的炸药，即将过期，正准备销毁。司令员已经和总后勤部商量好，将它运来鹰厦线放大炮。”

于是大爆破工程便加紧进行。在设计和准备过程中，朱忠节和苏联专家发生过争论。当时设计和计算爆破的破坏半径，是参考苏联的“经验公式”，放了两炮之后发现不对头，主要是因为“经验公式”运用得不恰当。这公式是苏联专家

根据多平原和丘陵的地理特点总结出来的，而鹰厦路沿线多高山峡谷，大为不同。朱忠节认为，地形、地质既不相同，公式也应相应变化。专家

理论上使之更加完善，最后形成一个大爆破爆炸半径计算的“铁道兵经验公式”。这公式后来被各地基建工程单位广泛采用，作为一项科研成



开头不同意，觉得有损尊严。后来经过实验，证实新方案不仅能节省炸药，而且增大了威力，专家也转而热情支持，并帮助朱忠节总结经验，从

果，受到国家奖励，朱忠节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爆破专家，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经过4个月的紧张劳动，连续进行了20余

次大爆破，到1956年4月，只剩下赤头坂最后一个堡垒。赤头坂大爆破要装入炸药244吨，预计扬弃土石18万方，等于掀掉整个山头。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大爆破了，因而惊动了各个方面。起爆之前，王震又一次来视察，指示要做到万无一失。团长吴明刚、工程科长祝金星和总设计师朱忠节更是小心翼翼，反复检查炸药室和电网，几乎每根电线都摸到了；为做到“万无一失”，又动员方圆2公里内的群众全部撤离，在各条路设置哨兵，封锁交通，人们只能在对面山上，等待着欣赏这平生未曾见过的雄伟景象。

起爆那天，来参观的人很多，有干部和群众代表，有作家、记者、摄影师，还有归国华侨。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队也赶来了（他们正拍摄题为《移山填海》的彩色纪录片），导演特意安排3架摄影，从不同角度拍摄大爆破场面。中午12点正，信号枪一响，大爆指挥员吴明刚一声令下：“起爆！”

“轰！”随着一声巨响，人们只觉得脚底一晃，山摇地动，赤头坂呼地鼓了起来。先是白烟竖起，火花四射，接着巨石腾空，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在空中翻卷流动，而后传来“嗡嗡嗡”闷雷般的响声，随着一阵旋风扫过，泥土和石块倾盆而下，有的石块一直飞到离爆破点600米的掩蔽所，吓得人们连忙伏下……待到硝烟消散，抬头一看，80米高的山头不见了，右侧的山谷填平了，出现了一条巍然大坝。人们纷纷奔出掩蔽处涌向赤头坂，一位华侨向王震道贺：“了不起，了

不起！真是移山填海，移山填海啊！”将军微微一笑：“谢谢，不过任务才完成一半，才仅仅看到移山，还有那填海的伟大壮举呢！”

1955年7月1日，黎湛铁路建成通车后，王震不顾疲劳，立即来鹰厦线，召集师长会议，部署全线工程，要求部队像在朝鲜战场作战一样抢时间，争速度，提前完成鹰厦线的修建任务。随后，王震从鹰潭到厦门，逐段视察路况，审查设计，研究难点。

三

1956年12月9日，鹰厦铁路的最后一根铁轨铺到了厦门，打下最后一根道钉。至此，全长694公里的鹰厦铁路，宣告竣工，仅用了1年零10个月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年完成。这个速度在我国铁路建设史上实属罕见。

欣喜若狂的陈嘉庚撰文歌颂毛主席英明果断纳建议，施行富国利民政策。毛主席则笑了：“鹰厦铁路一通，三个姓陈的都高兴啦！”

这三个姓陈的就是陈毅、陈嘉庚、陈绍宽。陈毅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为建成鹰厦铁路，他上下奔波，多方协调。陈嘉庚最早以全国政协副主席之职发起提案，报请国家进行这一大工程决策，同时，也是为家乡做了一件大事。如今铁路通了，大功告成，他们当然高兴！而福州人陈绍宽原系国民海军司令，时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当然为家乡建设欣喜……

半个世纪的情结

唐 颐

南洋、马来西亚、沙劳越、诗巫，这几个词汇已相伴我半个世纪，是温暖如春的亲情记忆。最早的印象，来自于1960年南洋姨姨寄来的洋铁罐头里的麦片，那原本是女儿千里迢迢寄给年迈母亲的“聊补无米之炊”，在我们仨兄弟姐妹儿时眼中是地道的奢侈品，尝过后便成了难以忘怀的美味。当时我的外婆已70岁，她可能没想到，自己将不足3岁的女儿送到一个偏僻山村当童养媳，女儿漂洋过海，40多年未曾谋面，却仍尽跪哺之恩。

外婆生有3个女儿、1个儿子，我的母亲是最小的，比南洋姨姨小8岁，60岁之前从未与这位二姐谋过面，而我的大姨比我母亲大18岁，她仍记得二妹的容貌。

1982年，68岁的南洋姨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中国故乡，三姐妹相拥而泣。南洋姨

姨凝视着已故17年的外婆遗像，老泪纵横地骂道：“阿妈，你心怎么那么狠，我才3岁，你就把我送人当童养媳……”

我小时候听外婆说，南洋姨姨下南洋时，是她的公公用番薯筐挑着上路，一头装着姨夫，一头装着南洋姨姨。姨夫生于1910年，南洋姨姨生于1913年，就此算来，坐在筐里的小夫妻下南洋于1916年，一个6岁，一个3岁。

三年困难时期，有南洋的亲戚，便是令街坊邻居同事同学羡慕的事。母亲那时有只小小的镀金手表，十分稀罕，异常珍惜，那是南洋姨姨寄给她的礼物。有一段时间母亲甚至舍不得佩戴，说是在诊所工作经常洗手，怕不小心洗坏了。20世纪70年代末，姐姐结婚，小金表作为嫁妆给了姐姐。20世纪80年代初，我结婚，小金表又戴到我的新娘手上，成了婆婆给媳妇的礼物。那只

小金表是名牌“奥米迦”，成了我们家珍贵的纪念物。

印象深的还有从南洋寄来的信件和相片。信件大都是大表兄光利和二表兄光意执笔，他们是20世纪50年代伦敦大学和台北大学的毕业生，汉文造诣颇深，封封家书都充溢着浓浓亲情。相片皆是家庭喜事大事的记录，如姨姨、姨夫寿诞的全家福，各位表兄弟、表姐妹大婚的合影，特别是当年被一些人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婚纱照，让我们看得又喜又惊。“十年动乱”期间，母亲悄悄将之藏匿，躲过被付之一炬的厄运。

1982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物资相当匮乏，南洋姨姨和姨夫回国探亲，带回两大箱旧衣服和新布料，我们与舅舅家的兄弟姐妹各有一份。给我的一块咖啡色呢料，送到裁缝店制了一件中山装，便成了出席各种重要场合的服装，

穿了近10年，几次淘汰旧衣服都舍不得丢弃，一直压在箱底。那一年，姨姨和姨夫还带着我母亲参加旅行团，游览了北京、杭州、桂林、广州等地。我送他们到福州，下榻华侨宾馆，我首次见识高档次的酒店，很享受在白瓷浴缸泡温泉的感觉。记得姨夫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中国有这么多亲戚，亲情浓厚，祖国地盘又这么大，物产丰富，价格低廉，他一定还会再回来的。但5年之后，79岁的姨夫病逝于诗巫，终不能如愿以偿。

姨姨、姨夫回国探亲之后，大约过了10年，异国的两位表兄程光杰和程光贤突然造访古田县，两兄弟在没有地址（母亲跟我哥哥搬了新家）的情况下，找到我母亲。他们说见到姨姨第一眼，就知道找对人了，因为如同见到自己母亲，她们姐妹俩长得太像了。而在我们眼中，光杰长相最像他母亲，也就像我的母亲。我与他们初次



垦荒的农民



诗巫古田纪念公园

相见，就有与生俱来的亲切感，血浓于水的道理是根植于基因之中的。

1993年春节，光贤表兄订购了中国去马来西亚的往返机票，邀请我姐陪母亲飞往诗巫过年。那一年，我母亲与南洋姨姨再次团聚，两姐妹同居一室20天。又8年后，南洋姨姨病逝，享年90岁。

南洋姨姨和姨夫一共生育15个儿女，4个夭折，养育成人的11个（7男4女），皆事业有成，儿女成群，家庭幸福。老大光利，2016年82岁，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回诗巫从事律师职业到退休，曾任诗巫古田公会主席一届。老二光意，2016年75岁，台北大学毕业，回诗巫办公司，曾任诗巫古田公会秘书长多届。老三光灿，守在乡下山芭老屋，仍以农耕为乐。老四光德，现居古晋开饮食店。老五光杰，与老六一起办公司。老六光贤，应该是生意做得最好、孩子生得最多的，育有4女2男，皆成家立业，还有10个孙儿和外孙，全都移居澳大利亚。老七光豪，现在诗巫开饮食店。大姐在澳大利亚，二姐在诗巫，三姐在新加坡，四妹在诗巫。此番我来探亲，为姨姨一家人口指一算，已达170余众。姨夫的父亲程公昌代，作为垦殖诗巫的1118名先锋队员之一，跟随被誉为诗巫港主的闽清人氏黄乃裳漂洋过海，至今106年。姨夫与他父亲都属一脉单传，如今发展得如此兴旺，可喜可贺。这其实也是福州十邑同乡在诗巫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

20多年来，我们与诗巫表兄弟来往频繁，

他们常回故乡走走。许多年来，我也很想去南洋和诗巫看看，了却少年时的宿愿，无奈总没有机会，直到退休之后，2016年元月，我与妻子应光贤夫妇之邀，为参加他们二儿子婚礼，终成此行。

莅临诗巫的第3天，阿杰表兄陪我与妻子上墓园吊唁姨姨与姨夫。也许是天公有意，那天早晨淅淅沥沥降下小雨，一改多日阳光灿烂、炎热难当的天气。诗巫华人墓园形制与福州地区墓地相似，一座座墓紧挨一起，每座占地一二十平方米，呈凤字形，皆用石头水泥瓷砖垒砌。墓前用铁栏杆围就，墓与墓之间道路狭小，杂草纵横，行走得小心翼翼。姨姨、姨夫与姨夫的父母亲合葬一起，两块黑石墓碑（光意表兄说是特地从台湾运来的），左边墓碑刻“福建古田小东岭头乡先考昌代程公先妣周民孺人孝男云南敬立公元一九八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右边墓碑刻“福建省古田县大桥镇岭头村先考程公讳云南先妣丁月莲太夫人之墓男光利、光意、光灿、光德、光杰、光贤、光豪”。

我与妻肃立墓前，敬献鲜花，三鞠躬。我对老人喃喃而言：1982年，我们夫妻第一次见到南洋姨姨和姨夫，想不到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一晃33年过去，今天终于能够来到“新福州”老人家们墓前，告慰你们在天之灵，也圆了我半个世纪的南洋情结。老人家们辛勤一生，最大的安慰是，程家从两代独苗，漂洋过海，百年经营，如今培育出儿孙后代达170余口，真是家族兴旺，事业兴盛，平安幸福，香火永续。

“侯官新学”访谈录

汪征鲁 陈 功

近年来，“侯官新学”作为闽都文化研究的新课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它的内涵和意义到底是什么？为此特邀陈功先生对福建师范大学汪征鲁教授进行访谈，对“侯官新学”的概念、特质，以及内涵等，作一番全方位的解读梳理。

陈：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严复的学说，也就是您所揭示的侯官新学。谈侯官新学，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新学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什么方位与意义。

汪：一般认为，中国主流学术思想或谓显学之序列发展，先后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晚清新学等几个阶段。

晚清新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18世纪中叶，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跨海而来，他

们企图用基督教、贸易与鸦片，但最后是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古老帝国的大门。腐朽的清王朝，在西方新兴势力面前望风披靡，中国面临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危机，也就是李鸿章所谓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伴随这一过程，还出现了西学东渐。正是在这种亡国亡种的危机感下，在中、西文化激烈的碰撞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以自强。新学作为晚清的主流思想，既是中西文化撞击与融合的产物，也是中国由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思想先导与文化成果。

说到“新”与“新学”概念之界定，还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新”的本意是“伐木，取新”。据甲骨文，其形为左边是木，右边是斧头。《说文》将其归为形声字，从斤，从木，辛声。“新”是“薪”的本字。引申为“始基”“开

始”。古人造房子、制作工具，是从伐木开始的。一般其言，新旧相对，以新为佳。《诗·豳风·东山》：“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新婚时非常美好，现在时间久了会怎么样呢？但在中国传统文化崇拜先圣、厚古薄今的语境下，在政治

饶有趣味的是，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为了反对古文经学，著《新学伪经考》，以“新学”指王莽时期的古文经学以示轻蔑。然而，出其意料的是，维新运动之初，守旧派人士以同样的口吻称康有为倡导的学派为“新学”，以示鄙薄、嘲



三坊七巷严复故居

和文化领域，每每厚旧而薄新。如孔子尊周礼，两宋理学尊所谓的儒家道统，儒家总的说来是法古的。又有所谓的“新门”“新学”“新贵”“新党”，均含贬义。直至晚清新学，“新学”一词才真正有了正面的意义。

弄。令守旧派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戏称的“新学”自19世纪末以来大行其是，成为朝野风尚。光绪皇帝支持的“维新变法”，慈禧太后推行的“新政”，无不以“新”字标榜，新学遂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王国维在述及中国300年学术文化

之变迁时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云：“有清一代，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则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

陈：新学作为晚清时期的主流思想，发轫于内忧外患，演化于救亡图存，最终以侯官新学集其大成。那么您是否可以谈谈其发展演化的历程以及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质？

汪：晚清新学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中西碰撞、由西变中、再到由中变西的一个反复的文化交融过程。一般而言，晚清东渐之西学由表及里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面，亦为物质文化层面，如坚船利炮、工具器物，等等；制度层面，亦为制度文化层面，如议会制度、君主立宪制，等等；价值观层面，亦为精神文化层面，比如世界观和方法论。此亦晚清新学演化的三个阶段。若从历史地理、地域文化的角度，窃以为这三个阶段还可以这样表述：第一阶段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南皮新学，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主要学习西方的器物技术，它的社会实践是洋务运动；第二阶段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南海新学，主张维新变法，学习西方的君立宪、议会制度，它的社会实践是戊戌变法；第三个阶段是以严复为代表的侯官新学，其揭橥“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主张学习西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体现了中西文化在核心价值体系层面的交融，以现在的研究观

之，它的社会实践是1919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这里，您提出了次第出现并代表新学发展序列的张之洞的南皮新学、康有为的南海新学、严复的侯官新学，即引进了地理环境、区域文化的因素，令人耳目一新。但这种揭示与演绎，有充分的学理与社会实践上的根据吗？

汪：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很专业。人类社会是一个发展演化的系统，其上还有作母系统的自然界，在这个系统架构中，我们可以以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考察人类社会及其问题。历史地理与文化地理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与人类社会最初的性质是自然环境也就是自然地理赋予的。我还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后续阶段，历史地理与人文地理依旧起着某种塑造人与人的思想之作用，当然二者的关系又是相辅相成的。

就这一视角看，晚清时期，不同阶段新学代表人物与新学核心思想的产生，与其历史地理与区域文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说，新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之所以将之称为张之洞的南皮新学，一则张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及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二则这一时期的新学代表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有两个共性，一是他们都是出自中国内陆地区或中原心腹地，在当时与国外很难交集，如曾国藩出自湖南湘乡，李鸿章出自安徽合肥，张之洞出自河北南皮，更是

京师肘腋；二是他们均为清朝重臣、封疆大吏，甚至儒学名家。三则他们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历次鸦片战争中，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下屡屡败北，在大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而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要“师夷长技”以图存，但他们依旧顽固坚持中国传统儒学的本体地位，认为洋人可取者仅器物而已，故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标榜。

新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之所以将之称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南海新学，一则，这一阶段新学的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康摆在第一位，康是梁的老师。二则，他们都出自广东地区。康是广东南海县人，人称康南海；梁是广东新会县人。晚清时，广东为西来传教士活动频繁地区，又毗邻英人统治的香港，西风不替。康有为在其青年时代就阅读了《西国今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介绍西学的著作与游记。光绪五年（1858）其23岁那年年底，康有为游历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而始知西人治国之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开西学之基矣。”（《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梁启超的情况大致如是。这使他们有可能更进一步倡导政治体制的改革。须指出的是，在戊戌变法之前，他们都未出过国，所阅西学思想，大都由日本转手而来。三则，变法前后，康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身份是士子、举人，处于统治阶层的下层，没有更多的既得利益与历史因袭，有较强的改革性。以

上种种使他们有可能突破器物的层面，在政治体制领域实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新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以严复为代表的侯官新学。因这是我们的主题，故就其历史地理环境与区域文化多谈几句。

福建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一隅，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使其在中原板荡的岁月里，偏安一隅，在历史的激流中形成一个相对平静的港湾。在中国中世纪后，当北方游牧民族周期性地入主中原之际，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便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入闽移民潮。这一移民潮的主导者为北方的世家大族。于是，当游牧民族将草原上的剽悍与骁勇带到中原地区，而成群结队为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入闽的旧姓大族又将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中庸与温柔敦厚寄藏于闽山闽水之中。当然，在平时，南下的移民也不绝如缕，只是数量上少得多，且大多非世家大族。于是，闽文化更多地保留了儒家文化的原教旨及古代中原地区的语言、艺术、风俗、戏曲的吉光片羽。

就侯官而言，“侯官”是福州的古称。两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八闽文化昌盛，至晚清，侯官更是名人辈出，如“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楨、中国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等，故当时有“晚清风流数（出）侯官”之说。更重要的是，侯官辖下的马尾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造船业、船政学堂的发祥地。

侯官新学就是在上述历史地理环境和区域文



阳岐严复故居

化的滋养下生成的。侯官新学特指严复的新学思想。溯其渊源，当时设在马尾的福州船政学堂为严复之所以是严复的发生提供了最初的平台。

福州船政学堂是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在筹办福建船政局的同时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左宗棠在该年调离后，由沈葆楨接办。当时 14 岁的严复正是受沈葆楨赏识而成为该学堂的第一届学生。

该学堂设有完全西化的、完备的、航海与海军方面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学堂分制造和驾驶两个专业。因左宗棠认为英、法两国分别是当时世界上驾驶和制造最好的国家，故分别委两国专家以全责。制造业由法国人主持，用法国教师、法国教材，用法语教学，其主要课程有法文、算术、几何、透视绘图学（几何作图）、物理、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等，因相

对船政局坐落的方位，其学舍在前，故又称前学堂，或法国学堂。驾驶专业由英国人主持，用英国教师、英国教材，用英语教学，其主要课程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直线和球面三角、航海天文气、航海测量和地理等，因其学舍在后，又称后学堂，或英国学堂。在课程上，除西学之外，每日还须讲读《圣谕广州训》《孝经》，兼习策论，但已为末流。

同治五年（1186），严复入后学堂修业。同治十年（1871），19 岁的严复以最优等学业成绩毕业。在海军服役 6 年之后，于 1877 年严复被选派入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两年。1878 年，严复等 6 人以优异成绩完成了海军学院学业。其中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林永升、萨镇冰等 5 人到皇家海军舰船上实习，而严复因已被中国官方安排为教职，继续在格林尼治海军学

院再学习一年。在英国多待的一年里，严复遍访大英图书馆、博物馆，深入探研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经典及社会问题。

严复之负笈英伦，使他有可能直入西方文化之堂奥，深得个中三昧，最终漂洋过海，将之植根中土。如果说，当年唐僧玄奘，不惮万里荒漠，赴印度取得真经，那么，严复犹如海上玄奘，远涉重洋，为死气沉沉的近代中国窃得资本主义的天火，从而真正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曲折漫长进程。

总之，严复之所以成为严复，是在于他自14岁起就接受英式教育，深谙英语、西学，后能留学英国，研习资本主义原典。之所以能如此，就只能归结为当时福建侯官区域组建了海军、福州船政局与福州船政学堂，这一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与区域文化氛围，熏陶、造就了严复。这一历史地理与区域文化的条件在当时的中国是唯一的，也就是说，只有“侯官”才能产生“严复”。严复一生喜用“侯官”署名，在《天演论》各章题目下，即署“侯官严复达旨”。世人也习惯称其为严侯官。

陈：是否可以这样说，侯官新学就是严复之学？

汪：狭义而言，侯官新学特指严复的新学思想，它是晚清新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晚清新学的极致。用“侯官”指称，是突出其历史地理与区域文化的特质。



严复全集

广义而言，侯官新学是指在福建历史地理和区域文化的大背景下，在宋明以来闽学的浸润与观照下，以及清朝末季这一地区中西文化之激荡交流中，形成的一个文化学派，其中包括林则徐、沈葆楨、严复、林纾等。应当看到，这一学派，一方面是晚清以来，福州乃至福建地区爱国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探求救国真理，主动向西方学习，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士大夫群体的思想结晶；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它也是在西方传教士在福建地区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以及创办教育、开展慈善活动取得重要的社会效果下而催生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侯官新学学理的开放性、先进性，方法的守中性。

陈：您可否简单介绍一下侯官新学的具体内容？

汪：侯官新学内容宏富，这里只能作极为简

要的概括。

首先，严复译介了当时西学的八大名著，即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铨》、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名学》、耶芳斯《名学浅说》。尤以《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意义最巨。

严复将其翻译称为“达旨”，即其所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他是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语境下进行翻译的，表现一种文化的融合。另外，在“达旨”过程中，他还写了大量的按语，这之中不乏再创造的成分。如《天演论》一书约5.7万字，严复的“按语”约1.9万字，占原文的三分之一强。

此外，严复还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序、跋等，阐述其思想。

要言之，侯官新学的精粹表现为：以自然科学为本的思想；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自然观与以社会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观；以数理逻辑为核心的方法论；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为核心价值体系；政治上以“三民论”为核心的救国方略。

侯官新学的特质还表现为思想的先进与方法的中庸。

另外，我与方宝川、马勇先生联合主编了《严复全集》，是迄今为止搜集严复文稿最全的集子，于此可以一窥严复思想的全貌。

陈：最后，您可否就侯官新学的历史地位与

当代意义作一评价？

汪：好。严复的侯官新学作为新学的殿军，是新学的集大成者，是在张之洞南皮新学、康有为南海新学的基础上，终归摆脱旧学的羁绊，全面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或者说是在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层面进行了中西文化的融合。这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思想理论的基础，或思想理论基础的重要部分。这一思想的社会实践部分表现为后来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民主，与侯官新学所倡导的科学、民主，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同源的。

当然，严复后来在政治上站在了五四运动的对立面，在文化上有“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这是由于其渐进改良的方法与五四运动方法上的激进相颉颃所致。其中也包括在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风靡中土，中西学地位易位的情况下，如何保护国粹，如何进一步使外来思想中国化而作的思考与努力。

严复辞世近一个世纪了。其思想在其生前身后，对中国现代思潮的演化及对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路径的选择，都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尤其在今天，当我们廓清历史的迷雾、走出转型的曲折，一个较为清晰的转型模式初步呈现时，我们更看到其中侯官新学的影子，其突出表现为“思想的先进与方法的中庸”。这也是“侯官新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度沉沦于今又为显学的根本原因了。

古巷漆语

——2016 福州国际漆艺双年展回顾

小麦

2016年7月17日，“漆语时代——2016福州国际漆艺双年展”在福州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拉开帷幕。此次展览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为指导单位，福州市漆艺术研究院、福州市博物馆主办，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支持，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8个国家（地区）125位漆艺家的625件（组）作品参展。在双年展开幕当天，还举办了“漆语时代”专场学术研讨会、“福州市漆艺术研究院”授牌仪式以及多个外围展，在福州形成浓郁的漆文化氛围，推动福州漆艺产业发展，召唤着一个“漆语时代”的来临。

一、古巷名坊与漆艺的碰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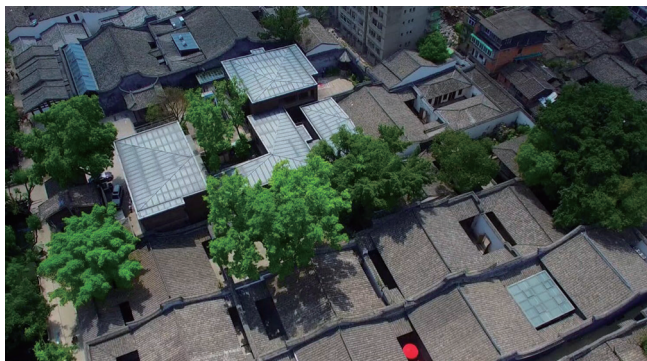
漆艺发源于中国，中国漆文化源远流长八千年。大漆出现在中国物质文化的历史舞台上，远

远早于瓷与纸。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漆艺顺应时代需求，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创造出丰富的材料视觉语言。河姆渡文化的髹漆木碗可被视为中国漆文化最早的实证，此后在战国漆瑟、汉代漆棺、南北朝漆屏风上，都不乏精美的漆质彩绘。大漆在器用上的装饰绘画，就是中国最早的绘画。中国的漆艺还曾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华丽绽放……追源溯流，漆艺在其发展历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本次福州国际漆艺双年展在梳理现代漆艺学术脉络的同时，更着意钩沉传统文化中丰富而深邃的精神特质，呈现传统文脉的发展和延续。

双年展择址于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作为福州古城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安泰河畔、安泰桥之东，形成于唐末五代。据《榕城景物录》载：“唐天复初，为罗城南关，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

管从柳阴榕叶中出。”可见当时的繁荣景象。宋代外城的修筑，使该街区全被围入城中。街区的空间格局为一街水巷，三座小桥，河水荡漾，古榕苍髯，坊弄交错，粉墙黛瓦，曲线马鞍，门罩牌堵，高敞厅堂，幽静园林。具有浓郁的福州传统风貌，曾有“福州秦淮河畔”之称，是福州“两山两塔两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修复中的朱紫坊街区正逐步恢复古桥、驳岸及河边石板巷道，结合芙蓉园古园林及重点保护的名人故居，营造出历史街区的传统环境氛围。漆艺展将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漆艺作品融入朱紫坊的历史氛围中，传统园林技艺的结晶与当代漆艺创作的精髓融合无间、互为主线，让人们在“曲径通幽”的空间里慢慢感受漆文化所呈现的丰富的物态美和形式美。这种对于文化的钩沉、呈现和再创作，与历史名坊的保护修复开发利用不谋而合。以朱紫名坊为时空载体，将不同年代不同文化所承载的大漆艺术串联展现，更是对文化传承的双重呼应。



二、漆语时代的集中诉说

在八千年中国漆艺发展源流中，有着丰富的漆文化生态与深厚的漆艺传承的福州，既是漆艺重镇，也在中国漆艺当代性的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16年7月17日至8月18日（后延期至8月28日），福州国际漆艺双年展在福州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举行，业界视为福州发力重振“漆都”的一大手笔。整个双年展从现当代美术史角度梳理了中国现代漆艺的学术脉络，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下漆文化的视觉生态，展出作品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堪称福州史上最盛大的一次漆艺展。

为期一个多月的漆艺双年展，三大主展区以“漆语时代”为主题，共展出中国（包括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越南、法国、德国、美国、西班牙8个国家（地区）125位漆艺家的625件（组）作品，以漆艺术的三种形态把展览分成三个部分：器型、架上、空间，尝试从语言学的角



朱紫坊展馆

度对中国现当代的漆艺作一次阶段性的回顾与梳理。

朱紫坊 33 号展区：器型（器韵 / 器度）。

本单元以器型展品为主，精选两类作品，一类是具有功能的日用漆器，另一类是漆立体造型，它们代表了漆学科语言建构的双维度：即人造物的境界和人工物的视野，一个是漆艺语言实践的直觉的维度，另一个是漆艺语言研究的理性的维度。该展区集中展现了国内年轻一代漆艺家及日韩越法美等不同文化生态下漆艺家对于漆艺现代性可能的一种探索。

朱紫坊 38 号展区：架上（漆语 / 境语）。

本单元以漆画展示为主。漆画是漆艺的架上形态，现代漆画虽然是以西方语境为标志命名的，但漆画是中国视觉的古汉语，它是从古代漆器的髹饰演变过来。是展以建立中国漆艺自身术语库和价值链为主旨，从 1906 年出生的沈福文一直到 80 后新生代中，精选了 33 位代表性的漆画家，展现了在各时期、各语言方向不懈努力的漆画家的风貌，呈现漆画中国文脉的传承与发展。

朱紫坊芙蓉园展区：空间（物性 / 心性）。

本单元主要侧重于器型与空间的交融互通，以明代内阁首辅叶向高故居芙蓉园为载体，精选了具有实用功能的日用漆器和艺术语言化的漆立体造型，及不同朝代的漆生活场景展示，注重跨媒材和跨界的尝试，更关注作品的精神空间以及主题的广度和深度，扩大漆器现成品的言说空间，给人提供想象的余地。

为配合主会场活动，双年展还对接闽江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福州脱胎漆艺制作中心、上海红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在三坊七巷海峡民间艺术馆、南后街展览馆、寿山石艺术馆、宗陶斋、沈绍安漆艺馆、福州海峡创意产业园及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等处设立了 7 个以“漆彩匠心”为主题的外围展区，在福州形成浓郁的漆文化氛围。

双年展开幕式当天举办的“漆语时代”专场学术研讨会上，国内外著名漆艺名家、学者们切磋、研讨，探研传统漆艺审美观念如何在当代美学中升华凝练，达成漆文化的新高度、形式的多元度、灵魂的丰厚度，论证如何有效地发扬传统匠人匠心精髓，繁荣当代漆艺创作，打开国际视野，进军主流艺术圈，获得真正的艺术地位。不同地域文明、艺术样貌、迥异审美，磨合交融使得漆艺未来造物充满无限的可能性，漆艺匠心表现语言多元化的发展是必然趋势。

此次双年展，日本、韩国、越南、中国台湾、美国和欧洲的作者都表现了他们一贯的水平与特色。而福州地处闽台交流前沿，两岸同源同根、同文同种，但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台湾和大陆的漆艺有着许多不同，存在着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必要。近年来，两岸文化交流频繁，一些漆艺方面的交流、展览在岛内反响很好，激发了彼此的创作灵感，期待能够通过漆艺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新桥梁。

“漆语时代——2016 福州国际漆艺双年展”

丰富的展览内容、具有学术分量的策划思路，以及开阔的国际视野和远大的文化眼光，是多年来漆艺领域难得的大展，它吹响了福州“重振漆都”的号角，可谓福州漆艺发展历程中的一次拓荒之行。福州作为近现代漆艺重镇，有着优良的漆文化传统，每个时期对漆语言的研究都呈现了不同的思维模式。随着漆技艺漆语言的丰富与广阔多样的漆学术交流平台的构建融合，福州一定能在漆语时代保持它应有的高度与锐气，继续推动中国漆艺的繁荣和发展。正如著名闽籍艺术家、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所说，“当代美术思潮与漆文化资源的碰撞、交融开启了中国的漆语时代。今天的福州漆艺，正在国际视野的展开中寻求其新的高度”。

三、大漆悠香远

福州是中国近代脱胎漆器的发源地，漆文化是福州重要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资源。福州脱胎漆器工艺精湛、千文万华，是我国传统髹漆艺术之瑰宝，与北京景泰蓝、景德镇瓷器并誉为中国传统工艺品“三宝”。在长期的融合创新发展过程中，福州的漆文化已经确立其在国内业界公认的行业地位，成为城市独具魅力的文化名片。

20世纪末以来，受体制转换、生活方式改变和市场经济冲击等影响，福州漆艺日渐衰落。为振兴福州漆艺、重铸漆都辉煌，2015年，经福州市委批准，“福州漆文化品牌建设”被确定为福

州市深化改革的试点任务之一，由福州市委宣传部牵头，福州市三坊七巷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具体承办该项任务。经过深入市场调研和多方专家论证，福州市委宣传部与福州市三坊七巷保护开发有限公司研究提出以组建福州市漆艺术研究院为抓手推动福州漆文化品牌建设的思路。

同时，结合近年来福州历史文化街区开发运营的特点和趋势，为避免各文化街区业态的同质化，朱紫坊街区将作为福州漆艺术研究院的基地，借由漆的发展，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漆艺文化”为主题的新型休闲体验式的漆艺街区，探索历史文化街区主营业务从房产租金经营向资本经营乃至城市空间经营的转型，成为与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山完全不同的城市时尚文化客厅。

朱紫坊街区将配套建设漆研发中心、漆艺双年展、漆美术馆、国际漆艺交流营和国际漆艺高研班、漆非遗品牌展示和漆文化体验等项目，形成以历史文化街区为背景，与安泰河自然景观相交融，以芙蓉园为漆艺展示中心，以漆文化时尚广场为中心节点，集聚周边精品酒店、青年驿站、漆艺茶社、漆专卖门店等文化休闲业态的城市客厅和漆创意街区。依托于朱紫坊福州漆艺术研究院搭建漆艺术公共服务平台，对福州漆文化及其产业发展发挥引领作用的制度探索和要素整合，重塑福州漆文化产业的政、产、学、研、金、介链条，打造福州漆文化品牌“产业全系统”。



《许》林元锡、陈勤群



《千漆割贝蒔绘箱子》小惊范彦



《绿金斑犀皮漆茶具》甘而可



《野生香蕉花》越南 阮氏桂



《三度》陈锋



《漆水流长》郭小一



《脱胎花瓣口碗》钟声



《即将消逝的红砖厝》陈立德

青山老树无穷意

——太老师何振岱诗词名篇赏析

陈倡白

何振岱（1867-1952），字梅生，号心与、觉庐、悦明，晚年自号梅叟，又号南华老人。是近代福州著名诗人和古典文学大师，在闽派诗坛上独树一帜，有全国性影响。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著有《觉庐诗存》《我春室诗、词、文集》《心自在斋诗集》，编有《西湖志》《榕南梦影录》《寿香社词钞》，并协纂《福建通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何振岱在福州悉心培养了10个女弟子，有“闽都十才女”之誉。我是十才女之一薛念娟的长子，今年91岁。年轻时，我称何振岱为太老师。

太老师文学成就卓越，而且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同光体”诗派创始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梅生诗词幽远精深，一时罕有其匹，真诗人之诗也。”我从太老师浩如烟海的1358首诗词作品中精选出21首，各附读后感言，以飨读者。其中不乏绝妙之作，不逊唐宋人也。

鹧鸪天·鹤髻云边倚晓寒

鹤髻云边倚晓寒，琴丝碧海为谁弹？何

曾仙佛无凭准，但惜人间解意难。毫浣露，纸薰兰，新词一卷托心肝。吟成不倚箏琶和，声出烟霄缥缈间。

太老师平生无意仕宦，以诗文寄情自娱，此乃其自表文学心意之作。盖谓词之为物，寄托心声；不待入乐，境界已呈；见仁见智，岂无凭准；谁能解意，便是知音。全词托旨深远，意象清俊，情致优雅，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纪别

佳蔬侑晨餐，临行食欲噎。中岁别衰亲，谁能肠似铁？去为就食鳧，忍托壮游说。去年谓今年，家居戒不出。今年如去年，严装催早发。今年视母鬓，又白去年发。小舟凌夜行，大舟傍午发。海水自弥天，儿心惟绕膝。

托词壮游，实为生计；许愿不再离家，却又被迫出行。无可奈何之况和盘托出。晨餐欲噎，母发更白，味觉、视觉两个细节写出辛酸。小舟、大舟过渡到弥天海水，衬托出绕膝儿心，鲜

明的意象对比绝佳。全诗之所以感人，源于至真至诚。

今 亦

今亦何尝是，无须悔昨非。
直将家作客，翻以去为归。
春浅花新茁，风来絮自飞。
茗川西上路，无数钓鱼矶。

此旅途之作。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自谓今是昨非；太老师则慨叹他乡反成故乡，昨今皆非，命逊前人。面对自然界生机，更加向往归隐林泉，以钓鱼矶作结，悠然意远。

晚 江

晚江不可望，弥望生凄恻。空水远含烟，渔灯淡将夕。合为一片愁，迷茫傍芦荻。鸥梦不能安，高飞点晴碧。行人从此去，云帆黯离色。今夜宿孤舟，天低月生魄。一照客肠回，再照客头白。无梦到家山，何人慰岑寂？

此诗借晚江写离人。为了别开生面，采取迂回写法。先说晚江不可望，出语奇特。接写为何不可望，铺叙迷茫景色，烘托凄恻气氛。然后离人现身进入正题，引出孤舟、愁月。“一照客肠回，再照客头白”惆怅至极，“无梦到家山，何人慰岑寂”何等苍凉！

松 陵

沉醉钱塘十日游，花明月好异乡秋。
无端行近松陵路，双塔船唇似福州。
异地美景虽堪沉醉，一见双塔便思福州。故

乡情结是永恒情结，伴随太老师一生。

客 梦

手种庭中树，别时初著花。
多情惟客梦，一夜一还家。

太老师一生爱花，常在庭院种树栽花。客居异地时，因念花而更加思乡，后10字是形象化典范。

南行别庭中海棠

半年仰树待花发，却到花时赋远游。
去去渐生江上月，将心化月满枝头。

离乡望月思花，唯有将心化月满照故乡之花。天才的想象，何等美丽动人！

江城子·孤山梅花

段家桥下载轻舫。水云乡，野天长。
才近孤山，吹袂是风香。修到梅花愁独自，
教淡月，伴昏黄。夜阑峰影写迷茫。好风光，
苦难偿。闲忆年时，轻折为新妆。莫与湖波贪照影，
人瘦也，怕花伤。

太老师爱梅成癖，因此字号梅生、梅叟。而梅花的胜地是西湖孤山，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即出于此处。故太老师写孤山梅花，上阕止于“教淡月，伴昏黄”。而内容的重点在于下阕，写欲取得寒梅美好风光，需付出人生艰苦代价。年轻时为新妆轻易折花；如今经历坎坷瘦损容颜，方始懂得珍惜梅花。多少感慨，化成“人瘦也，怕花伤”这绝妙好句！

再 赋 晚 菊

细蕊还开篱畔菊，能于瘦素出清新。

更番佳色宜深赏，十月阑秋著古春。

解趣故应天上月，可言惟有晋时人。

何因未入匡庐社？独自悠然性真。

赏梅兰的幽人，当然也少不了赏菊。瘦素、清新、秋中之春都是赞美，而“解趣故应天上月，可言惟有晋时人”这副工对更赞出神韵。“晋时人”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独来独往未入社，更写出了菊之孤高。

浪淘沙·七月初六日感旧作

眉月泻秋光，影落银塘。芙蓉空自断人肠。那有藕丝牵到底，开后都忘。黯淡旧红裳，梦杳烟茫。阿谁此日记壶觞。独有闲鸥怜故水，冷处思量。

眉月照芙蓉，藕丝终断线，红裳已黯淡，谁记昔壶觞，所有“梦杳烟茫”的意象皆指向悼亡。“独有闲鸥怜故水，冷处思量”意境凄美，一种天人相隔、柔肠寸断、千回百转、欲哭无泪的心绪，深深感染了读者。真乃情圣之词也！

和秋扬夏日晓起柏园即事（三首选一）

万象全凭物外看，人间何限苦中欢。

凄风冷露宵分后，双蝶冥冥恋画阑。

太老师极富同情心，且怜爱及于动物，我所知道的事例很多。此诗中的“凄风冷露宵分后”，正是双蝶的生命与爱情即将终结之时，犹“冥冥恋画阑”最后一吻。此种“苦中欢”，令读者随作者一同泪下。

循城南至谢夫子祠，归途得山花数朵（四首选一）

树罅城根是谢祠，苔阶尺地拜吾师。

青山老树无穷意，可信春无不转时。

太老师年轻时师从清末进士、宿儒、孕育闽派诗的最初人物谢章铤，终身不忘师恩，岁时拜祭。谢章铤有联云：“青山本是吾家物，老树难忘天下春。”太老师善解师意、升华师意，“可信春无不转时”哲理深远。为何题中有山花？拈此一朵，即是春也。

月（二首）

未圆之月照墙东，含辉反映残霞红。

乍移花影不尺许，已航碧海安瑶宫。从来月是初弦好，婉晚有如人年少。初更便是月之春，莫待渐斜看到晓。

既圆之月照墙西，一宵来比一宵迟。

虽迟必来君少待，徘徊曾与沧溟期。天高定有寻仙路，珠露飘香下桂树。新凉如水屋如船，何不撑船入月去？

“未圆之月”先写景物，富有韵致。接赞初弦月是“月之春”，道前人之所未道。实为回羡人之青春年少时，暗含今日年华老大之惆怅。“既圆之月”先写情理，蕴蓄哲思。“新凉如水屋如船，何不撑船入月去”则想象优美奇特，是神来之笔。二诗押韵皆先平后仄，更增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感。

疏雨

儿童仰天笑自语，历历星光何来雨？

竹间池上偶数声，梦余听之绝有情。一雨添秋疏胜密，正似龙门史公笔。翻江倒海岂不能？著语有时在幽逸。

以诗论诗易枯燥，借自然现象写文章技艺则活泼。疏雨有时胜于密雨，正如出生黄河龙门的司马迁惜墨如金，善于用极少的篇幅生动地写活一个事件、一个人物。长篇累牍畅书胸臆非不能也，短小精悍含蓄暗示往往更可贵。这是太老师的诗歌观点，以下聊举几首作为其实践的典型例子。

旧 约

旧约秋江共暮云，云边微惘与平分。

风光轻送芙蓉老，瑶瑟无情不可闻。

旧约成空，何况老至，伊人瑶瑟，不可闻矣！妙在“微”惘平分，风光“轻”送，淡淡哀愁，含蓄蕴藉，有如“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较之涕泗滂沱意境更高，更耐人寻味。

浣溪沙·春日酒边作

载酒吴船负夙期，芳春何处剧相思？飞花帘箔燕来时。意趣自怜微醉好，风光转与澹愁宜。闲来有忆只依稀。

“微醉”意趣，“澹愁”风光，“依稀”闲忆，与上首有异曲同工之妙。

偶 书

门无剥啄声，小睡味已美。

喃喃有佳言，梁间双燕子。

信手拈来，寥寥 20 字写出闲美意境，非高手不能为也。

江 夜（三首选一）

大江渺渺已成愁，烟月凄清更早秋。

一片枯芦寒苇外，微红灯火是渔舟。

太老师不但是文学大师，且精于书法、绘事。这篇诗中有画，枯芦寒苇一片灰暗，着一渔舟微红灯火，暗色便有亮色调剂点缀，韵味便出。较之“万绿丛中一点红”，同具色彩对比效果。

洪山桥酒楼小集（四首选一）

晚潮已落见渔艖，天卷长桥入小窗。

枫叶芦花都未有，只凭寒日看秋江。

洪山桥乃福州西郊长桥，横跨闽江，为入城必经通道。此诗是绝妙舟桥秋江图，酷似宋人写景小诗。“天卷长桥入小窗”，“卷”“入”特传神。纵无枫叶芦花，亦可凭寒日辨出江秋，足见太老师观察景物细致入微，能道人之所不能道。

扬州杂诗十二首（选二）

斜风细雨广陵城，不着闲愁亦有情。

花石都含名画意，巷坊未废古时名。

词仙俊赏淳熙世，红药犹存廿四桥。

后八百年空怅望，黄鹂声似玉人箫。

前首从容自如，对句工稳。后首所云 800 年前南宋淳熙年间事，我未查得原委。只知唐时扬州有 24 座桥，后来转为一桥的专名，又名红药桥。晚唐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之名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历代传诵。后首末句“黄鹂声似玉人箫”与此呼应，其独特构思潇洒清丽，令全诗生辉。

寿香社十才女之师何振岱其人

卢 和

何振岱既是寿香社的主持人，也是十才女的老师，因此，要了解才女们读书习作的书斋生涯，要了解寿香社的活动，就有必要了解何振岱其人。

何振岱，字心与，号梅生（一说字梅生，号心与，笔者另有专文就此作一考证），悦明居士、龙珠居士，晚号梅叟、觉庐老人、圆修老人、南华老人等。福州人，祖籍福清南华。公元1897年中光绪丁酉科福建第四名举人。1898年入名儒、词学家谢章铤门下。1916年农历四月福州《西湖志》重修，何振岱任总纂。同年十二月复参与修纂《福建通志》，任协纂。20世纪20年代后期旅京期间曾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选目工作，名列编委名单之中。

何振岱终身布衣，一生与书为伴，其弟子王真在《觉庐侍谈录》中回忆道：“师身不离书，手不释卷，尝叹曰：‘老而不辍读者，只吾与叔伊（陈衍）耳。’”此叹不无自豪之口气。

何振岱工古文辞与诗词，尤以诗歌成就最高，也最为世人所称道。而他本人似乎也偏爱自己的诗作，1936年从北平返里之后，即着手整理自20岁至70岁的诗作，成7卷本《觉庐诗稿》，于1938年刻成问世。而其文集与词集则直至身后方由子女和学生编成问世。

写诗是何振岱的毕生事业。他主张诗写性情，认为好诗皆从胸臆中流出：“总以自写胸襟、意与造物者游为最上乘耳。”（《何振岱集·与田生古序书》）但不等于写性情的诗都是好诗，因为“诗高全在性情不凡”：“诗言志一语，引而未发，人苟性情不凡，即是诗之根本，失其不凡之性情，安有不凡之言语？鸱作凤鸣，豕具麟彩，不几于妖乎？”（何振岱《北游纪略》，未刊）凡者，俗也，不凡之性情，不凡之言语，正是诗人之诗的标志。两个“不凡”使诗人之诗以其特有的空灵之气，区别于政治家之诗的策论气、理学家之诗的语录气、学问家之诗的考据气与獭祭



木刻版《觉庐诗稿》

癖。何振岱诗歌的审美取向无疑与王士禛神韵说有相通之处。

何振岱的诗工于写景抒情，善于寓情于景，其特色恰如陈衍《石遗室诗话》所说，语能自造，而出以自然，无艰涩之态，诗风深微淡远。这些特色也说明何诗与王士禛神韵派的诗风相近。以下试读何振岱的几首绝句：

来从霜后看湖天，碧不如春净可怜。六扇晴窗生潋滟，数株红叶作风烟。（《西湖观濮轩》二首之一）

寒逐江声上枕旁，起看残月在高樯。真疑短却前宵漏，逆作今宵一味长。（《舟夜》）

布帆一片是渔艘，天捲长虹入小窗。枫叶芦花都未有，只凭寒日看秋江。（《闰七夕洪山桥酒楼》四首之三）

笋舆冲雨过南屏，峰势微回断塔铃。一

片春阴谁写得，画眉叫雾晓冥冥。（《过南屏》）

东风门巷小精庐，虫鸟无声午睡徐。背着画屏盘膝坐，梅花香里读仙书。（《题竹韵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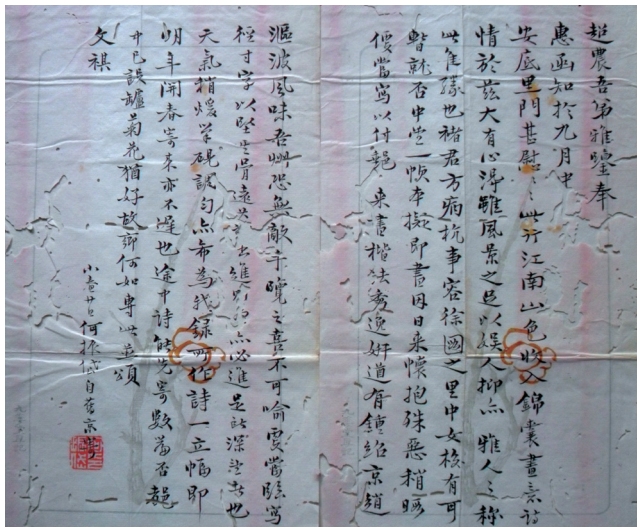
“绝句宜若仙露明珠，轻匀无迹”，这是何振岱向学生传授的绝句写作技巧，也是他自己绝句写作的经验总结。“仙露明珠，轻匀无迹”，8字自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来，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正是王渔洋所标榜的神韵派诗歌特有的一种境界。

《闰七夕洪山桥酒楼》绝句四首，风神酷似王渔洋之《真州绝句五首》。陈衍与钱仲联先后编纂过《近代诗抄》，《闰七夕洪山桥酒楼》皆一首不落地入选（后来这四首诗收入《觉庐诗稿》时何氏作了修改，诗题也改为《洪山桥酒楼小集》，兹仍其旧）。《题竹韵轩》一首，其意境纯从《南史·傅昭传》中的一段文字化出，写得举重若轻，的是高手。《傅昭传》的那段文字为：“（袁）粲每经昭户，辄叹曰：‘经其户寂若无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岂非名贤？’”

何振岱视诗歌为生命，创作态度一丝不苟。其师谢章铤 1898 年赠诗有“果能惨淡得生新”之句，惨淡者，苦心构思之谓也。其总角好友龚葆奎 1893 年写的《题梅生诗卷后》也有“冥心觅句时长哦”之言，冥心者，潜心苦思之谓也。师友的赠诗证明他年轻时即有苦吟之癖，不肯随便成诗。他的那些广为诗坛名流称誉的杭州西湖诗，



1936年何振岱与诗人陈三立合影于北平海甸



何振岱的书札写得如行云流水，极文人字以情带书之致

便是苦吟而成功的例子。王真当年曾记下老师的话：“吾游湖诗已改十二次矣！”（见王真《觉庐侍谈录》）说他视诗歌为生命，于此可见一斑。

何振岱工书，碑帖俱谙熟。大抵40岁之前为应科举考试之需，多下晋唐法帖之功，所临之帖有《黄庭经》《十三行》《灵飞经》等。40岁之后则沉潜于汉魏碑铭之玩味与临写，其常临之汉碑有《史晨碑》《尹宙碑》《礼器碑》《张迁碑》《夏承碑》《鲁孝王石刻》等，魏晋南北朝之碑有《好大王碑》《石门铭》《郑文公碑》《穆子岩墓志》等。晚年则超然于碑帖之外，纯以天机作书，笔底皆诗书之光华，极文人字以情带书之能事。

何振岱的书法成就源自他一生的勤学苦练，非唯勤学，且善于深思求悟。1934年何振岱已年届67岁，尚为自己定下日课：“自是之后，每日临古碑帖，皆写全本，留为成绩，以验进退。”

（见何振岱1934年农历八月初八日日记，何氏日记今存若干册，未刊）并眉注“定课无改”4字。临书每有所悟，辄以朱笔注于字旁。如1926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日记写道：“阅《张迁碑》字，悟其左右上下避让之法，至为微细。因以朱笔略注所见，凡廿馀字。往日真是蛮写，毫无见处也。”1940年他作有《临石门铭十年，忽有所悟，喜而书此自励》一诗，既肯定了此前的“老来更力学，此志偏不衰”，也为当前的“一朝若有见”“苦心造妙境”而感到欣慰，同时仍不忘提醒自己：“微悟何足恃，努力须虔追。”

何振岱也擅画，于是有诗书画三绝之誉。他所作的扇面书画，因为上面写的字常常就是自己的诗，所以几乎都称得上三绝。陈曾寿赠诗有“梅生三绝吾师事”之句，深致景仰之意。何振岱善山水画，其所瓣香者，宋代的董源、巨然、

李成、范宽、赵孟坚，元代的赵孟頫、黄公望、王蒙、吴镇，明代的文征明、唐寅、董其昌，清代的萧云从、恽寿平。尤喜画墨梅，师法南宋扬无咎、元朝王冕。

旅京期间，他常自携干粮到故宫观画。每次皆日出即往，日落始归，归来辄乘兴追摹背临。几年下来，所读宋元明清之画不下千余帧，熟悉到“吾尝合睫即若众画之罗列于前”（何振岱《与超农书》）的程度。饱读名家真迹让何振岱眼界大开，画技大进。但何振岱并未将习字的那股勤奋劲用于习画上，这是因为习画太花时间了，何氏平生以读书为第一要务，以诗人自许，视绘画为余事，所以当读书与绘画在挤占时间上产生矛盾时，他选择了读书，理由是：“若取两事较之，仍是耽书为主，以画辅之。盖所可学者法耳，意则吾人所自有也，读书多则意愈足，画无不佳者，此则可必者矣。”（《何振岱集·与王生坚庐书》）“读书多则意愈足，画无不佳者”，“画之佳处在一缕性灵与之氤氲耳”（见王真《觉庐侍谈录》），这让何氏之画去画工之画愈远而距文人之画愈近。他还提出文人画“画心高于画力”（王真《道真室随笔·觉庐侍谈录》记何语）以及文人画“能画诗”（见《何振岱集·与王生耐轩书》）即擅长画诗、以诗之意境入画的见解，且身体力行，丰富了文人画的理论与创作。陈曾寿题何氏画曰：“梅生先生人品高洁，偶尔作画，翛然意远，若不食人间烟火者，其妙正在不能甚工，全然士夫气，与时流相去何啻霄壤之别。”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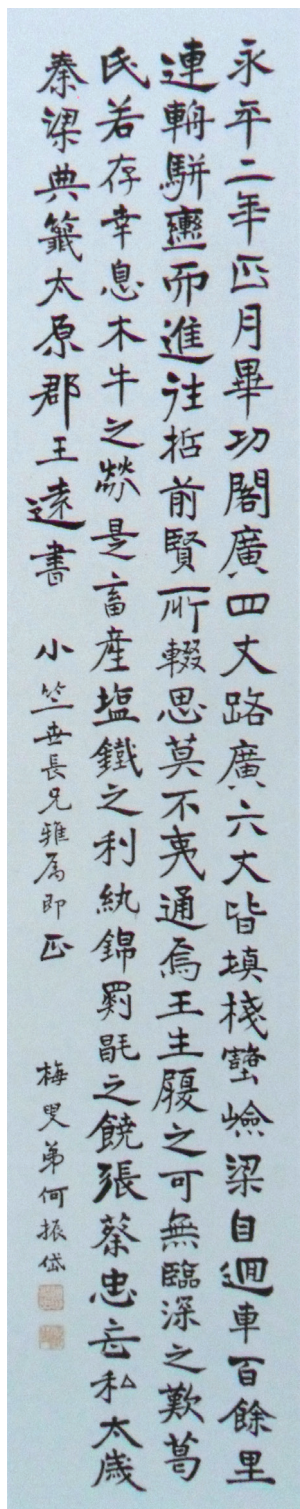


何振岱画绿梅

是知己之言。

何振岱还擅古琴。自言“余初学琴，笃访琴人，无真正知解者”（《何振岱集·杭州徐圣禅家藏古琴拓本序》）。42岁从南昌归来后，学琴于刘钦。刘钦字章甫，祖籍贵州，先世宦闽，遂入籍于闽。刘钦精音韵之学。光绪己丑中举后在龚易图家处馆，兼教古琴。据何振岱回忆，刘钦于古琴“本末兼审，妙阐玄旨，具有道气，度其所诣，直不可以一艺尽之”（同前）。此文人之操琴者也。琴人于琴无真正知解者，而真正知解者乃在文人之中。何振岱便是一位善操古琴的文人。

1943年1月30日，因事来榕的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卢前，慕何振岱诗人兼古琴名家之名，约同沈祖牟一道拜访了何振岱。据卢前《丁乙间四记·福州十七日》记载：“祖牟约往



何振岱临《石门铭》

文儒坊三官堂访问何梅生老先生。梅翁是留闽唯一的诗人，他的七弦琴还没有传人。我想请他在春暖时来永安音专一讲琴学，并请介一弟子到永授琴。”卢前对何振岱之为人及其才艺显然都十分推重。

何振岱一生以授徒为自由职业，是一位民间教育家。他在1928年前后写给叶可羲的一封信中提到：“吾授学数十年，及吾门者不下二三百人。”凡是入何氏之门的，他都一视同仁。王真《觉庐侍谈录》记录道：“师云：‘我于诸生无偏心，可质天地神明，有悦学者皆愿倾我所知以告之。’”他既授



何振岱抚琴照（1924年摄于北京）

学生以诗、书、画、琴，也授以为人之道，强调“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何振岱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都十分超前，举凡当时中国高等学堂的研究生教学、函授教学，他都乐于借鉴和采用。据寿香社才女们回忆，老师何振岱从未给她们上过集体课。虽然老师曾给个别学生说过书，但他依然主张应由学生自学，老师则为学生开列书单，适当指导，并批改作业。收在王真《道真室集》中由王真整理的《梅师读书举要》一文，记载了何振岱为学生开列的书单。何振岱还特地为学生开了一部指导读书门径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在《与超农书》（约写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写道：“读书先求其要者。……（《四库书目提要》）凡数十类，皆有总提要，即总论也。草书抄，每日一篇，约二三月可毕。……此为第一步入手之

大道路。夫名为士人，而于古今经史源流不能明白，遑论其他？君诚有志，请先理此，以后应读之书亦不多也。经、史之数有定，人能熟一经一史，便成学士。子部要者亦不过数类，集部则当看者更不必多，直浏览足矣。大抵得要则易成，泛及则虽勤不足道也。”一位旧派诗人如此推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不多见。

何振岱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是撰写读书札记，写作诗词，习字习画。每隔一段时间，学生将读书札记以及诗词字画等习作交给老师批改。何振岱还建议学生“约定三数人共治一经，或一子、史，以有札记批评为着实功夫，不特成己，兼可成人”（《何振岱集·答王生德愷》）。这是鼓励他们从事国学研究，既当文人，也当学者。

从开列书单让学生自学并撰写读书札记，到推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鼓励学生治经治子、史，既当文人又当学者，这种种做法不就是同时期国立高等学堂中的研究生教学方式吗？由于何振岱曾长期客居北平，师生间的授业解惑以及读书札记、诗词习作的批改，都是通过书信往返来进行，这又颇似于中国早期的函授教学。总之，何振岱的教学思想与教学方式都十分新潮，绝非一般塾师所能

望其项背。

作为老师，何振岱十分尽职尽责。一部《寿香社词抄》，收有8位弟子的362首词，无一首不饱浸老师的心血。1951年春，王真手抄自己的诗作成《道真室诗》，呈交何振岱审阅。当时何振岱已是84岁高龄，仍以羸弱之躯为《道真室诗》作全面的批改，并写序作跋题赠。知此事者无不感动。“愿松成盖笋成林，老去难消只此心。”（《何振岱集·花朝视诸生》）这是何振岱写于1934年的一首诗，他当年是这样说的，后来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为父母者皆以子女得附门墙为幸”（叶可羲《何振岱传》）。而他的学生也都倍受所在行业的欢迎和倚重，这是民间对何门教育的最大认可。



善于以诗的意境入画，即“能画诗”

林云铭与《红楼梦》

林如求

一、汉学家林云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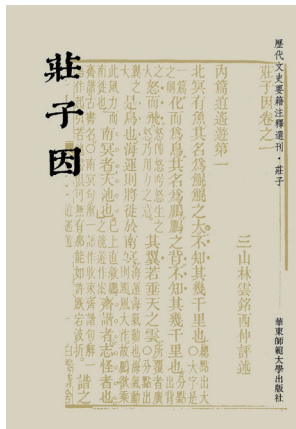
林云铭是清初著名汉学家，福建闽县林浦人（今属福州市仓山区），字道昭，号西仲。生于明崇祯戊辰（1628）八月，系濂江林氏后裔。其先祖科甲蝉联，以文行名于天下，最显者有“三代五尚书”，世称贤臣，载入《明史》。林氏家族自明永乐十九年（1421）林元美中进士，至明崇祯甲申林公衡为粤西宁通判，前后 220 余年不断有人入仕，故明清两代濂江林氏被誉为“东南第一望族”。

《濂江林氏家谱》载，云铭少时，父兆熊（郡庠生）被人构陷入狱，云铭与长兄发愤读书，“诸子百家，率浏览成诵……能言其所以然。其为文如天马行空，不可羁继。”少年云铭每探索精思，数日不食；暑日，家童具汤请浴，因思索入迷，竟“和衣入盆”，里人皆呼为“书痴”。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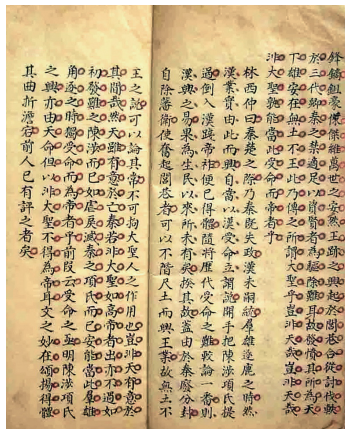
治十五年（1658）中进士，官徽州府通判（今安徽歙县）。他“品行高洁”，“治事精敏，听断如神”，他郡有疑难案件，便请他剖决。在《白门治狱》诗中林云铭曾自述：“白门路半千，一岁三往复。滞迹城南寺，盈床尽文牒。昼夜不停披，情辞駭心目。”可惜世道不平，他为官九载，竟三进三出。他在《述怀长歌》中感叹：“同时巧宦多超迁，我独九载空萦牵。”终因朝议汰冗员，于康熙六年（1667）被“裁缺”。罢官后，云铭隐居建溪精舍，专心著书立说。康熙十三年（1674），福建靖南王叛清，史称“甲寅闽变”。耿精忠“胁降不遂”，竟将云铭“籍家”（抄家）“囚之三年”，直至清兵平闽。云铭生计困难，“瓶乏楮粮短褐穿，妻儿相向泪潺湲”，于是“重茧西湖路数千”，移家钱塘，在贫困中度过晚年。他在《述怀长歌》中曾感怀居杭时窘境：“漂摇风雨危欲迹，饥来草具辍杯卷。寒怯衣单手足卷，摊书夜



雕版《庄子因》



2011年新版《庄子因》



林云铭手迹

《四书讲义》等。其中《古文析义》历来为世所重，光绪末年废止科举后，被一些大学（尤其南方地区）列为文史系必修课。在古汉语阅读与研究中，此书较之《古文观止》更有影响。

二、贾宝玉读《庄子因》

送窥昔贤。送穷旧套已重诠，起视银河星斗悬。搔首狂叫天何偏，诗书不及半囊钱。何事毕生劳槩铅，不如为农耕薄田。”林云铭卒于康熙丁丑（1697）七月，终年70岁，葬西子湖畔，可惜坟墓在“十年动乱”中被毁。

林云铭终生读书写作钻研国学不辍，说过：“后人患不如古人之作，特患不好古人之读，尤痛为后学针砭。”他长于诗文，文字也圆熟老到，如《客杭书怀》：“老去偏为客，病多不耐愁。疏钟千里梦，淡月半床秋。羽檄惊旁午，家书绝致邮。宵深眠未稳，肠断碧云楼。”《静寄》：“寂寂荒陬好结茅，烟霞不负旧时交。参将水月无生话，簟得天山最上爻。客少空悬孺子榻，书多但拥放翁巢。草玄有志终须就，却懒逢人说解嘲。”一生著述甚丰，《庄子因》《楚词灯》是他的代表作，2011年被国家列为“历代文史要籍”，重新出版。其他著作有《韩文起》《古文析义》《西仲文集》《挹奎楼选稿》《损斋焚余》《吴山音》

林云铭与《红楼梦》的关联，一是贾宝玉“读过”他的“解庄”名著《庄子因》。

《红楼梦》第21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写道：宝玉大清早到黛玉房中与史湘云纠缠，也不回来梳洗，引发袭人不满，宝玉不愿妥协，无聊之中读《庄子》，看到外篇《胠篋》一则，意趣洋洋，趁兴续书：“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宝玉省悟到自己与袭人等的区别，却认识不到这种区别的不可妥协性，更不能理解导致区别的原因。但他仍然希望能消除这种区别，实现彼此间的大同，所以续说：没了袭人、麝月，就没人再喋喋不休劝阻我。没了宝钗的仙姿和黛玉的

灵窍，闺阁中女子就不存在区别。没了唠叨，就没有我和袭人的矛盾，没有仙姿就没有我对宝钗的喜爱，没有灵窍就没有我对黛玉的倾慕。这四人都以不同姿态在迷惑、烦恼着我。黛玉看到这段妙文后，又气又笑，便提笔续书一绝：

“无端弄笔是何人？作践南华庄子因。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丑语怪他人。”

黛玉绝句的第二句，《红楼梦》各种脂抄本——庚辰、蒙府、戚序、列藏、杨藏、舒序本，皆作“作践南华庄子因”。这里的“南华”是书名，指《南华经》，也就是《庄子》；《庄子因》也是书名，是解注《庄子》的著作。后来的抄本甲辰本和程高整理本——程甲本和程乙本改作“剿袭南华庄子文”，这是错误的，是因为后者不知《庄子因》是书名的缘故。由于宝玉所续是自书体悟，并非抄袭、剽窃庄子原文，故不能称“剿袭”；并且，“庄子文”把“庄子”与“文”相连，“文”字便成蛇足；再从韵脚看，二、四句的韵脚“因、人”古时同属“真”韵，改为“文、人”则异韵，故为妄改。黛玉说宝玉“作践《南华》《庄子因》”，是讽刺他如此解读不仅是乱发挥《庄子》的文义，而且把解注《庄子》的著作《庄子因》的作者的声誉也给糟蹋了！当日宝玉读的和黛玉诗中提到的《庄子因》，就是林云铭的大作。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第七章《史事稽年》“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一节指出：“是年秋，林云铭自序所著《庄子因》修订版。按《庄子因》，为讲解《庄子》之书，于

《庄子》原文后各以己语贯串文词，发明旨义，犹略沿明代评文圈点风习，稍有启发文章意趣之致，与晚出王先谦、郭庆藩等汉学家之句笺字诂者大异其体制，而雪芹时代人所读《庄子》注本，正此种也。《红楼梦》第二十一回写宝玉续《庄》，黛玉题诗，有‘无端弄笔是何人，作践《南华》《庄子因》’指此。校订者乃竟从坊本妄改为‘庄子文’，由不知‘庄子因’三字连文，且为专名耳。”

林云铭所著《庄子因》是历史上尤其是清代注“庄”解“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林云铭注解《庄子》27年，自言“数十年寝食于庄，久已稔其大旨”，故对《庄子》颇有见地。他认为“读庄者实未尝读得庄，而赞之者亦未尝赞得神奇工妙处”，“前此注庄诸家，解其可解，而置其不可解，甚至穿凿附会，颠倒支离，与作者大旨风马无涉。”《庄子》大旨，皆以为“旨近老氏”，“然其中或有类于儒书，或有类于禅教”，因此众人对“庄子为解不一，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禅解”，都属“牵强无当，不如还以庄子解之”。在他看来，“庄子另是一种学问，与老子同而异，与孔子异而同”，既不能把庄子与老子看作一样，也不能把庄子与孔子看作两样。（均见《增注〈庄子因〉序》）这种观点确有独到之处。《庄子》一书，重在“因”字，因天地，因万物，因自然，《庄子因》的命名即因此而起。林云铭在序中说：“余考证诸要，参以管见，栴比其词，矚括其旨，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治庄之道。读

庄之书，求合乎作者之意而止。异日者，骊龙未寤，腐鼠已捐，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将手此一编，以质于大莫之国。”他希冀通过各方注解的搜集，加上庄子文本的细读，借由“施圈点，晰文理，批衅导衷，较易通晓”后，能得《庄子》全书篇章之间“相因”之理，进而解开庄子原本面貌，掌握庄子精神所汇之处，最终寄寓自己因之而不以为意的怀抱。《庄子因》通过情感、文法、脉络三方面对《庄子》进行解读评点，显示了林云铭独特的个性，是宝贵的尝试和可贵的进步，较前人相关理论有重大超越。《庄子因》初刊于康熙二年（1663），至光绪六年（1880），曾多次增注刊刻，并流传到日本，影响甚巨。

三、林四娘故事

林云铭与《红楼梦》的另一关联，是有关林四娘的故事。

《红楼梦》第78回《老学士闲征姽婁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中，贾政与众幕友谈及林四娘故事：当年有位恒王出镇青州，他“好武兼好色”，令一班美女习战斗攻拔之事，中有林四娘“姿色既冠，武艺更精”，恒王命她统辖诸美女，称“姽婁将军”。恒王是个真正“须眉浊物”，竟被“流氓”杀死。文武官员纷纷要献城，“不期忠义明闺阁”，林四娘带领众美女夜袭贼营，可惜力战不支，最后殉王报国。贾政赞其“风流隽逸，忠义感慨”，“最是千古佳谈”，命贾兰、贾环和宝

玉作挽词。贾兰作的绝句，贾环作的律诗，都显平庸，只有宝玉作的歌行体，铺叙渲染，曲尽其妙，后世评家推为“独压平日之作”（姜祺）。

发生在青州的林四娘故事，有好多版本，在王士禛《池北偶谈》和蒲松龄《聊斋志异》中都有同名故事，但情节不同。《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原为衡王宫嫔，遭难而死，变成美丽女鬼，与青州道台陈宝钥结成琴瑟之好后，每夜必至，阖户雅饮，或谈音律，或评鹭诗词，意绪风流。三年后，林四娘投胎转生，二人在缠绵凄婉中分手。《池北偶谈》所记林四娘故事与此相仿，但显简略，前者有千字之多，后者只三百余字，文笔也不如前者婉转缠绵。王士禛是蒲松龄好友，二人记载也较为一致，但都来自别人转述，并非一手资料。而林云铭所记的林四娘故事，地点青州、人物陈宝钥和林四娘都相同，但林四娘不是衡府宫嫔，而自称“莆田人”，系“投缳自缢”而死。陈宝钥是福建晋江人，康熙二年（1663）任青州道僉事，与林云铭同为福建老乡。故事由陈宝钥亲口讲述并让云铭记下，自当接近原版。对此荒诞不经故事，林云铭也表示疑惑，在文末评说：宝钥为人正直，“非能造言语者”，故事中“鬼能见形预人事，不可谓非神怪矣。然强魄暂留人间，终归变灭，不能久存。是在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无，皆惑也”。

林云铭所记《林四娘记》是一篇很有趣的鬼故事，颇具聊斋风韵，原载林云铭所著《损斋焚

馥》一书，不妨录下，来个“奇文共欣赏”：

晋江陈公宝钥，字绿崖。康熙二年，任山东青州道僉事。夜辄闻传桶中有敲击声，问之则寂无应者。其仆不胜扰，持枪往何，欲刺之。是夜但闻怒詈声。已而推中门突入，则见有鬼，青面獠牙，赤体挺立，头及屋檐。仆震骇，失枪仆地。陈急出，诃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魑，敢擅至此？”鬼笑曰：“闻尊仆欲见刺，特来受枪耳。”陈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笑曰：“檄兵格我，计何还疏也！”陈愈怒。犀明，调标兵二千名守门。抵夜，鬼却从墙角出，长仅三尺许；头大如轮，口张如箕，双眸开合有光，磐跚于地，冷气袭人。兵大呼，发炮矢，炮火不燃。检鞞中矢，无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众兵头面掠过，亦不之伤。兵惧奔溃。陈又延神巫作法驱遣，夜宿署中。时腊月严寒，陈甫就寝，鬼直诣巫卧所，攫去衾耗衣挥。巫窘急呼救。陈不得已，出为哀祈。鬼笑曰：“闻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掷还所攫。次日，神巫惭惧，辞去。自后署中飞砖掷瓦，晨昏不宁。或见墙覆栋崩，急避之，仍无他故。陈患焉。嗣余有同年友刘望龄赴都，取道青州，询知其故，谓陈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阳则有阴。若不急于驱遣，亦未扰扰至此。”语未竟，鬼出谢之。刘视其狞恶可畏，劝令改易头面。鬼即辞入暗室中。少选，复出，则一国色丽人，云翘靥妆，袅袅婷婷而至。其衣皆皎绡雾縠，亦无缝缀之迹。香气飘扬，莫可名状。自称

为林四娘。有一仆名实道，一婢名东姑，皆有影无形；惟四娘则与生人了无异相也。陈日与欢饮赋诗，亲狎备至，惟不及乱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狱，则为廉访始末，陈一讯皆服，观风试士，衡文甲乙，悉当，名誉大振。先是陈需次燕邸，贷京商二千缗。商急索，不能应；议偿其半，不允。四娘出责之曰：“陈公岂负债者？顾一时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图利败检，于汝安乎？我鬼也，不从吾言力能祸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丽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当知我在京庐舍、职业。”四娘曰：“庐舍、职业，何难详道？汝近日于某处行一负心事，说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骇，辞去。陈密叩商所为，终不泄。其隐人之恶如此。性耽吟咏，所著诗，多感慨凄楚之音，人不忍读。凡吾闽有访陈者，必与狎饮。临别辄赠诗。其中瘦词，日后多验。有一士人，悦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无礼！”喝令杖责。士人忽然仆地，号痛求哀，两臂杖痕周匝。众为之请。乃呼婢东姑，持药饮之，了无痛苦，仍与欢饮如初。陈叩其为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祯年间，父为江宁府库官，逋帑下狱。我与表兄某，悉力营救。同卧起半载，实无私情。父出狱而疑不释。我因投缳，以明无他，烈魂不散耳。与君有桑梓之谊而来，非偶然也。”计在署十有八月而别。别后，陈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补任江南传驿道，为余述其事，属余记之。